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國家戰爭動員下台灣人日語作家的「倫理」論述分析

——以張文環與楊達為例（1937~1945）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discourses” by Japanophone
Taiwanese write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war mobilization

The case of Chang Wen Huan and Yang Kui (1937~1945)

吳嘉浚

Chia-Hung Wu

指導教授：張文薰 博士

Advisor: Wun-Hsun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June 2015



誌謝



這篇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張文薰老師的指導，她對於殖民政治與文學的犀利見解，使我對於殖民統治與作家主體性的關聯產生了興趣，並決定以之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學術與社會實踐的關聯性，始終是縈繞我心中的難解疑問，即使這本論文未能直接觸及這樣的問題，然而我相信透過對於「國家」概念的釐清和批判有助於這項工作。寫作這篇論文的期間，我也進入了工會運動的場域，感謝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的夥伴們給予我空間，讓我能夠同時進行運動的實踐和學術的整理思索。謝謝在台文所研究室的夥伴們，與你們的討論閒扯是在苦悶的學術之路上前進的必備糧食。最後要跟支持我走到現在的父母，表達最深的謝意。

中文摘要



本文討論日治時期頗負盛名，且積極參與社會文化運動的兩位台灣人作家：張文環（1909~1978）及楊逵（1906~1985），他們在大東亞戰爭（1937~1945）的動員情境下，如何在作品與公開言論中，形塑獨特的鄉土、階級、性別等倫理論述（ethical discourse）針對國家的戰爭動員進行協商轉化，也影響自身的思想與行動。本論文處理幾個核心問題：首先，張文環與楊逵同為戰爭期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人，他們運用怎樣的論述策略與國家霸權進行協商？這樣的論述為何總是以「倫理」的樣貌呈現出來？其次，從比較的層次觀之，這兩位台灣人日語作家的倫理論述反應了何種思想的差異？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戰爭動員時期的種種「倫理」論述語言？而經過分析比較可以得知，張文環與楊逵在戰爭期的確經歷了思想與行動上的轉向，而這其實與30年代台灣逐步被納入戰爭動員體制的過程息息相關。透過將「倫理」作為一種論述的分析對象而非先驗的道德判斷，本文試圖揭示在日本帝國的戰爭動員時期，台灣人日語作家經歷了同時來自於國家體制的強烈誘惑與壓制，因而他們展現出來的倫理論述也是屈折而曖昧的，必須被放置在國家戰爭動員與殖民現代性等脈絡之中加以理解，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挖掘其思想的價值。

關鍵字：轉向、倫理論述、戰爭動員、台灣人日語作家、國民帝國

Abstract



Chang Wen Huan (張文環) and Yang Kui (楊逵) are known as left-oriented writers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ut under the war mobilizati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produced many ethical discourse about the duty of “national” to obey the war mobilization. In this research, “ethical discourse” is defined as the political practice which is through demand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groups to correct the social problems. Chang Wen Huan and Yang Kui constructed many ethical discourse about the category of class, gender, countryside, and the national-state.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ethical discourse was produced by bot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colonized Taiw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latter had to reconstruct their own discourse under the regime mixed up by national-state and empire.

Keywords: Tenko (轉向), ethical discourse, war mobilization, Japanophone Taiwanese writers, national-empir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8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運用	17
第二章 殖民地的戰爭霸權與台灣人作家的「轉向」	25
第一節 台灣戰爭體制的建立	25
(一) 從民風作興運動到總動員法	25
(二) 總動員體制與殖民地台灣知識分子	31
第二節 尋找大眾：三〇年代文學運動的困境	35
(一) 「方向轉換」下的大眾想像	35
(二) 日語世代作家之登場	44
第三節 張文環的回鄉之路	51
(一) 徬徨於帝都的左翼青年	51
(二) 父親的要求：張文環於島都的方向轉換	55
第四節 楊逵的國際主義路線及其頓挫	63
(一) 從運動到文學：第一次的方向轉換	63
(二) 國際主義路線的頓挫	66
第三章 鄉土倫理的再定位：張文環	72
第一節：重塑國民性：從帝都回歸的知識份子視線	72
(一) 返台初期的國民性論述	72
(二) 返台初期張文環都市書寫的意義	77

第二節 作為（反）近代化的女性問題	82
第四節 作為理論與實踐的鄉土倫理	93
第三節 國家倫理暴力與志願兵論述	101
第四章 轉向/轉進的動員倫理可能：楊達	112
第一節 往鄉土倫理的迫近：首陽農園的空間意義	112
第二節 支撐首陽園空間的性別倫理秩序	118
第三節 反思大東亞：楊達的國家倫理論述	127
第四節 階級倫理的轉化	137
第五章 結論	144
參考資料：	14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本文討論日治時期頗負盛名，且積極參與社會文化運動的兩位台灣人作家：張文環（1909~1978）及楊達（1906~1985），他們在大東亞戰爭（1937~1945）¹的動員情境下，如何於作品與公開言論中，運用鄉土、階級、性別等倫理論述針對國家的霸權（hegemony）進行協商，思索自身的倫理位置。「倫理」（ethics）在此指的是立場有別於既定的道德、法律規範，知識份子思考個人與群體如何互動的價值判斷，背後指涉了社會如何發展進步的理想期待。而對之加以界定、陳述的論述語言（discourse），或可稱之為「倫理論述」。

「倫理」一詞的出現在漢字圈可追溯至中國漢代，但並未形成一個重要的概念，而是直到日本明治時期對於西學的引進，將「ethics」翻譯為「倫理學」，「倫理」也隨著知識份子企圖借用西方的市民社會道德意識教化國民，而成為近代東亞社會重要的概念。²「ethics」翻譯成「倫理」並非純為偶然，此一詞在語意結構

¹ 雖然「大東亞戰爭」此一稱呼是在1941年12月12日才在日本閣議中決定的，然而在1938年，近衛內閣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為中日戰爭加以辯護，1940年左右，也宣稱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為對中戰爭的目標所在，基本上，30年代以來日本在中國的一連串軍事行動，可以說是對立於西方國家為主的既有國際秩序，而企圖以戰爭建立「國防國家」，在東亞地區進行軍事布局的結果，「大東亞戰爭」的名稱其來有自。而以1937年的日支事變起始，臺灣也被納入明確的動員體系之中。本論文以「大東亞戰爭」作為1937~1945的分期稱呼，有別於中國立場的「八年抗戰」，較能代表殖民地臺灣當時的視角，是整合於中國乃至於東南亞、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動員格局。參考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台北市：遠流總經銷，2008），邱振瑞譯，頁21~22。、李永熾，〈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形勢〉，收錄於《日本近代史研究》（台北縣：稻禾，1992），頁321~379。、庄司潤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戦争呼称に関する問題の一考察〉，《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3卷第3期（2011）

²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與兩種倫理學〉，《文化研究》第10期（2010），頁183。



上可拆解為「倫」、「理」，來自於「倫常」、「五倫」等具有社會秩序分類辨析的意涵，相較於此，最早可追溯至周朝的「道德」一詞則結合了「道」（普遍之理）、「德」（本質）等具有普世性意涵的字源，因此在近代被翻譯時也對應著「moral」一詞。本論文試著將兩者分別，界定「倫理」為強調特定集體與特定個人的關係，具有強烈的脈絡屬性，與強調普世性道德判斷的意義不同，即使背後存在著某些普遍的道德判斷預設，但更為重視「此時此地」對於個人與群體間權利與義務的峻別。因此，所謂的倫理論述往往強烈意識到主體的行動與選擇，因而強調個人行為的道德性，可以說彰顯了相對於結構的個人能動性；然而這種意識往往也預先判定了群體中的我群與他者，藉此決定個人與群體間的責任或利益關係，其標準往往也與時代的思潮密不可分。³因此，當我們聚焦於作家的倫理論述問題，就不只是在討論行動者的善惡好惡判斷，或支持或反對怎樣的社會規範，而更要探究這些作為社會實踐者的近代知識份子，如何與各種國家、族群、性別、階級交織的倫理邏輯進行接受、對抗、重塑等互動，藉此發展出個人的倫理判斷與社會變革理想的期待。這些問題不僅是這兩位殖民地作家在戰爭期間時常心之所繫，藉此更可以彰顯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一些重要的面向與價值。

本論文希望處理幾個核心問題：首先，張文環與楊逵同為戰爭期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人，他們運用怎樣的論述策略與國家霸權進行協商？這樣的論述為何總是以「倫理」的樣貌呈現出來？其次，這兩位台灣人日語作家的倫理論述在什麼樣的層次上可以產生比較的意義？這樣的比較對於我們理解戰爭期的「倫理」情境有何幫助？倫理的論述，有沒有可能超越規範性的意義而具備主體自由的性質？正如子安宣邦所提示的，近代日本的主流倫理論述被國家所壟斷，個人對生存意義的思索，已經被彼方國家的存在所決定，⁴在戰爭時期的殖民地台灣，也在「國民帝國」的結構下受到類似的時代語境限制。即使在當代對於戰爭期知識份

³ 劉紀蕙，《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台北：行人，2011），頁 27~28。

⁴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與兩種倫理學〉，《文化研究》第 10 期（2010）

子的詮釋，也充滿著對於「皇民」、「奴化」、「三腳仔」等倫理判斷，其實也難以擺脫以國族為前提的視野。⁵相較於先設定「我群」、「他者」的先驗標準，先將價值判斷進行「置入括弧」，讓作為考察對象的「倫理論述」浮現，才能看見當時的台灣人作家如何利用各種資源與戰爭動員的話語進行周旋，一定程度解構了「國族—國家」的本質預設，思考知識份子在國家動員下的主體性可能。

具體來說，對應於總力戰的局勢之下，殖民者創造出的動員倫理，殖民地知識份子也必須思考自身、以及「我群」所屬的主體位置：如何看待這樣的倫理論述，以及如何生產出一套有別於殖民者的論述。佔據霸權位置的話語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手，它往往擁有全面性的社會資源去設定一個獨斷的詮釋方式，而對它進行拆解的意圖，必須在迂迴而小心翼翼的策略中前進，不僅必須在許多有限的資源中妥協，甚至隨時有被收編的危險，而在戰爭情境之中特別是如此。有別於前行論者以「認同」為內核，強調在軍警控制之下無法自由表達思想的歷史敘述，在此，如何看見當時的知識份子們如何且戰且走，在既有的思想脈絡下考慮策略，在行動之中也產生思想變貌的過程，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方向。從鶴見俊輔的「轉向」論裡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思想資源。亦即：國家對於個人思想的改變是可能的。這並不是在宣稱法西斯主義的威力無遠弗屆，而是在現代性的國家總動員之中，個人思想所必然面臨的困局，也唯有在對於國家掌握霸權（hegemony）的實態進行考察的前提之下，才能對個人的主體自由進行判斷與宣稱。也因此鶴見俊輔在「轉向」的定義中，同時強調國家的強制力與個人的自發選擇這兩個條件，在避免先決地賦予「轉向」以道德色彩的概念界定之下，進行更寬廣的分析與評價之工作。⁶

雖然一般臺灣的日治歷史分期，往往以中日戰爭的爆發（1937）作為戰爭期

⁵ 林嘉立以「雙重的二元對立」稱呼這種統、獨的國家想像皆努力區分台灣人與殖民者界線的民族主義敘事。林嘉立，《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的民族主義敘事：以 1940 年代為中心》（台北：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⁶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頁 28。



的起點，然而國家對於戰爭倫理的形塑與教化則遠早於此，在 1930 年代初期，日本軍部的勢力膨脹，不僅反政府的運動遭到鎮壓，對於軍國主義的意識型態教化也透過學校、鄰組等組織而建立，據李永熾的說明，日本社會被逐步整合進入「總力戰」的體制之中，不僅在肉體上，對於國民的精神也講求排除個人私慾、為國奉獻效命。⁷如同鶴見俊輔利用「十五年戰爭」的概念試圖指出的，這是一場持續了十五年（1931~1945）的戰爭，戰爭的實態被包裝在一個又一個的「事變」假象之中，卻在人民沒有明顯意識的情況下滲入生活。⁸而在殖民地臺灣的情況，則可看見 1930 年代的民風作興等社會教化運動以及學校教育，為戰爭動員的意識型態做好準備。⁹值得注意的是，周婉窈將大正末期、昭和初年出生的臺灣人稱為「戰爭期世代」，認為他們受到國家教育與動員的影響，不免認同日本的皇國忠孝觀。¹⁰然而張文環、楊達的世代則早了約二十年，他們的教養過程介於書房衰落、公學校教育普及之間，兩人所代表的日語作家群體，也在報紙廢用漢文欄後，¹¹漢文空間壓縮的戰爭期取得更為全面的空間。如何面對國家掌控社會教化權力情況下，在年輕世代所產生的「法西斯主義」，是在瞭解他們的作品與言論時，值得思考的路徑。同時，也不能忘記「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對於被殖民者的誘惑，實有使主體自發地依附其邏輯的力量。¹²對於戰爭時期文化霸權的分析，則應該結合世代教化與殖民現代性的問題進行思考。就張文環、楊達的思想與行動軌跡而言，可以說是在中日戰爭發生前後幾年有了明顯的轉變。而自此時起，戰爭的動員機制也明確地展開，有戰爭總動員法、皇民奉公會、文學報國會等制度與

⁷ 李永熾，〈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形成〉。

⁸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頁 3~11。

⁹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前台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¹⁰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3），頁 215~294。

¹¹ 在當時緊張的中日局勢之下，台灣的幾份重要報紙先後宣布停止漢文欄，是受到總督府官方壓力的結果，僅剩下如《風月報》等少數漢文刊物，且已無涉政治，此時期台灣人作家主要在報刊文藝欄發表作品，直到 40 年代眾多文藝雜誌的出現。參見陳淑容，〈戰爭前期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成和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 51~56。

¹²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2004a）。

組織的確立，同時亦有皇民化運動、翼贊運動等法西斯浪潮，加上此時期在台日人、臺灣人作家出現共同文藝地盤的種種情形下，臺灣人日語作家的動向值得特別的注意。本論文因此選擇 1937~1945 作為大致的分期，稱之為「大東亞戰爭」，討論兩位作家的文學與思想轉換問題。



張文環出身嘉義梅山，在留學東京其間曾參與左翼讀書會組織，兩度被捕。1933 年與吳坤煌等人組成「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福爾摩沙》雜誌，此時似已由左翼民族活動轉為文藝路線。1935 年以〈父之顏〉得到《中央公論》小說徵文選外佳作而成名，並開始參與台灣文藝聯盟等本島文藝活動。1938 年回台之後，曾任職於「臺灣映畫株式會社」、《風月報》和文版編輯等。而 1941 年創辦的《臺灣文學》雜誌，與《文藝臺灣》各據山頭，此時除了提倡寫實主義的理念，提供王昶雄等作家成長的空間，也實際創作出〈閩雞〉、〈夜猿〉等好評之作，參與厚生演劇會的活動。除此之外，張文環時常發表社會議論，尤其對都市的花柳業問題特別關注，在戰爭動員的局勢下，更扮演了「被動員去動員」¹³的角色，參與皇民奉公會，發表支持戰爭的言論，以及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文學動員的活動。


另一方面，差不多同一世代的楊逵，出身台南，也曾留學東京，在 20 年代末回台參加臺灣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組織崩壞後於 30 年代開始從事寫作，1934 年〈送報俠〉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為台籍作家進軍日本中央文壇開啟先聲，之後以文學評論見長，聯絡日本左翼或自由派作家，關心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在臺灣與日本雜誌發表許多評論文章，後並創辦《臺灣新文學》試圖實踐其理念，然以失敗告終。爾後開闢首陽農園，沈潛一段時日，於 1941 年再度開始文學活動，加入《臺灣文學》，爾後陸續發表小說、劇本、文學評論以及議論文字，許多作品刊載在《臺灣時報》、《台灣藝術》，仍以關注農工大眾的生活與文化問題為主。值得

¹³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頁 393~430。

注意的是，此時期楊逵擔任皇民奉公班的基層組織者，也在文章中討論到戰爭與國策，並屢屢對當局提出建議。



從上述兩人在日治時期活動的簡歷，可看出他們都曾參與左翼運動，後來轉為文學創作者，並主要以日語寫作，甚至獲得內地文藝界的肯定，而他們在戰爭期也存在著《臺灣文學》、《民俗臺灣》、《臺灣藝術》等接點，而這些雜誌都是臺灣人重要的文化據點；甚而在 1943 年的「冀寫實主義」論戰中，楊逵也為文聲援受到《文藝臺灣》陣營攻擊的張文環等人。由此可見，兩人的活動軌跡有頗多交會之處，特別是在戰爭期以臺灣文化人為相關範圍的群體。然而，就戰爭期以前的兩人活動看來，張文環僅參與左翼組織的外圍團體，且限於東京時期，投入程度有限；楊逵則實際參與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組織工作。另一方面，在文學活動上，張文環擅長描寫鄉土人物的百態，楊逵則致力於描寫受苦的工農階級以及懷抱理想的貧困知識份子，並且以文學評論見長，聯絡日本的文藝界，提倡文藝大眾化的理念。兩人在戰爭期前發展的軌跡即有所差異。而在戰爭期，相較於張文環主要以《臺灣文學》為活動舞台，楊逵則與具官方性質的《臺灣時報》編輯保持關係，發表〈泥偶〉、〈鵝媽媽出嫁〉等代表作；同時相較於張文環身任皇民奉公會幹部、積極參與奉公活動，楊逵則主要以報刊議論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從兩人在戰爭期的文學與文化活動看來，可見到張文環較關注鄉土倫理，以及都市花柳業、志願兵等問題，楊逵則延續階級的思考，對大眾投以關注，希望當局能實在地提升底層人民的生活。由此可見，在戰爭動員的局勢之下，兩位知識份子採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回應，某方面來說，也可以說是「民族」、「階級」兩種思考進路；然而這兩條路線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國家框架的限制，而產生妥協與變貌。從兩位作家的比較，可以看見他們從各自的位置，思考鄉土、性別、階級、國家等種種倫理論述的操作可能性，形塑獨特的文學與思想面貌。背後所反映的，則是戰爭時期複雜的社會與精神史脈絡。



張文環與楊達同為戰爭時期積極參與文學與社會活動的知識份子，與日本的文壇的關係成為在殖民地的文化資本，也試圖超越於此展開在地化的行動，獲得重要的影響力。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概念來說，即是企圖聯合人民，推動新的歷史力量之「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¹⁴但另一方面，殖民政府的戰爭動員也讓他們必須援用國家霸權的正當性，才能展開他們欲求的文化社會工作，甚至從另一方面來說，總力戰使得他們必須不斷地生產論述話語以響應國策，殖民者並非壓制其言論，反而是強制其不斷發言、著述、甚至躬身參與動員組織，這也可以說是在現代性國家機器下取得資源的有機知識份子必然的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之中，作家的思想因而產生變化。變化不一定等於屈從，卻是在急速變貌的社會關係之中，摸索尋找個人行動或安身之道，具有一定的曖昧性，然其身處於家族、大眾、國家、知識份子群體之中的社會網絡，必然決定了其思想變貌的可能軌跡。

¹⁴ 波寇克，《文化霸權》（台北：遠流，1991），田心喻譯，頁 129。而施淑則是在〈日據時代小說中的知識份子〉中使用此概念稱呼接受新式教育，與傳統截然對立，企求以西方文明範本推動台灣現代化的新一代知識份子。他們有些人受到殖民教育的餵哺，為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建立效力，有些人則針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展開左翼與民族運動。參見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台北：人間，2012），頁 25~42。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就台灣人作家在中日戰爭下倫理位置的相關討論而言，葉石濤於1987年出版的《臺灣文學史綱》有其重要性。¹⁵在「戰爭期」一節，他區別了沈默抗議、堅決反帝反封建、逃避現實、親日路線等在戰爭期的四種文學路線，將張文環、楊逵歸類於「在虛應故事下從事抵抗」的類型，¹⁶許多從個別作家研究的角度討論張文環、楊逵的論著都採取了類似的描述，他們是否寫出「皇民文學」（抑或其實依然是「抗議文學」）的問題，也不時引爆論爭。¹⁷林瑞明對於戰爭時期皇民文學／非皇民文學的嚴格區分，也是從小說文本延伸至作家社會實踐的層次，尋求兩者間一貫的解釋方法。¹⁸這些討論無不在描述戰爭動員下的台灣人作家如何尋求一個適當的倫理位置，甚至論者本身也在行使具有國族主義色彩的倫理論斷。然而這樣的討論立場預設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政治立場上截然二分的歷史情境，也忽略了台灣人作家在行動上的多元，反而將之收束在抵抗／非抵抗的二元性之中，當論者將自己的倫理意識介入這些台灣人作家的作品與言行之時，被討論對象本身被輕易的「代表」了。

較特別的是陳芳明在《臺灣新文學史》論及張文環的作品，認為「對照於台灣總督府所要求的戰爭美學，他的創作方向顯然是與之違背的」¹⁹但在另一方面，也指出他在政治立場上的妥協與矛盾，²⁰注意到了以二元論評價作家的困難。他將

¹⁵ 葉石濤對戰爭期新文學活動的討論早期可見於〈台灣的鄉土文學〉（1965）、〈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7）等文章，基本的立場大致類似，雖然認為台人與日人間存在個人間的友誼，但在民族的精神上有不可兩立的矛盾。

¹⁶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07），頁65~66。

¹⁷ 這反映在一波波的皇民文學論爭之中。例如1986年，張恆豪提出楊逵曾寫出〈首陽解除記〉與〈增產之背後〉等奉公文章，但文化界卻刻意忽視，並不夠客觀，王曉波則質疑這些作品的真誠性。陳映真在1999~2001年間對於陳芳明以「皇民文學」稱呼陳火泉、周金波，卻以「皇民化文學」稱呼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作家的抗議。參見賴婉玲，《皇民文學論爭研究》（桃園：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73~79、118~120。

¹⁸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收錄於《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1996），頁294~331。

¹⁹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頁190。

²⁰ 同上註，頁192~193


作品與社會行動分開討論，蘊含了將對民族與戰爭的立場作為不同變項研究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討論仍停留在對於單一作家的偶然性評價，無法從更大的社會與精神史脈絡中思考這個現象的意義。



事實上，以往對於戰爭期臺灣文壇的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除了對於戰爭動員下的文藝統制政策有所闡明，也強調臺灣人作家的主動作為，以及與在台日人作家的競合關係，或者及於文學場域如何建立等問題。其實早在臺灣文學研究尚未體制化之時，日本學者尾崎秀樹發表於1961年的〈決戰下的臺灣文學〉一文，就詳細討論了1940年代初期《臺灣文學》與《文藝臺灣》陣營的對立，以及日本中央一系列對臺灣文壇的收編統制過程，認為「這五年，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把每個作家或組織所擁有的個性及其實現的可能性全部搗碎，並將之統制、統合到南進基地台灣的文化決戰體制上來這一過程的最後階段」。²¹尾崎這篇文章透過「皇民化」與戰爭體制的緊密關連，呈現台人與日人作家同樣艱困的倫理立場，但較偏向廣泛而論，無法深入探討知識人的主動選擇有怎樣的憑藉基礎。相對的，柳書琴則在其碩士論文以及〈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等文都討論到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大政翼贊運動」（1940~1941）下對地方文化的重視，使得臺灣人知識份子趁機展開文化與文學運動，一時蓬勃發展，但約1942年以後政府領導權為軍部全面掌控，加上戰爭局勢轉頹，翼贊文化景氣消退，知識份子的能動性也被徹底壓制。²²前述研究釐清了戰爭期文藝統制政策對作家的影響，並且指出臺灣人作家對於政策回應的主動性，不過較少涉及社會或政治行動面向的分析，反而僅能證成官方政治動員的有效性（儘管被動員者未必認同）。

²¹ 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104~193。

²²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北：歷史學系碩士論文）。〈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一文收錄於吳密察等，《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播種者，2008）。該書收錄的文章為研究四零年代「地方文化」論述的重要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柳書琴在前述碩士論文中提到大政翼贊運動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具有吸引臺灣知識人「轉向」支持戰爭的可能力量。²³李文卿的《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也強調「大東亞共榮圈」對於張文環等知識人的吸引力。²⁴崔末順則透過法西斯主義的概念，對於戰爭期小說的審美化傾向、上升型敘事進行分析，指出「政治美學化」的問題。²⁵這些研究不以「媚日」、「皇民」等二元國族對立的價值進行判斷，而是指出大東亞戰爭的特殊性，具有意識型態霸權統治的作用，一定程度影響了台灣知識人的意向。然而大東亞共榮圈、戰時法西斯主義如何對個別作家的思想與行動產生具體影響，仍需要更具體的分析。以張文環、楊達的例子來說，他們的在地實踐其實難以用「大東亞共榮圈」等意識型態的框架所限定，他們努力對話的與其說是大東亞共榮圈，不如說是國家實際動員的機制。

而關於文學場域的問題，陳淑容處理了戰爭前期（1937~1940）失去漢文地盤的台灣人作家如何在報紙文藝欄發展日語文學創作，以及黃得時、西川滿、田中保男等編輯的重要性，是理解40年代文壇形成的重要背景。²⁶張文薰透過考察台北帝國大學與40年代臺灣文壇的關係，則指出此時期產生台日共同文學場域的背後作用力，應不僅只有戰爭或翼贊政策影響，更應該考慮日語作家共同的文化資本、國家學院體制所生產的地方知識、東洋學之學術脈絡等，可以解讀為戰爭期更深層的霸權樣貌之顯現。²⁷倫理論述的生成即受到這些社會脈絡的框限，限定了作家進行論述之時能夠使用的資源。而這些文學場域動態與國家動員機制（特別

²³ 然而柳書琴在後續的博士論文（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及相關研究中不再採用轉向論，而更傾向強調臺灣人作家的迂迴抵抗性格。

²⁴ 李文卿，《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2010）。

²⁵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2013）。

²⁶ 陳淑容，《戰爭前期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成和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另一方面，井手勇對於在台日人作家的討論，則提到了田中保男在戰爭期支持戰爭的轉變，或可用「轉向」的概念加以分析。由於他與楊達的關係密切，這部分的人際關係是否造成楊達在40年代的一些轉變，值得注意。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

²⁷ 張文薰，〈一九四〇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臺灣文學學報》第19期（2011）



是 40 年代初期) 的實際關連, 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若聚焦於兩位作家在戰爭期的文學與社會行動, 一般論者往往將其界定為迂迴抵抗殖民者的策略作為。如黃惠禎分析楊逵的言行與文學作品, 認為在戰爭期他已經摸索出不觸犯言論統制, 又不違背良心的寫作方法, 並且主要在批判富裕階級, 為工農民眾發聲, 隱含左翼立場對殖民者的批判。²⁸又張季琳藉由小說〈增產的背後〉指出楊逵雖然配合當局的派遣行動, 一方面也在作品與言論中提出改善民眾文化與物質生活的建議。²⁹林梵的《楊逵畫像》寫到劇本〈怒吼吧! 支那〉具有以英美帝國主義暗諷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味, 還受到部分日本文化人的理解。³⁰而楊逵一些回憶文章則更描述到藉由與政府自由派人士的合作, 發表具有批判意味作品的經過。³¹

張文環部分, 柳書琴討論到由於張文環政商關係良好, 面臨「被動員去動員」的情境下, 以「雙聲」的寫作策略, 在奉公的名翼下書寫消極、私己的一面, 展現出「假公濟私」的抵抗策略。³²游勝冠則視張文環作品對鄉土山村的關注為抵抗殖民現代性的隱喻, 而將支持戰爭的言論視為言不由衷。³³總和來說, 以往論者討論兩人的迂迴抵抗策略, 多強調楊逵的隱喻性的諷刺, 是在階級視角上抗拒官方的視點, 甚至暗諷日本號稱共存共榮的帝國主義。而對張文環則強調其挪用奉公以為消極的姿態, 以及關注民族文化, 遠離殖民者同化。若區分具國策性的公共言論與文學作品來看, 則可以發現楊逵的議論與作品的詮釋向度較能一致, 張文環支持戰爭的言論則常被認為與文學特徵差異甚大; 若以倫理性的角度來看, 楊

²⁸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 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09a), 頁 134。

²⁹ 張季琳,〈戰時下の楊逵——「増産の蔭に」をめぐって〉,收錄於藤井省三等主編《台湾の「大東亞戦争」》(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2002), 頁 130~143。

³⁰ 林梵,《楊逵畫像》(台北: 筆架, 1978), 頁 135。

³¹ 楊逵多次在回憶演說中,提及《臺灣時報》的編輯向自己邀約具有批評時政意義的作品,還引起政府內部的紛爭。參見楊逵,《楊逵全集》(台南: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2001)。頁 19、29。

³² 柳書琴,《荊棘之道: 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 441~453。

³³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 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臺北市: 群學, 2012)。



遠似乎較常以階級作為定位的焦點，而張文環則傾向於民族本土文化的復歸。

然而，野間信幸綜合張文環的文學、社會行動與奉公言論加以考察，認為張文環的確同時存在著為台灣文化奉獻，以及支持戰爭等多面性，當中有被迫做出的宣示，也有受到內化的價值意識。要言之，環繞著「建設台灣文化」的意念，存在著從鄉土文學書寫到支持戰爭以提升台灣地位的不同層次可能。³⁴但野間的論述較傾向於描述現象，尚未解釋清楚其中機制為何。另一方面，劉紀蕙則從張文環的奉公言論找到戰爭時期皇民化論述的「純淨、陽剛、秩序」等邏輯，亦即是透過對殖民現代性的慾望與追求，從「新文化」的論述中建立國民性。³⁵然而由於缺乏對張其他涉及鄉土、女性的論述，以及文學作品之分析，這種論斷便不免有將其扁平化的危險，也不免在解釋其作品的美學觀點時捉襟見肘。這些研究指出張文環對於戰爭動員有依附的一面，並且將其置於連貫性的解釋框架中，給本論文很大的啟發。

陳淑容的文章以楊遠的摯友入田春彥和武者小路實篤的關係為線索，討論楊遠的「首陽園」實踐和「新村」理想的關連性，是人道主義式的田園勞動型態，但又有獨善其身的性質。不過在 40 年代戰爭動員下「增產報國」的符碼之中，楊遠還是必須回到人與人真誠以待的溫情之中，消解國家的動員倫理。³⁶而徐俊益的碩論研究一面肯定楊遠在非常局勢下，依然於大東亞共榮的論述暗藏批判的同時，也不免困惑這樣的論述策略是否依然增強了殖民者動員的正當性。關鍵即在於楊遠禮讚勞動的創作與議論，有時候甚至與國家的動員論述難以區隔。這可以說是再進行抵殖民的「分裂」工作時，又必須借用殖民語言的「依附」之下的矛盾困境。³⁷這種情況在他數篇為發表的未定稿中特別明顯。³⁸在此也看見戰爭動員

³⁴ 野間信幸，〈張文環の戦争協力と文学活動〉，收錄於藤井省三等主編《台湾の「大東亞戦争」》（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107~122。

³⁵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

³⁶ 陳淑容，〈失落的「新村」？楊遠、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臺灣文學學報》第 18 期（2011）

³⁷ 徐俊益，《楊遠普羅小說研究——以日據時期為範疇（1937-1945）》（台中：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塑造的倫理論述在解讀楊達的思想與作品之重要性，以及他如何在這樣的限制之下進行努力。不過這些研究多半僅止於指出殖民論述與個人理念的矛盾，對於「國家」作為霸權的特殊性並未及措意。



另外，邱雅芳關注皇民化時期臺灣人男性作家如何運用女性的形象，表達對臺灣民族或鄉土的象徵。她區分卑微的臺灣母親、慈愛的日本母親、堅韌的大地之母等形象，認為這反映了保守的父權心態，但對於楊達〈萌芽〉、張文環〈夜猿〉中以堅毅女性角色傳達對於鄉土與左翼思想的關懷，抵抗殖民者的動員，仍給予肯定。³⁹而張文薰的博士論文分析張文環〈山茶花〉、〈地方生活〉、〈泥土的香味〉、〈雲之中〉等小說，指出作者喜好形塑古典傳統的女性形象，其實是對比於知識份子主人公的近代教養，頗有藉此營造張文環自身的鄉愁美學之態勢，而他筆下這些近代知識份子，也終究追尋著理想的田園生活，而非純然的民族復歸。描寫藝妲的〈藝妲之家〉及其他反娼的社會議論，也傳達出張文環的父權保守性格，以及社會實踐力。⁴⁰由此可見，女性本身就構成一種論述的符號與資源，性別因而交織於作家使用的國家、鄉土、階級等倫理論述之中。從這個觀點，有助於理解楊達如何藉由女性意象表述階級問題，以及張文環對理想鄉土的想像，是理解其倫理論述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戰爭期的「轉向」的相關研究方面，前述垂水千惠的研究指出呂赫若的小說作品在〈清秋〉此一描寫知識份子的第一人稱小說之後，開始出現「轉向」的軌跡，朝向生產性、建設性為重的書寫態度，產生出勤勞為國、消弭階級差異的國策作品，與親近左翼思想的知識份子心中被動員的「最適狀態」(proper form)

論文)，頁 154~157。

³⁸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24。

³⁹ 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臺灣男性作家的女性呈現（1937~1945）〉，《臺灣文學學報》第 3 期（2002）

⁴⁰ 張文薰，〈植民地プロレタリア青年の文芸再生—張文環を中心とした『フォルモサ』世代の台湾文学—〉（東京：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国語中国文學專攻博士論文）。



有關，⁴¹國家動員的語言收編了階級、鄉土的理想。這篇小說與楊逵同為情報課囑託作品的生產文學〈增產之背後〉有可以對讀之處。而〈清秋〉這篇作品呈現出追求近代性的知識份子，在時代的氛圍下戴上孝道、為鄉里服務的假面之矛盾情緒，⁴²也可以與張文環數篇知識份子回鄉的小說參照思考，討論作家運用鄉土作為符號加以論述，並非僅是民族認同的體現，而可能有更多與國家體制的曖昧關係。除此之外，陳偉智討論吳新榮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態度轉向支持戰爭，是感受到新歷史階段的開啟，認為吳氏展現了將台灣視為黑格爾式的「非國家社會」

(non-state society)，超脫了既有國族框架之思考方式。這樣的觀點與前述大東亞共榮圈的討論略有不同，試圖以台灣為中心，卻去除民族主義框架的視角，思考台灣人知識份子在大東亞戰爭的立場。⁴³

最後進行「倫理」的概念如何應用於臺灣文學研究的回顧。正如前述，倫理在近代東亞的傳播與重構，實則與知識份子積極地吸收轉化西方文明，以及其反動有關，特別是蘊含了國家的對個人的治理馴化問題。前述劉紀蕙論文對於皇民化運動下臺灣人知識份子的反應，指出這突顯了傅科所謂「倫理主體從屬的規訓治理過程」，是殖民地知識份子對於現代性慾望的展現。⁴⁴戰爭動員預設的倫理問題因而可以說是荊子馨所言，皇民化邏輯的主體責任要求。這樣的結構是否有鬆動的可能，是李育霖在《翻譯闖境》一書中試圖探索的。⁴⁵他所說的作為倫理的「技藝」，特別針對臺灣人日本語作家如陳火泉、周金波、王昶雄、張文環、龍瑛宗等⁴⁶「皇民文學」的生產者，指出他們在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時，必然經過翻譯的過程，試圖轉化那些不可化約的異質性，此時翻譯者處於「延異」(difference)產生

⁴¹ 垂水千惠，〈呂赫若文學中〈風頭水尾〉的位置——《決戰小說集》及其他軌跡〉，《台灣文學學報》第3期（2002），頁23~26


⁴² 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1998），頁135~156。

⁴³ 陳偉智，〈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收錄於柳書琴主編《「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頁7~30。

⁴⁴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

⁴⁵ 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2009）。

⁴⁶ 有趣的是，即使曾寫作派遣文學〈增產之背後〉（1944），但楊逵並不在他列舉的皇民文學作家之列。



的沈默空間，處於個體身體與群體接觸相接的權力場域所在，因而得以探索在強制同化的殖民結構下之倫理可能。這種「生存倫理」突顯了在殖民者的意識型態牢籠之中，被殖民者雖然往往被規訓為服從的「倫理主體」，在皇民化永遠不可能抵達「完全」的困惑糾纏之中，仍存在著往「域外」(the outside) 逃逸的可能。他參考酒井直樹的意見，認為這樣的翻譯書寫存在的差異性，往往指向一個國族或主體性的集體性論述建構，但這樣的集體建構往往反而掩蓋了原本的不可化約性，因而提倡「游牧主義」的解讀可能性。在此我們可以指出，作為日語世代作家的楊逵與張文環，也必然面對「翻譯」臺灣文化的困境，甚至在軍國主義修辭籠罩的情況下，如何將自身的理念透過戰爭的語言轉達給預想的讀者，也可以說是一種翻譯。如何可能在文化翻譯的衍異之中開放出從霸權逃逸的可能性，是值得思索的問題。然而，這樣的研究是以殖民情境下的文化問題作為思索重心，仍容易忽略「國家」的特殊性，其實與殖民的文化情境層次有別，牽涉到戰爭動員體制的實際政策、社會問題等，並非單純的文化或認同問題。並且將殖民／被殖民預設為倫理上的對立項，可能忽略了歷史情境下不同行動者的主觀認同差異，從而同質化了這些社會行動的意義。回到實際的論述語言分析，亦即作為研究對象的「倫理論述」，而非將倫理作為先驗的分析立場，將焦點從「價值對錯」轉往「場域」，從而得以具體考察行動者如何在戰爭動員的體制中具體實踐，是一條待開闢的路徑。

總而言之，前行研究對於戰爭期台灣文學的戰爭動員意識型態、鄉土倫理、階級意識、性別問題等視角都有所涉及，不僅說明了戰爭動員下的結構限制，也試圖挖掘台灣人作家的能動性，一定程度反省了早期葉石濤、林瑞明等人秉持的二元性倫理立場，甚至思索「轉向」的可能性。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在既有的楊逵、張文環研究中未必有適當的對話。以柳書琴對張文環的討論為例，她對於張文環的作品與社會行動採取了二元性的倫理視角，而放棄了大東亞共榮圈、轉向等分

析概念的可能性。⁴⁷黃惠禎分析楊逵在戰爭期的思想言動，也有重視個人的能動性勝過戰爭動員結構的傾向。⁴⁸這些論者雖然皆意識到戰爭體制的重要性，但在個別作家論述上，最終皆認為行動者透過陽奉陰違、隱藏本心等作法，保留了無論是階級或民族的純淨認同。這樣的問題不只牽涉個別論者的偏好立場，而是反映了在方法上，戰爭動員或文學場域等結構問題難以與作家作品研究達成互動辯證的關係。不管是如何解釋作家對於戰爭動員的態度，社會結構往往被看做分離於個人意志的存在，而非相互形塑。

然而，楊逵與張文環的作品及言動並非純然反映作家個人的主動與否，而更牽涉霸權結構的滲透與協商。前行研究已經從皇民化、戰爭動員、文學奉公等角度討論這兩位作家面對國家政策的各種抵抗或依附面向，其實都牽涉了對於「倫理」的定位，是將倫理作為分析工具，測度他們在戰爭動員下的倫理實踐，並加以評價。本論文則希望先將價值判斷暫時懸置，此時作家進行論述策略的「倫理論述」作為分析對象而浮現，我們才可以在不被先驗決定了善惡的歷史情境中，考察楊逵、張文環如何運用既存的道德規範及思想資源，形塑自身的價值決斷。在此，倫理論述扮演著結構與個人之間媒介的位置，行動者無法簡單的超越霸權語言，霸權語言也無法機械地決定行動者的解碼可能。這樣的霸權語言內存在著日本帝國這個獨特的「國民帝國」不斷訴諸國民義務與權利的普遍性，卻又不斷建構殖民母國優越性的矛盾，因此界定出「國家倫理」的面貌，有助於瞭解台灣人作家在戰爭動員下思索的因應策略。以下將透過實際的概念界定，討論本論文的研究方法。

⁴⁷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⁴⁸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運用

對於「國家倫理」的界定，牽涉到日本帝國的國家性質。山室信一提出的「國民帝國」概念，說明了日本帝國在打造自身作為「一視同仁」的國民國家正當性的同時，也致力於維持內地與外地差別狀態的矛盾。⁴⁹他認為，「國民帝國為世界帝國與國民國家的持續擴張，但同時也是兩者對彼此的否定的表現，因此具有矛盾與雙面性特質。……國民帝國本身無法否認作為國民國家的應然狀態，而此一事實可能被殖民地用以反駁帝國本身。」⁵⁰在戰爭期，由於對戰爭動員的需求提高，國民國家的理念被強烈標舉，台灣的法律大致完成準用內地的階段，也廢除公學校等差別待遇的制度。在「內台融合」的口號之下，其實仍存在著民族間的政經不平等，然而國民國家講求的平等、正義原理，也成為同為國民的台灣人得以論述的資源。「國家倫理」指涉的便是在戰爭動員的情境下，人民具有為國效命的義務，但國家在理念上仍有義務施行平等與正義的倫理關係。雖然前行研究多強調軍憲的強制力，然而本論文認為若涉及精神史的層面，有必要使用霸權的概念，討論國家在道德倫理上的正當性基礎。

本論文所使用的「霸權」(hegemony) 概念來自葛蘭西，相較於過往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經濟化約論，認為經濟領域決定了人們的社會行動，只要在生產方式上進行變革，階級的解放便會水到渠成，葛蘭西則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領域的相對特殊性，在其中佔主導地位的是霸權，因而革命的計畫也必定包含了對於霸權形式的分析，以及對它的奪取。⁵¹事實上，為掌握霸權的領導地位，支配階級必須生產出一種讓社會其他從屬和結盟階級能夠接受的世界觀、哲學和道德看法。⁵²可以說，國家如何打造作為戰爭動員正當性基礎的倫理論述，即是霸權的一

⁴⁹ 山室信一，〈國民帝國日本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臺灣史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2009)，頁 1~22。

⁵⁰ 山室信一，〈國民帝國日本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頁 3~4。

⁵¹ 波寇克，《文化霸權》，頁 42~48。

⁵² 同上註，頁 60。



種展現。葛蘭西更在對於知識份子的分析中點出，看似獨立於國家社會之外的現代知識份子，其實也往往是憑藉著特定支配集團的餵哺而得以再生產，不管是依附於封建的地主和農民階級的「傳統知識份子」或依附於現代國家和企業的「有機知識份子」，都往往扮演了生產「霸權」論述的角色。⁵³

葛蘭西的分析指出了知識份子、霸權論述和國家之間有待被釐清破解的曖昧關係。以日本的殖民統治來說，立基於殖民現代性的霸權語言不斷被操演，衍生出「同化」、「皇民化」等政策與論述，一邊強調同文同種下日本帝國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差異，一邊又設定了日本與殖民地間現代化的絕對鴻溝，藉以達成對台灣人的支配。⁵⁴那麼值得進一步探問的問題便是，在戰爭動員的情境下，是否有一種根基於此的霸權形式被生產出來？在林繼文的研究中，30年代台灣的農業統制與地方政治改革收編了菁英階級的反抗力量，而戰爭下進一步的經濟統制、軍需工業化也加強了台灣菁英份子的從屬性，在南進政策的發展之中，甚至以台灣人成為中介進行經濟控制。⁵⁵但這仍不足以說明在「道德—哲學」層面的支配形式。荊子馨比較「同化」和「皇民化」的差異，認為「皇民化」的特殊性在於將「同化」的責任從殖民政府丟到個人身上，要求主體自身為這個隱藏在「同化」與政經不平等間內的鴻溝負責。在這種必須對天皇與帝國抱持感恩與感激的要求之中，政治與階級的矛盾被簡化為認同的確認，「不當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覺才會應運而生。⁵⁶在戰爭動員的邏輯下，對於動員的服從成為對皇國報答的重要表態，皇民化的運動也因而不僅是民族認同的問題，而更牽涉到對於殖民現代性的接受與否。⁵⁷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包括象徵性的政治參與、權利平等、教育、衛生等等改革，因而成為與皇民化／戰爭動員不可分割的動員形式。另一方面，延續自30年代以來強調國家主義，對於個人主義或資本主義、西方帝國主義保持敵視的意識型態，

⁵³ 葛蘭西，《獄中札記》（北京：人民出版社），頁418~435。

⁵⁴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2006），頁49~52、49~52。

⁵⁵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1930-1945》（台北縣：稻鄉，1996），頁157~163。

⁵⁶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頁172~181。

⁵⁷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



透過強調農村、礦場、工業的增產價值，鼓吹社會互助的機制，也從某方面接管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訴求，對於受過左翼思想洗禮的知識份子產生一定程度的吸引力。⁵⁸甚至在女性的角度，更可以看見這種勞動、壓抑的意識型態，如何與家庭父權的話語產生共謀關係。⁵⁹ 必須思考的是，這種霸權形式如何以「倫理」的面貌出現於大東亞戰爭的動員情境之中？

若回到近代東亞的脈絡，「倫理」的概念的確有其特殊性。誠如子安宣邦所指出，近代在東亞漢字圈以各種形式被討論的「倫理」，是透過日本學者的理解，將西方的倫理學（ethics）經過古代詞彙「轉用再生」式的轉譯而誕生，具有作為學術性格的善惡判斷學問，另一方面，則因而召喚出與之相對抗的傳統日本道德論，問題是，這兩種倫理學都在近代日本學者與國家的密切關係中發展為以國家為目的的「國家道德論」，國家預先決定了人們如何生活如何良善的前提。⁶⁰而劉紀蕙更透過討論梁啟超、羅振玉、李春生等近代知識份子的倫理論述、翻譯，指出流佈在近代東亞的倫理論述，其實是主要成分以社會或國家為單位考量的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將「心」視作可計量、治理對象的基督教心力觀。⁶¹總而言之，不管是討論「倫理」或「道德」，都不能忽略它在近代東亞歷史中與新興民族國家生成間的關連性，亦即國民性的問題。這些東亞的知識份子對於倫理的論述，其實正是希望打造一種價值判斷的邏輯，使得國民主動贊同、協助國家的倫理秩序。這即是前述劉紀蕙討論皇民化的思想如何將被殖民者打造為為溫馴的「倫理主體」之邏輯。可以理解的是，皇民化時期大量膨脹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倫理要求，正是戰爭動員需求下的產物，界定倫理價值的話語也因而成為霸權的具體形式。

⁵⁸ 垂水千惠〈呂赫若文學中〈風頭水尾〉的位置——《決戰小說集》及其他軌跡〉

⁵⁹ 楊雅惠，《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新竹：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5~91。

⁶⁰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與兩種倫理學〉

⁶¹ 劉紀蕙，《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頁 69。



然而，柄谷行人思考倫理的兩面性，正是在這樣的限制之中尋找突破口：個人的生存意義在這樣的倫理意義中被所屬的群體預先決定了，即「作為共同體規範的倫理」，但透過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柄谷指出，做為主體的個人，往往都是被外在的規範與條件所制約而行動，然而正是在這樣的限制之下，「追求自由」才成為「倫理」的另一面意涵。也就是說，「倫理」在此兼具兩個性質，可能是作為共同體規範的倫理（倫理 A），或者是在確認種種規範束縛的限制之下，依然尋求將自身的「自由」作為至上命令，以及同樣注重他人的「自由」，將別人視為「目的」而非僅為「工具」的倫理位置（倫理 B）。⁶²然而，柄谷並非認為共同體規範的「倫理」，以及追求主體自由的「倫理」間毫無關聯，而是相信真正的倫理問題必須被放置在個人和他人的辯證脈絡中，以互為主體的方式方能顯現，否則就有可能陷入僵化教條的道德危機。本論文將借用這樣的思考理路，透過倫理的兩面性，討論張文環與楊逵在國家塑造的動員倫理下的能動或保守性格。

問題是，行動者要如何將原本作為群體規範的倫理，轉換為自身價值判斷的倫理論述？這就牽涉到不同倫理規範之間的拓樸學關係，彼此可能共生、牽制、甚至相互反對，存在難以排解的矛盾。在張文環與楊逵的作品與社會議論中，可以看到幾種處於不同社會脈絡的倫理規範在作用著，這些規範可能來自於國家、傳統漢人家族、左翼理想、性別身份等等，彼此之間的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不同情境與考量下有變化的可能。例如國家對於婦女的動員宣傳，就一方面強調勞動的重要，又特別注意不去動搖婦女在家庭中的從屬性。⁶³在張文環談論參與志願兵，必須「建設新的家庭，要把舊家庭的污濁一掃而去」的言論中，則可以窺見國家動員與家庭孝道不免齟齬之處。⁶⁴這些不同型態的倫理規範，其實便是行動者身處的複雜社會脈絡，以不成文的群體規範之形式存在著，卻可能成為個人或組織在論述上的資源，或者其必然限制；例如作為戰爭動員工具的「國家倫理」，

⁶² 柄谷行人，《倫理 21》（台北：心靈工坊，2011），林暉鈞譯。

⁶³ 楊雅惠，《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頁 85~91。

⁶⁴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b）第 6 冊，頁 104。



或是對於漢民族認同的「鄉土倫理」，或作為父權意識型態的「家庭倫理」、作為貧富階級意識的「階級倫理」等。然而這些倫理規範的關係既非絕對，當行動者將其作為論述資源取用之時，它也被賦予了有別於原本脈絡的意義與關懷。在這篇論文中，為方便將張文環與楊逵的倫理論述進行比較，⁶⁵對其倫理論述的層次分類為「國家倫理」、「鄉土倫理」、「階級倫理」、「性別倫理」等，這些倫理論述與原本作為團體規範的倫理有一定的關連性，卻往往在兩位作家的論述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以下將進行簡單的界定闡述。

首先，在前述的討論之中，是將「國家倫理」作為日本這個國民帝國行使霸權的具體形式，牽涉到現代化、戰爭動員、國民國家的理念等等。加以討論，那麼楊逵與張文環如何將這樣的倫理形式進行轉化？在戰爭期的小說作品之中，楊逵往往以「清除英美毒素」的口號解釋小說中對於腐敗公務人員、投機份子的描寫。而在其他社會議論之中，則往往標舉「改善民眾生活」作為符應大東亞共榮圈、皇民理念的實際目標。強調國家作為實現正義的義務，對於私己慾望的排斥，是楊逵在戰爭期討論國家倫理的重點。而張文環主要集中在社會議論的國家倫理陳述，則是指向了現代國民性的養成、以及在戰爭中實現「忠孝一條路」、「男子本懷」等主張，因此與現代化、以及殖民地人民平等的追求有密切關係。對於國家倫理的論述，往往與其他的倫理論述密切相關，因國家動員體制本是此時期知識份子不能不面對的問題。

關於鄉土倫理，往往指涉了對比於現代化的傳統文化價值，而不僅限於實體的鄉村。台灣在經過二二零年代對於鄉土文學、文化的論爭，在戰爭期展現出來的鄉土倫理論述，則與「從鄉土愛到國家愛」的忠君教育、第二次近衛內閣在大政翼贊運動下的地方文化運動、東洋民俗學的知識建構等國家體制等有著密切關

⁶⁵ 在此必須說明，就兩位作家的實際用詞而言，張文環較常使用的是「道德」這一詞彙，而楊逵則鮮少使用「倫理」或「道德」等詞，但「倫理」在此使用的定義較為寬泛，本論文將依循「界定、陳述個人與群體如何互動的價值判斷之論述語言」的定義加以開展。



係。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不注意鄉土倫理與父權家族的密切關係，相對於尋求個人自主性的現代化思潮，鄉土倫理往往指涉了更穩固的家族關係。眾多論者討論張文環的作品，往往使用鄉土倫理加以定位，這也的確是他時常使用的論述策略：針對充斥物質慾望的社會進行批判，而寄託於傳統漢族倫理的復歸。另一方面，楊逵對於鄉土倫理的表述，則往往與階級性無法分離，例如他在民俗台灣的相關文章，以及在小說作品〈模範村〉(1937)描寫從東京留學回來的地主兒子反叛了他的父親，藉而找到在農村捲起革命的可能性；劇本〈父與子〉(1942)則透過忘恩負義的資本家與貧苦私生子的對立，將階級的意識與血親的倫理問題結合。鄉土倫理在這裡的表述，已經成為兩人進行社會批判的重要媒介，而不僅只限於民族認同的色彩。

雖然階級意識與倫理很少被人並舉，⁶⁶然而正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社會主義的理想其實與倫理的要求不可分割，因為有了對於每個人的尊嚴的要求，社會主義才会有別於追求社會利益極大化的資本主義，彰顯為理想的目標。⁶⁷其他的前行研究則指出，戰爭期的日本在意識型態上反對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在「健兵健民」的要求下，也形成了近似福利國家的體制。⁶⁸必須思考的是，即使是將戰爭作為最終目的，戰爭動員的確產生了對於弭平貧富階級的理想要求。在這種背景之下，楊逵跟張文環一方面在左翼思想取得資源，一方面也運用國家對於弱勢照顧的理念，而形塑關於階級的倫理意識。例如楊逵在小說〈無醫村〉(1942)中對於窮人家雖在大城市卻得不到醫治的描寫，訴求醫療資源的公共化、〈天狗退治〉(1943)中對於鄉間地主以高利貸欺壓佃農的批判，都是在呈露國家對於弱勢群體的保障顯有諸多缺失，也延續了一直以來的左翼意識。而張文環在〈迷兒〉(1943)、〈頓

⁶⁶ 這裡的階級指的並非是馬克斯所嚴格定義的，以生產工具為區分的概念，而是較寬鬆的界定，指的是較貧窮或弱勢的群體，而相對於擁有財富，且與權勢者關係密切的特權階級。例如工廠工人、佃農、小自耕農、小商販、商店伙計等等，這樣的區分比較符合當時的知識份子，在實踐上之視角。

⁶⁷ 柄谷行人，《倫理 21》

⁶⁸ 參考高岡裕之，《總力戰体制と「福祉国家」：戰時期日本の「社会改革」構想》(東京都：岩波書店，2011)。

悟〉(1942)中對於城市裡靠著微薄收入生活而時常需仰人鼻息的市井小民也多所描繪，並藉此批判見錢眼開的富人群體，但相對之下，張文環的左翼意識顯得更加模糊，而更關注傳統倫理與個人立身處世的問題。



而對於張文環與楊逵的倫理論述中不時出現的女性形象，實際上與男性知識份子我群自我定位有密切關係，在此選擇以「性別」作為界定兩者關係的概念，並且由於接受現代化教育與思潮的知識份子，往往以有別於傳統漢人家族的倫理觀界定男女關係，因此在此特別設定出「性別倫理」的範疇。例如如張文環在〈山茶花〉、〈地方生活〉等描寫臺灣鄉土的小說，或其他反娼的社會議論中，常對女性投以父權性的倫理目光，形塑傳統謹守婦德的古典女性形象，批評具有現代性教養、或熟諳都市生活的女性，然而同時也期待女性在不失去母性溫柔的前提下，能對現代社會有所理解，如同小說〈泥土的香氣〉描寫的在都市中努力操持家務、又能與知識份子明晰論辯的理想女性形象。楊逵在小說〈萌芽〉中也展現了類似的意識型態，故事中的母親在丈夫因故遠離的情況下，對於自己迷失於風塵的過往有所反省，而帶領兒子一同領會勞動的價值，回應了丈夫作為知識份子的期待。因此「性別倫理」的意義並非僅限於父權的問題設定，也包括了「有機知識份子」的啟蒙理想。

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上述的倫理論述樣貌，由於戰爭動員的情境下，是對於國家的諸多倫理要求之回應，因而皆與國家體制產生密切的關係。相較於前行研究多將日治末期戰爭的動員視為來自「帝國」的召喚，本文則通過「國民帝國」的概念，試圖強調來自於「國家」的體制面，可能往往有更強烈的動員可能性。例如不論是附和、轉化、抑或迂迴抵抗，皆突顯了與張文環與楊逵在戰爭前不同的思考路徑，例如張文環對於國民性、戰爭的強烈意識，以及楊逵對於國家正義性的訴求等等。因此前述「轉向」的概念，來自於國家強制性對於個人思想轉折的影響，在此也成為重要的分析視角。

通過以上的概念界定，已經大致鋪陳出本論文的問題設定與研究方法，接著將簡單介紹實際使用的分析文本作結。



在文本分析方面，將會以戰爭期張文環、楊逵的小說作品、社會議論、以及其他雜文為主，旁及未公開發表的手稿，或是戰後的修改版本與回憶文章，作為「精神史」考察的依據。⁶⁹然而在文學作品方面，考量其本身仍有美學考量與文學的邏輯，因此將其視為與作家思想相互交涉，但仍有相對獨立性的文本，給予另外的評價標準。亦即，並不以思想價值或者是否忠實反映作家本意為評量基準，而是考量其受到當代及後世讀者進一步詮釋的可能性，以及在文學或文化場域的特殊成就，作為思考的重點。對於「倫理論述」此一概念，更能夠藉此以文學價值的多層次閱讀，豐富其解釋可能。雖然這樣的路徑並非純然的文學研究，但毋寧可以在精神史與文學的跨領域交互考察之中，期待激盪出特殊的火花。

另一方面，為進一步對戰爭期作家面對的社會語境進行分析，除了參考前行研究，也會實際分析張文環與楊逵頻繁發表文章的一般報章雜誌，除了《台灣文學》、《台灣文藝》、《台灣藝術》等純文藝與通俗文藝雜誌，為了瞭解兩人的社會議論，也會留意例如在台灣的刊物包括，日刊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興南新聞》、總督府發行的《臺灣時報》、皇民奉公會的《新建設》、評論性刊物《台灣公論》等，內地的刊物則必須注意《大阪每日新聞》的「台灣版」，是重要的交流管道。這些刊物不僅是各種議論和作品發表的媒介，也具現了當時的台灣人知識份子如何運用與形塑倫理論述的平台空間，背後也拉出了實際的人際網絡。

⁶⁹ 然而未在當時公開發行的手稿或事後的回憶，必須視為次要的材料，而經由多重證據的檢驗來確定其重要性。



第二章 殖民地的戰爭霸權與台灣人作家的「轉向」


第一節 台灣戰爭體制的建立

(一) 從民風作興運動到總動員法

作為大東亞戰爭在台灣的前史，讓我們先從中日戰爭正式啟動前的三零年代（1931~1937）開始。三零年代是臺灣文學雜誌蓬勃發展，文學運動「狂飆」的年代，但同時，社會政治運動的分裂、解散、保守化也發生在此一時期。例如台灣共產黨、台灣民眾黨於1931年遭檢舉解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改走保守的地方自治改革路線，卻終究在1937年不敵軍國主義的壓力下解散等。箇中原因，除了殖民體制本身帶來的矛盾，使得民族運動的路線遭到當局強烈取締，也不能忽略日本在步入「國防國家」的過程中，與訴求政治經濟整體變革的左翼社會抗爭有著必然的衝突。因此，接續著二零年代末期日本內地對左翼運動的嚴格取締，台灣總督府也在1929~1931年間對左傾化的社會運動進行大逮捕。⁷⁰正如作家王詩琅在〈沒落〉、〈十字路〉等小說中描寫運動份子在現實的逼迫下紛紛「轉向」，文學運動「本格化」的同時，也暗示了社會改革實踐的越加困難。本章主要目的在討論殖民地台灣在三零年代戰爭體制的建立過程，以及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在行動上應對，以及背後反映的思想歷程。在這個時期，中日戰爭尚未正式吹起號角，但殖民政府已經意識到台灣的戰略地位而開始進行建立戰爭體制的準備，若用近藤正己的說法，在「人力」與「人命」的動員之前，殖民政權先進行的是「人心」的動員，亦即先進行戰爭意識形態的改造、相關文化霸權的穩固。⁷¹

⁷⁰ 1929年2月12日，總督府為搜捕臺灣共產黨分子，逮捕臺灣農民組合幾乎所有重要幹部，1931年2月18日臺灣民眾黨遭解散，同年間臺灣共產黨遭到全島性的搜捕，組織崩壞無以為繼。

⁷¹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林詩庭譯，頁31。



在 1930 年代出現的「國防國家」理念，可說是日本合理化大東亞戰爭的重要思想基點。經歷大正民主時期政黨政治的形成、社會運動的熱絡與左傾、農村經濟動盪解體，加上 1929 年左右的經濟大恐慌，此時軍方與革新官僚等右翼勢力逐漸相信，國家必須增加對社會的進一步管制，杜絕腐敗與激進的思想，以維持安定，並且因應經濟危機，必須進一步擴大在東亞的勢力，掌握更多的資源與利權。此即藉由區域經濟的整合來維持日本帝國政權的安定。⁷²1931 年爆發的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內閣只能事後追認少壯派軍人的軍事占領行動，卻也無法明確向中國宣戰，中日關係由此進入非戰非和的曖昧狀態，突顯了軍部的勢力已經脫離內閣掌控，後者只能努力控制局勢避免擴大戰局，⁷³然而經歷濱口、犬養、齋藤實內閣等右翼暗殺事件，政黨的力量實已式微，取而代之的統治力量，則是 30 年代末期形成軍部、革新官僚與新興財閥的複合體，透過軍事、國家統制、資本家的力量企圖實現「國防國家」的總力戰體制。值得注意的是，「革新官僚」在三零年代崛起，代表的便是社會主義的理念被國家體制所吸納，轉而以集權體制實踐理想的路線。⁷⁴正如鶴見俊輔的「轉向論」指出，由於日本戰前知識份子的養成背景、以及國家體制的刻意收編，造成大量原本投入社會改革的知識份子在 30 年代開始經歷一連串的「轉向」變化，轉而支持軍事體系對社會的動員。⁷⁵由於鶴見等人的分析框架並非是從「殖民／被殖民」的二元論出發，而是指出日本現代知識分子在國家強制力下產生的各種思想轉折歷程，毋寧值得與接受殖民母國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狀況進行參照比較。從 30 年代初期「國防國家」理念的誕生，到 1938 年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可以說確立了日本帝國的戰爭總動員體制，由意識形態為磚瓦鋪設的驛道，使政治制度的集權化水到渠成，不僅徹底動員了帝國本土的民力物力，也消弭了殖民地人民政治反抗的空間，「戰爭」成為唯一可能的政治形

⁷² 李永熾，〈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形成〉。

⁷³ 鈴木隆史，〈日中戰爭〉，收錄於藤原彰、今井清一主編《十五年戰爭史》（東京：青木書店，1996），頁 3~45。

⁷⁴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1930-1945〉。

⁷⁵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台北：行人，2011），邱振瑞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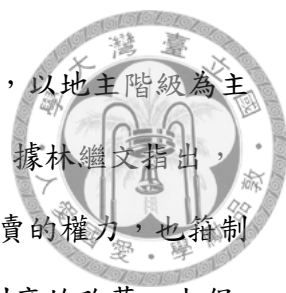
式。



台灣的戰爭體制之建立，則接續左翼運動的鎮壓之後，經濟方面採用統制措施壓抑本地地主勢力，政治方面透過地方政治改革收編原社會運動菁英，社會方面則開始了由官方主導的「社會教化運動」，加速對於地方社會的控制。此即林繼文所描述的「備戰階段」：雖然此時期日本帝國的戰略前線在北方，台灣僅扮演次要的角色，但總督府仍以經濟控制的強化、政治運動的壓制確立對台灣民間社會的掌控，以因應即將到來的戰爭。⁷⁶雖然一般的歷史認識將七七事變視為日治末期台灣政治狀況的重要轉捩點，這樣的分期有一定的真實性：由於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得原本斷續發生於中日間的個別戰事轉而為全面的戰爭；因應這樣的局勢，日本本土也展開總力戰的準備，企圖將社會全體納入戰爭動員的環節，台灣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國民總動員、皇民化運動等政治運動的高揚。然而，正如「十五年戰爭」這樣的理論概念所提示的，日本的戰爭體制之建立並非取決於實際的戰事有無，而是與一連串的東亞戰略佈局息息相關，早在滿州事變開始左右的二零年代，國防國家的理念與體制已經開始啟動。在殖民地台灣方面，雖仍未投入戰事，但已經在政府主導下開始進入備戰體制，為了北方的戰局而將台灣作為後勤基地而加以控制改造。隨著戰局的演變，華中華南，甚至以東南亞為主的「南方」也成為戰場，台灣的戰略性角色也因而快速演變，在總督府與軍方的力量交織下，牽動戰爭體制的鞏固乃至於崩潰。

殖民地台灣自 20 年代開始，即為了不平等的殖民政治展開一波波的政治運動。從台灣文化協會的誕生，到一次又一次的左傾，以及農民組合、工人組合，乃至台灣共產黨的出現，主導者始終為一批在新式教育下獲得知識與發聲權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有一定的經濟背景，因為敏感地接受到國際上民族自決、共產主義等思想浪潮，陸續形成政治性的團體展開行動；不可諱言，經濟上的優勢使得他

⁷⁶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1930-1945》，頁 47-104。



們得以成為推動台灣社會變革的「有機知識分子」，但另一方面，以地主階級為主的背景也使得這些台灣新知識分子受制於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據林繼文指出，總督府施行於30年代的米穀統制政策，擴大總督府對於米穀買賣的權力，也箝制了地主階級自清代以來的經濟活動形式。另一方面，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也促使這群知識分子由體制外轉往體制內的活動，雖然分得部分的權力，卻在殖民與戰爭體制的限制下，更難以翻轉殖民與被殖民的權力位階。即使在過往的抗日敘事中，往往強調殖民政府對於社會政治運動的嚴酷鎮壓，導指台灣人無法抵抗專制的統治，這種敘事卻往往忽略了殖民政府有意識地消解台灣知識分子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實力，正是日本法西斯主義崛起下，為了確立備戰體制的重要準備。

另一方面，為了將統治勢力深入台灣社會基層，總督府也在30年代在各地發起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本為日本為解決經濟恐慌下農村更生運動的一環，然而在台灣的情況，則需究明約於1932、33年間的眾多振興會組織出現的原由為何。官方透過教化委員、顧問的名義對這些組織加以控制，其奉行的要綱則主要為培養臣民／公民精神，強調集體生活的重要性。1934年召開的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則是由總督府確立了綿密延整的組織、以及台灣社會教化要綱等指導原則。1936則召開民風作興會議。蔡錦堂分析後認為，除了改姓名、志願從軍等是在皇民化運動後才出現，事實上這些30年代以來的社會教化運動，便是皇民化運動的前身。⁷⁷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前述活動不僅強調同化的必要性，也具有集體主義的性格，將國民的經濟與文化生活配置於國防國家的理念之下，並且營造了以國家為核心的倫理論述。這並非是純精神性的信仰框架，而是與具體的經濟與文化問題綁在一起，也就必然涉及了「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對於現代性的追求與期待，往往使地方的知識分子採取對振興運動採取配合的態度。以台南「鹽分地帶」知識分子對於佳里地區部落振興會運動的積極配合，藉以實施振興產業、

⁷⁷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前台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

生活改善、教育推行等例子可以看出，30年代開始盛行的社會教化運動，的確憑恃著「現代性」為利益的後盾，使得地方的知識分子也表現支持甚至主動投入，背後卻不免偷渡「貫徹皇國精神，致力於國民意識的教化，以努力扶助、奉持皇運」⁷⁸的意識形態。



近藤正己強調，殖民地台灣的最後一任文官總督中川健藏（任期：1932~1936）雖未如後任的武官總督小林躋造（任期：1936~1940）一般使用激烈的皇民化政策，但仍透過社會教化的方式，試圖使異民族「振興國民精神」、「明徵國體觀念」，以達到同化政策的目的，造成的影響未必遜於後者⁷⁹。周婉窈也指出，大約1920年到193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世代，因經歷滿載道德感、國家觀念的現代教育體系、以及激烈的愛國主義運動，而成為深受集體主義、戰爭美學薰陶的「戰爭期世代」⁸⁰。由此可見，在中日戰爭正式爆發前，殖民政府已經藉由民風作興運動、地方自治改革、經濟統制等政治與經濟手段，不僅馴化台灣本地領導階層，也結合文明教化的「殖民現代化」意識形態教養，企圖將殖民地台灣納入戰爭體制之中。

另一方面，隨著日本本土的政治情勢在一次次政變下，軍部愈加掌握大權，台灣的軍部勢力也隨之猖狂，促使殖民地台灣快速進入下一階段的戰爭體制。由於日本在30年代日本占領滿州、繼而退出國際聯盟，國際地位愈加嚴峻，台灣因其戰略地位受到矚目，台灣軍部的勢力隨之提高，並受到在台日人輿論的鼓舞。1935年發生的朱諾號（ジュノ一號）事件，來自荷蘭的商船為避颱風而未經許可停泊澎湖馬公，原本只是簡單的船舶法違規，在台軍部則主張此為間諜事件要求嚴懲，甚至逼迫司法界與總督進行退讓。近藤正己認為，朱諾號事件的發展標誌了台灣文官總督制的倒退，不僅強化了在台日人右翼團體的發展，也鼓舞了期望武官總督的輿論（雖然台灣新民報等台灣人輿論表示反對，但難以力挽大局）直

⁷⁸ 同上註。

⁷⁹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頁255。

⁸⁰ 海行兮的年代，頁1~13。



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武官總督小林躋造的上任。⁸¹

小林躋造雖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治台三策聞名，然而不能不說這三者的進行在前任的中川健藏任內便已進行，而惡名昭彰的「皇民化運動」與其說是總督府率先發動，不如說是在台日人輿論於 1936 年左右，對中日關係緊張下的過敏反應推波助瀾而成。總督府的政策施行主力，則是在 1937 年 9 月配合日本本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正式建立在台灣社會的戰爭動員行政體系。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組織小至基層部落，大至總督府，企圖利用此前已發展蓬勃的部落振興會等社會團體組織，建立一元化的戰爭動員體系。然而，正如江智浩所指出，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附屬於既有行政機關的色彩很強，在實際運作上，也延續了 30 年代的生活改善運動，強調農村與陋習的現代化。⁸²相較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全面總力戰，在地方政治的實踐中，戰爭總動員尚未成為壟斷台灣社會動員的價值觀；因戰爭尚在遠方，地方知識分子最關心的，也僅是如何在激烈的皇民化運動中找到推動台灣傳統社會加速現代化的施力點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運動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差異與關聯。蔡錦堂曾指出在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小林躋造、森岡二郎等總督府權力核心並未真正認可「皇民化運動」的概念，而僅將政策方向限定在中央發動的國民精神總動員。⁸³皇民化運動本產生於在台日人（包含基層官僚、新聞媒體、右翼團體）的輿論，事實上未必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認，因它牽涉了敏感的異民族「國民國家／帝國」如何統合的問題；第一次近衛內閣所策動的「精動」體制，目的本在確立行政一元化，企圖強化總動員體制，並促進由下而上的國民運動之發生，同化運動本非其措意的面向。⁸⁴因此，不能因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組織活動執行了皇民化運動的

⁸¹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頁 21~29。

⁸²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6~67。

⁸³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第 18 期（2007）

⁸⁴ 赤木須留喜，《近衛新体制と大政翼賛会》（東京：岩波書店，1984），頁 6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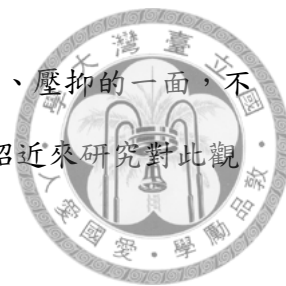
項目，如寺廟升天、國語常用、戲劇改良等，就認為兩者同源無別。正確來說，國民精神總動員是來自於內地中央意圖轉化軍方法西斯主義卻終於失敗的政治運動，皇民化運動則是來自於殖民地的日本人殖民者，因為在戰爭中感到腹背受敵的焦慮而發展出的殖民地法西斯運動。然而就結果來說，兩者具有一定的親和性，國民精神總動員扮演了將 30 年代較強調殖民現代化的民風作興運動，過渡至 40 年代初，揭櫫以戰爭為總目標的動員體制之轉化角色。皇民化運動到了 40 年代初的階段，也顯然更被整合進總動員體制之中，從強迫式的同化主義，進一步轉變為使被殖民者必須自發宣誓投入的法西斯運動。這樣的轉變則以 1941 年 4 月「皇民奉公會」的成立為重要指標。

（二）總動員體制與殖民地台灣知識分子

1937 年中日戰爭正式開始，總督府及台灣軍也更明顯地將台灣推上戰爭側翼，而非僅是後勤基地，具體措施如對中國海南島、南海區域的軍事圖謀、徵用軍伕至中國戰場等。在輿論方面，台灣人徵兵論浮上檯面，報刊媒體上中的漢文欄位被視為不合時局而大部份遭「自主」裁撤。值得注意的是，經過 30 年代前期的鎮壓與籠絡，此時在台灣知識份子的公共輿論中已經沒有漢民族主義發展的空間，反而在一些青壯年世代對於地方自治的參與、以及文化運動的轉向思考中，已經看得出 40 年代「地方文化論」的先聲。其內涵，就是帝國文化已經成為台灣地方文化發展之前提，東亞戰局的引爆，雖然也許帶來民族情感上的陰鬱，卻也可以看見期待台灣能藉由在戰爭中扮演中日間媒合的角色，進而提昇地位的希望。

因此，雖然我們無法否認戰爭體制的無視於殖民地人民在民族情感、身家財產上的非自願與強迫性，但也不能忘記殖民現代性的物質基礎與意識形態工程如何影響了被殖民者的世界觀與自我主體認識。許多前行研究從皇民化運動出發，

對此時期的文化生產現象做出詮釋，⁸⁵然而因為過度強調其禁制、壓抑的一面，不免忽略台灣知識份子在戰爭期政治運動中的能動性。以下先介紹近來研究對此觀點的重要修正，再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關於在戰爭期的皇民化運動，吳密察等人曾經指出，其實應該分成兩個階段來看待，依照其運動重心與台灣人知識分子的參與程度判然有別：前期約自中日戰爭到皇民奉公會成立前，後期則自「大政翼贊」運動開始至戰爭結束。前期的皇民化運動，主要推動者為在台日人群體，訴諸激烈的同化主義論述，台灣人知識分子處於尷尬的位置，只能在皇民化的陰影下訴求傳統社會現代化；但到了後期，雖然官方與在台日人的輿論依然是主要的推動力量，台灣人知識分子卻開始找到發展「地方文化」特色的論述空間，一方面訴求現代化，一方面也強調台灣的地域性特色，亦是戰爭動員的重要資源，內涵於皇民化運動中，具有強烈排他性的同化主義路線因而得以緩和。⁸⁶前述吳密察等人發展出來的「地方文化」概念，是研究戰爭期台灣文藝運動的重要洞見。柳書琴並以該書中「導論」提綱挈領，強調中央發動的「大政翼贊」運動，因為訴求「地方 vs 中央」、「農村 vs 都會」的二元性，殖民地知識分子藉此發展出「地方 vs 帝國」殖民地文化特殊性論述，促成台灣文藝運動的短暫再生。⁸⁷然而，這樣的論述太過強調一時的政治運動效果，甚而過度強調殖民的知識分子的能動性，而忽略了殖民地台灣的戰爭體制建立自30年代開始，若從總動員體制建立的角度來看，從「被動員」走向「自發動員」本就是合理發展的歷程。正如前述，因前期皇民化運動以在台日人為主體，雖然一時雷厲風行，但從戰爭動員的角度來看，還是得爭取到殖民的知識分子的合作，才能真正成功。因此正如前述，還是必須從「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到「皇民奉公會」間轉變的意義加以考察。

⁸⁵ 代表性的見解如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之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⁸⁶ 吳密察等，《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

⁸⁷ 同上註，頁1~48。



江智浩認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到「皇民奉公會」間的最大差異，就在於後者積極納入新世代的台籍社會領導菁英，達到擴大收編的效果。⁸⁸從台籍幹部或顧問人數來觀察，「國民精神總動員」各階層的領導者均由日人官吏擔任，台籍參與者多為中央本部與地方支部的顧問角色，「皇民奉公會」卻有意納入眾多台灣人的政商中堅，以及文化界人士，令其擔任中央本部與各支部的幹部領導。⁸⁹台灣人的菁英階層延續 30 年代的地方政治改革，進一步地被整合進入政治／戰爭動員體制，一方面希望藉由政治參與擺脫被殖民者的次等位階，一方面又不免成為戰爭體制的積極配合者。因此所謂的「地方文化」復興，也不免是國民國家／帝國在統合主義下的產物。

所謂「統合主義」(corporationalism) 意指國家透過一元化從地方到中央各階層的領導者，藉以掌握社會動員樞紐的統治結構；相較於此，民粹主義則帶有多少的不穩定性，往往需要具有特殊魅力的領袖發動，往往與激烈的民族主義有關。⁹⁰日本帝國在戰爭期的動員方式，是少數少壯派軍官策動政變帶動軍部激進化，以天皇為重要的象徵，從而使政黨與社會團體屈就於法西斯主義，帶動政府機構進行行政一元化的改革，可以說是「民粹主義」帶動「統合主義」的發展（二二六事件後的發展可謂鮮明之例）。⁹¹但在殖民地台灣，由於占大多數的被統治民族本非民族主義的主要傳播對象，總督府仍以統合主義為主要治理模式。從 30 年代的地方政治改革、民風作興運動，到 40 年代的皇民奉公會，可見其一貫的理路，乃是藉由提供政治機會給 20 年代以來崛起的台灣人菁英，讓台灣人在殖民體制中獲得有限的代表性，但同時也鞏固殖民政府的正當性，以及背後差異的政治結構。

綜觀從地方文化振興運動到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皇民奉公會結成的發展，

⁸⁸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頁 153。

⁸⁹ 同上註，頁 133~153。

⁹⁰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⁹¹ 安部博純，〈軍部・財閥・革新官僚〉，收錄於藤原彰、今井清一主編《十五年戰爭史》（東京：青木書店，1996），頁 141~182。

可以發現日本殖民政府在建立戰爭體制的過程中，無不強調對於台灣地方菁英的掌握控制，且有別於在 1920 年代前以舊式地主任紳階級為籠絡對象，在戰爭期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戰爭體制建立，已經轉為強調對受過新式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掌握控制。這些受過殖民者完整教育，甚至往往至帝都進行「朝聖之旅」

(pilgrimage) 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們，宛如面臨法農 (Franz Fanon) 所強調的「黑皮膚白面具」情境，受到殖民現代性與被殖民差別身份雙方的痛苦拉扯。⁹²在帝國總力戰的需要之下，他們被鼓勵盡力動員台灣的地方文化與社會，進而為戰爭服務。在本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見台灣戰爭體制的建立也許並非出自一連串首尾連貫的計畫，但始終關聯於日本帝國自滿州事變以來在東亞區域的利益維持，因此在意識形態或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的推動進程上環環相扣，有效地控制了戰時期的台灣社會。了解這樣的背景，我們才能更加理解台灣日語世代的作家們，為何不斷面臨著「方向轉換」的問題，他們又企圖透過這樣的轉換，在殖民地台灣發展出怎麼樣的路線實踐。

⁹² 弗朗茲·法農，《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7)，陳瑞樺譯。



第二節 尋找大眾：三〇年代文學運動的困境

(一)「方向轉換」下的大眾想像

相較於日本文壇在 20 年代末普羅文學的興盛，時常針對著前述國家機器與戰爭的問題而發，⁹³台灣同時期的文學發展則鮮少及於此，而更著意於對殖民地大眾的啟蒙。台灣在三零年代初的文學運動與左翼思潮、民族運動關係密切，但隨著「本格化」的過程，文藝優先於政治的趨向出現，日語世代的文學實踐也逐漸取得文壇主導權。由於政治氛圍的低迷、文學場域的變動，使得三零年代的文學發展存在著諸多隱憂。這樣的困境也可以解讀為殖民體制越加穩固下，以日本帝國為核心的國家霸權之確立。本節討論戰爭前的台灣文學界的被持續關心的「大眾問題」與國家霸權的關係：那個持續被尋找中的大眾，正是知識份子對於台灣社會發展的期許，以及國家進行殖民地社會控制的共通問題意識。

在日治時期文學運動的發展中，1930 年左右開始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戰可以說是重要的轉捩點。台灣文化協會成員黃石輝於 1930 年 8 月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文中揭發了「以廣大的勞苦群眾為對象」的鄉土文學理念，並強調需以台灣話作為建設台灣文學的基礎，所刊載雜誌即為臺灣共產黨黨員王萬得創辦之《伍人報》。同時期伍人報與《明日》、《洪水報》、《赤道》、《現代生活》等文藝雜誌的創立，正反應了 1920 年代末期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出現的左右各派系對立，紛紛利用外圍文藝雜誌進行宣傳主張的現象。這樣的話語競逐雖然一開始仍停留在黨同伐異的層次，但由於黃石輝鮮明地打出「鄉土文學」的主張，卻意外引發了一系列的論戰，促使台灣知識界的文藝理論工作在語言的殖民性、鄉土題材的發掘等層次有了進一步的思考。陳淑容的研究也指出，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戰反而使得論戰雙方有了合作的契機，終於形成台灣文藝協會、台灣文藝

⁹³ 如小林多喜二〈蟹工船〉(1929)中資本案壓榨力量的實際後盾便是軍艦。

聯盟等聯合性團體，促使文壇的活潑化，造成此時期台灣文學進入論者所謂本格化、成熟期的階段。⁹⁴



以往前行研究多認為這樣的轉折是來自於政治運動在殖民者鎮壓下的挫敗，而朝向文學領域的另謀出路。⁹⁵然而這種轉折，卻並非單純承繼原本政治社會運動的啟蒙性格，而是朝向通俗、藝術化、自我關照、文化建設等更多元的路徑發展。例如《南音》同人對於台語文字化的努力、追求純藝術的風車詩社、王詩琅對於知識份子自我社會處境的關照、新舊漢文人對於通俗文藝的努力，甚至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日語世代作家的進出日本內地文壇等，都在在說明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前，台灣文學發展的多元性，並不能純然以隱性的政治、民族運動囊括。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朝向通俗或純文學，此時「大眾」成為眾多關心文學文化發展的知識份子重要的話題。「大眾」在此主要指涉的是一群等待被開發的讀者人口，他們或是以目不識丁的勞苦工農的面貌出現，或是具有一定文化教養的市民階級的面貌現身，反應了當時文化界對於文學發展想像的異中有同。為了打開閱讀的市場，達到提升臺灣文化水準、啟蒙人民意識之目的，「大眾」的問題意識反映在題材、技法、語言等部分上，背後則有著政治左右光譜、文化新舊、以及政治方案想像的路線之爭。

趙勳達指出，30年代「文藝大眾化」的理念已然成為文學運動者政治正確的共識，然而在這個口號之下，卻有著對於「大眾」的分歧想像。對右翼知識份子來說，「大眾」指涉了在自由民主政治基礎上，作為新時代社會主人的普遍平民；對左翼知識份子來說，「大眾」則代表具有革命潛能的工農階級；在認同傳統文化的漢文人眼裡，「大眾」則具有較中性的意涵，藉此有意識地壓抑背後的社會變革想像。⁹⁶事實上，若詳細梳理從鄉土文學論戰開始的文藝大眾化論述，可以發現，

⁹⁴ 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

⁹⁵ 代表見解如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

⁹⁶ 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



這不僅牽涉到文藝的評論問題，更關係到不同論者對台灣社會改革的理念，這樣的精神延續了二零年代將文學作為社會改革工具的態度，然而卻也面臨了方向上的轉換。這裡的「方向轉換」指的是，相較於全意投入社會或政治運動，將文學創作視為副業，此時的知識份子則開始出現要求「方向轉換」，開始進行「建設」而非單純對舊文學文化的破壞之呼籲。如郭秋生在《先發部隊》的卷頭言所說：

當《伍人報》、《洪水》、《明日》、《現代生活》、《赤道》諸刊物相繼而起以現象台灣文藝界未曾有的壯觀的時代、雖是曇花一現，也許已為台灣新文學發生期的發展行程造就了最高的水準、同時刻印著台灣新文學的劃期的轉向期了……⁹⁷

這樣的期待強調以往文化界著重於批判性、破壞性，卻無法有確實的建設，固然是隨著文化運動逐漸擺脫政治社會運動附庸地位下自然的想法，卻也不能忽略在左翼運動陸續遭到彈壓的背景之下，臺灣知識份子對於未來方向的重新思索。如果說以組織工人農民、市民階級為型態的政治社會運動已經不可行，那麼這群在求學階段受到左翼思想洗禮，卻因為各種原因而必須放棄組織工作的知識份子，也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實踐理想的道路究竟為何？因此「方向轉換」的意義就不僅止於文化社會運動的轉向，也關涉到了台灣知識份子的「轉向」選擇。

雖然「轉向」一詞因為用於指涉左翼運動者背叛原先理想的用法而廣為人知，但若追溯這個辭彙的誕生，其實正是日本共產主義者山川均對於日本政治環境的嚴峻下提出的理論。山川均認為，由於當時日本的正式社會環境尚不容許共產黨公開的活動，因此提出「方向轉換」，將共產黨組織解散，意圖利用合法的社會組織發展實力，認為如此方能爭取到更多民眾的支持。⁹⁸因此轉向一詞本就指涉了在

文化思維及其角力》(台南：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26~38。

⁹⁷ 郭秋生，〈卷頭言〉，《先發部隊》第 1 期（1934）池田敏雄、莊揚林編，《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以下引用《新文學雜誌叢刊》版本不再註明。

⁹⁸ 藤田省三，〈昭和八年を中心とする轉向の狀況〉，收錄於思想の科学研究會主編《共同研究 轉向上卷》（東京：平凡社，1960），頁 33~65。

社會運動陷入困境時，在方針上轉換以爭取更多支持與實力的意涵。對山川均而言，「方向轉換」似乎並未涉及個人理想的背叛，而更是組織方針的變化。相較於此，台灣知識份子也面臨了此時期包括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共產黨等組織均告崩壞的困境，只不過相較於明確的組織方針，他們失去了組織，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作為一個個從社會政治運動脫隊的個體，他們更在意台灣作為後進殖民地的文化狀況，並且相信能夠貢獻一己之力於其中。

這樣的想像可以說繼承了 20 年代蔣渭水在〈臨床講義〉中，以台灣的大眾為醫治對象的啟蒙理想。⁹⁹問題是，當年蔣渭水本人所領導的台灣民眾黨、工友總聯盟進行的運動工作已經由文化啟蒙進展到工農群眾的自我組織與教育，在各運動組織陸續崩壞後，此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卻只能夠回到自己熟悉的知識領域中，企圖用啟蒙教育的工作提昇台灣的社會力，但因為失去實踐的運動組織以與殖民政府爭奪教化霸權，他們終究只能將這樣的文化工作推廣至少部份的知識階級群體，當激烈的法西斯運動奪得國家機器之後，也不免失去了存活的空間。

這就不免使得這樣的「方向轉換」具有知識階級自我安慰的性質，或是回過頭來進一步確立知識份子在啟蒙運動中的主導地位。本文並非要一筆抹煞參與 30 年代文藝運動工作者的功勞，而是試圖指出：由於與前階段社會政治運動之間的斷裂，導致此階段的知識份子的「轉向」本身蘊含有這樣的自我提問：在與殖民政府鬥爭慘敗之後，自己究竟還能夠對家族社會有何貢獻？這段慘烈的鬥爭經驗，自己是否能夠透過文學藝術的轉化成為台灣文化的養分？如果全面鬥爭解放的路走不下去，自己是否該思考與既有的殖民或封建體制進行磋商，繼而促成改革？如此，從落敗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自身位置輻射出來的視線，決定了此時期文學運動的主要性格：一方面抱持著延續自 20 年代啟蒙運動以來對「大眾」的關心，將其轉化為殖民地文學運動的本體論；一方面則關照殖民地知識分子（或曰接受新

⁹⁹ 蔣渭水，《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台北：海峽學術，2005），頁 3-6。



時代思潮的進步人士)的處境,不管是與封建家庭的鬥爭,或是在殖民體制下的徬徨自省。這兩種性格是一體兩面的,前者形塑的大眾面貌,往往來自於知識份子的價值立場,這樣的視線,又反過來強化了知識份子意識到自身作為殖民體制下客體的自覺,強化其欲爭取主體性的作者意識。

一開始引發鄉土文學論戰的黃石輝,原為左翼分子連溫卿主持下新台灣文化協會的積極參與者,並約於1930年左右遭逮捕入獄;據松永正義指出黃石輝的大力倡議鄉土文學,在1930年8月發表〈如何不提倡鄉土文學〉,此時明顯有文藝大眾化的思想,甚至因為考慮到與中國的交流而不主張台灣話文表記的徹底獨特性,卻於1931年7月的〈再談鄉土文學〉中轉而僅強調台灣話文表記的重要性,如此急遽的轉變應與政治鎮壓的背景有關。¹⁰⁰但若論起30年代對文藝大眾化的重視,黃石輝的論點明顯扮演著承接1927年新文協黨綱「促進大眾文化的實現」之角色,成為30年代文藝大眾化論述的先聲。而當論戰告一段落,同樣站在左翼立場的正反兩方共同結成的文藝雜誌《先發部隊》出現,除了葉榮鐘在發刊詞中以「文藝普遍化」呼應黃石輝的主張,郭秋生更進一步在〈解消發生期的觀念、行動的本格化建設化〉一文中強調「轉向」藉以「躍進」的文學新方向,重點即在於對於作者意識的強調:

產生文學作品的動力,盡在作家的情感,沒有從情感的燃燒裡誕生出來的文藝,不異於商店的賬條,而已是從作家的情感燃燒裏產生文藝,則文藝的素材,萬不過是表露作家的思想的一手段了。¹⁰¹

但是強調作家的情感表現是一回事,又要如何達到文藝大眾化的需求呢?郭秋生在文中大力批評過往「發生期」的文學陷溺在「反逆封建」的套路之中,缺乏適應於建設的、理性的時期所需要的新形式與方針,因此若要邁向建設的、本

¹⁰⁰ 松永正義,葉笛譯,〈關於鄉土文學論爭(1930~32年)〉,《臺灣學術研究會誌》第4期(1989)

¹⁰¹ 郭秋生,〈解消發生期的觀念、行動的本格化建設化〉,《先發部隊》(1934),頁24。

格的文學，就必須要更有意識的放入作者的意識與重視技巧。他以「查某間」的題材為例進行說明：



我們要看的，是能夠怎樣脫得強有力的魔手與獲得潑潑的生存權……雖然環境可以支配人生的鬪力與生活的意欲，也未嘗不可以變易環境，事故我們要看的，是只要能夠有熱烈的生活力，克服了冷遇的惡環境，以奏人生凱歌的新人物出現。¹⁰²

他並以北村壽夫的小說〈標緻的尼姑〉為例，舉出故事中尼姑因受到大學生的教育而體悟自身受禁錮處境，終於脫逃還俗，嫁給大學生的故事，作為寫作的參考。¹⁰³這樣的論點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反映了前述「文藝大眾化」與知識份子作者意識的一體兩面性：對於大眾題材的強調與敘說方式往往與知識份子自我期許的改革理想密不可分。以下說明 30 年代文學運動中幾種重要的文藝大眾化論述，以呈現「轉向」、「本格化」後的文學路線面貌為何。

自葉榮鐘至張深切的文藝主張，可謂代表了右翼知識份子立場的文藝大眾化路線。葉榮鐘於《南音》中主張文學須超越普羅、布爾喬亞階級，而以臺灣獨有的歷史、風土、人情統合大眾化的方向，他批評普羅文學發展到徒具口號的現象，已經不具有實際的意義。¹⁰⁴另外也於〈大眾文藝待望〉一文則強調藉由「大眾文藝」通俗、娛樂的性質，得以提昇一般大眾讀者的文化素養。¹⁰⁵至於張深切則是強調只有科學的態度與方法方能創造出真正屬於臺灣的文學。¹⁰⁶他們體現了所謂右翼資產階級式的自然主義式癖好，也展現了對文學本身「除魅」的自信心，相信藉由科學地解明臺灣的客觀特殊性，得以由此展望臺灣文化得以躋身於世界文化的樂觀情景。這種將臺灣文化與社會題材強烈客體化的思考路徑，忽視了作者

¹⁰² 同上註。

¹⁰³ 同上註，頁 21~22。

¹⁰⁴ 〈第三文學提唱〉，《南音》第 1 卷第 8 期。

¹⁰⁵ 〈再論第三文學〉，《南音》第 1 卷 9~10 合併號。

¹⁰⁶ 〈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2 期，頁 78~86、第 2 卷第 4 期，頁 94~99。

與「大眾」間可能存在的各種權力與社會關係，可以說掏空了「文藝大眾化」實際意涵，這裡的「大眾」事實上正是知識階級自我形象的映照，所謂啟蒙大眾，也是正是為了啟蒙殖民地知識分子自身，藉以重新調整面對社會政治運動崩壞後的社會體制。



相對於此，楊逵則提出鮮明的「真實的寫實主義」，批評左翼文學中空泛的派閥對立，以「殖民地文學」作為將臺灣文學連接於世界的關鍵概念，是強調帝國與殖民地的階級連帶之鬥爭性理念。因〈送報伙〉獲得內地左翼作家重視的他，透過弱小民族「殖民地文學」的自我標示，反而建立起跨民族的左翼性文藝集團《臺灣新文學》。¹⁰⁷楊逵所代表的左翼文學路線指向積極探究並改造現實的理想，在追求將現實事物以明確的概念進行形象化方面，也獲得文學運動的一大進展，如楊逵〈送報伙〉、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中臺灣農民土地被掠奪的戲劇性描寫、王詩琅〈沒落〉中對於在社會運動中失敗的知識份子之形象等。楊逵認為「會使大眾離去的是變質的作品，或藝術化不完全的作品。如果作品沒有變質，而且十分具象化地呈現出內容，大眾絕不會離去」¹⁰⁸，並提出「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與世界觀，積極地書寫知識份子、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等敵人及其同路的生活」，¹⁰⁹「文藝大眾化」的口號在他手裡已經擺脫了單純啟蒙的層次（也因此有別於口號式的普羅文學），而具有打破作者/讀者主客體對立的企圖，「大眾」並非單純等待被啟蒙的對象，作者必須去揣測讀者的處境，藉此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位置。陳培豐分析《臺灣新文學》的經營策略，認為楊逵有意識地爭取殖民地臺灣的讀者市場，企圖從遭到法西斯主義滲透的通俗文化場域搶回屬於左翼的地盤，可惜因為資金與人事問題終告失敗。楊逵的文藝大眾化論述，仍然存在著難以將作品由

¹⁰⁷ 《台灣新文學》創刊號進行的專題「對台灣新文學期待之事」的第一個問題即為「殖民地文學應走的道路為何？」

¹⁰⁸ 楊逵，〈屏棄高級的藝術觀〉，《楊逵全集》第九卷，頁176。

¹⁰⁹ 楊逵，〈藝術是大眾的〉，《楊逵全集》第九卷，頁138。

教養讀者推展至農工大眾的內在矛盾，¹¹⁰但其中對於農工讀者的意識與自我挑戰，代表了30年代的文學運動者已經跳脫工具性的普羅文學思考；進展到對於作者意識的自我辯證，可謂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成果。



另一方面，通俗性的大眾文學則伴隨《台灣新民報》的摩登化而進入台灣知識份子的創作與閱讀視野。以京都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生林輝焜執筆的《命運難違》為始，《台灣新民報》新聞連載小說的刊載，是模仿日本大眾小說之形式，以台灣的都會生活、知識階級的情愛故事的題材為主，並往往以名家插圖吸引讀者的感官享受。¹¹¹繼之而起，賴慶、阿Q之弟（徐坤泉）等作者不僅從事大量的通俗故事寫作，同時也展現了對於改革封建文化之啟蒙工作的關心。¹¹²雖然他們受到左翼思想旺盛的文壇諸家加以大力批判，但大眾文學藉由新聞傳媒及通俗題材的運用等利器，獲得了遠多於其餘標舉「大眾化」作家之讀者基盤，也是事實。¹¹³大眾文學作家對於台灣社會文明啟蒙工作的關心，顯現了他們並未以純粹的出版商業邏輯看待自己的寫作，甚至也未自外於左右翼知識份子的文學與社會運動潮流，而將之視為提昇台灣文化蒙昧狀況，趕上世界先進文明的途徑。「大眾」的位置在此與《台灣新民報》、《風月報》等商業傳媒市場息息相關，透過對於「讀者市場」的拓展與把握，大眾文學作家得以想像一群殖民地的新興中產階級，他們面臨傳統漢學與現代性文明的激烈轉換，卻共同以台灣社會整體的經濟建設、文化發展為念，在此背後的，即是以台灣地方自治同盟為主的右翼政治群體，因此作品內容雖然具有一定的獵奇性，但同時更具有強烈的保守道德意識，以符應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新興中產階級所需要的意識形態認同：否認以父母主導的封建婚姻合理性，但又在不動搖家父長制的架構下，訴求自由戀愛的可貴，

¹¹⁰ 陳培豐，〈殖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伙》、《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

¹¹¹ 柳書琴，〈《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2期（2012），頁5。

¹¹² 例如賴慶參與民俗改革團體「大溪革新會」的寫作、林輝焜在《命運難違》中放置大量的時事議論，均為明顯的現象。

¹¹³ 柳書琴，〈《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

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知識份子的自我獨立。¹¹⁴



李承機對於 30 年代臺灣「讀者大眾」的研究指出，就傳媒發行的量而言當時僅有「臺灣新民報」有可能承擔起屬於臺灣特殊的言論媒介此一角色，然而在日刊化之後，臺灣新民報捲入以日本內地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市場中，愈加受到日本大眾文化的滲透。¹¹⁵這也突顯了，不管在台灣左翼、右翼知識份子的文藝大眾化論述之中，都存在著無法實際對識字大眾或工農大眾產生影響力的現實落差，唯一具有商業讀者基盤的大眾文學，又在文學運動者的排擊中無法取得正當性，甚至有與官方意識形態同化之嫌。¹¹⁶因此所謂的大眾化論述，同時也是知識階級對於自身理念與焦慮投射的一面鏡子，成為此時期台灣文學運動發展的基調。有別於 20 年代文學運動萌芽期的強烈工具性格，作者意識顯著地發展，得以更加深入地書寫封建家族問題、殖民地知識青年的徬徨焦慮、都市摩登生活等不同題材，並且吸收日本內地的文藝思想，藉以期許屬於台灣的新文化進展，得以不落伍於世界文明的發展。由此可以看見「方向轉換」的確是此時期投身文學運動知識份子的重要懸念，「文藝大眾化」之所以成為主導性的口號，可以說是身處殖民地現代化進程中，積極引領台灣地方社會的「等身大想像」，¹¹⁷企圖跟上日本、中國等國家「先進」文化狀況的問題意識所致。然而由於在殖民體制下台灣的文化狀況與日本帝國的動向息息相關，這場文化運動的開展也不免多所掣肘，屬於台灣人的文藝場域逐漸成形，卻難以抵禦日本文化透過教育體制與商業市場的全面滲透，同時，從帝國內地輸送進來的文藝思想，更成為台灣初步形成的文學場域背後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¹¹⁴ 發行量遠比不上《台灣新民報》的《風月報》，反而正是在結合追求現代化與維持傳統文化的結構上（傳統漢文、白話新文學、刺激性話題、保守道德勸語）將其明確具象了。

¹¹⁵ 李承機，〈日本殖民地統治下「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苦悶」——在「抵抗日本統治」與「經營新聞媒體」之間〉，收錄於《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 1932/4/15～5/31》（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

¹¹⁶ 陳培豐，〈殖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伙》、《國王》、《水滸傳》〉。

¹¹⁷ 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



(二) 日語世代作家之登場

「日本國的擴張即意味著日語的氾濫。以我這小小的個人的城堡來說，要防備這種氾濫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我在生活中使用日語這件事實一樣，以日文來寫日記亦是極為自然的事。想一想，我打從一出生就已經是日本統治下的人，而前半生完全是接受日語的教育，此極為重大的事實，令我說的是日語，並以日文書寫。這又與英國讀書的留學生說英語、寫英文的意義是不同的。我寫日記只為了記錄我的生活，所以想要了解我的生活的人，又以我個人最容易使用的語言來寫，這也是理所當然的。」¹¹⁸

或許殖民地文學的本質就是必須在殖民母國的強勢語言與文化中寸步難行，正如伊格頓（Terry Eagleton）提醒的，文學本身必然是國族主義的。¹¹⁹如同英語文學對於前殖民地文學如印度、緬甸、澳大利亞的忽視與排斥，是為了維繫殖民宗主國的地位不被挑戰，法農（Fanon）也揭示了殖民主義以包裝著現代性的文化教養工程，摧毀了被殖民者自身的文化尊嚴，夢想以殖民者的文學藝術為自己的文化養分澆灌養分。30年代的台灣文學提倡中屢屢可見以文學藝術提昇生活的呼籲，而其框架竟是來自於殖民主義的現代生活，巫永福的〈首與體〉可為例證。殖民地知識份子對此並不乏抗拒，因此方有《三六九小報》等漢文人繫斯文於小道的群聚，亦有郭秋生、賴和等人台灣白話文的創作實踐，漢文教育之存廢履為台灣輿論界訴求的議題，然均難以動搖帝國的文化同化政策。殖民地台灣作為日本帝國明治憲法成立後的「新附領土」，擁有中華帝國的傳統文明、與南島語系的部族文明，卻因歷史因素未及參與中國國族主義打造的進程，因而也未發展國族主義文學，直到1920年代殖民政府放棄「特殊統治主義」，受到同化主義的刺激，加以政治社會運動之形勢高漲，台灣人開始想像屬於有別於日本的國族主義

¹¹⁸ 引自《吳新榮日記》1938年1月4日記載。吳新榮，〈吳新榮日記〉，網址 <http://taco.ith.sinica.edu.tw/> (2015.5.6 徵引)

¹¹⁹ 泰瑞·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2005），頁37~46。




文學，但由於「民族上無法被日本支配，政治上無法被中國支配」（黃石輝語）的歷史特殊性，而呈現紛雜的台灣文學方案想像。台灣的知識份子從未放棄以自己的方式邁入現代，問題是，日本帝國所代表文明形象在他們眼裡太過龐大又便利，在「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帝國」的兩種選項之間，其實已經隨著教育體制與文化場域的確立而難以辨別彼此。¹²⁰因此，既然 30 年代的文藝大眾化論述是以對農民、工人、市民、小手工業者、識字階級、封建階級等形形色色「台灣大眾」的啟蒙為核心，就無法迴避「啟蒙的資源來自何處」的問題，積極吸收並效仿西方現代文明的日本帝國，因而成為台灣知識份子無法忽視的對象。武斷的說，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歷史，可謂台灣在地知識階級從抗拒日本現代性輸入（背後轉介著象徵世界文明的西方文明），到積極吸收內化的歷史。

台灣知識份子的日語世代形成於 1920 年代初期，正是撼動同時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使得具有主觀意義的世代得以形成。¹²¹此時也開始出現少數的日語文學作品，如極早期的謝春木〈她將往何處去〉（1922）。但日語作家群體的真正出現，則與昭和初年日本的普羅文學運動密切相關。《福爾摩莎》文藝青年本脫胎於普羅文學運動組織「納普」，但在日本左翼運動崩壞之際左翼色彩漸淡，自帝國中心以承繼台灣留學生民族運動、與日本第一手左翼知識武裝（其實已經是第二手、第三手，問題在於本土發展左翼傳統的努力被劣等化了）而得以強勢地介入台灣文壇（台灣文藝作家聯盟—台灣新文學這樣的譜系）而這樣的世代發生無法起自於在台左翼運動的跨民族連結，例如黃石輝《伍人報》、別所孝二《台灣文學》，無非說明了左翼運動在殖民地台灣的尷尬處境，以及台灣日語世代作家的誕生，本就與殖民現代性蘊含的優劣階序有掛勾糾纏之嫌：來自帝都的左翼、民族運動竟比起發生於在地的反思力量，更具有被台灣文壇接納與協助存續的正當性。

¹²⁰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

¹²¹ 參考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但這並不代表張文環、巫永福所代表的福爾摩莎集團作家是獨特自外於台灣文藝場域的一股外來力量，相反的，自日本內地輸入民族與左翼思想的知識路徑，正是台灣知識階級自 20 年代以來愈加鮮明的結構趨勢，作為社會政治運動「轉向」後成果的文藝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劉捷在 1935 年一篇題為〈臺灣文學的鳥瞰〉¹²²的回顧性文章中將台灣文壇的復甦歸因於日本文壇的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其實正是日本文壇在普羅文學的廣泛性政治運動浪潮後，文學家重新歸位於文藝創造之現象。但相較於日本近代文學自明治末年以來的發展，台灣近代文壇的發展此時尚在初始建設期，最基本的文學前提元素：「語體」甚至尚未出現統一的典範。如同前述，30 年代文學運動的轉捩點正是針對文學使用語言應當使用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文而發，與此同時，傳統漢文的創作仍然具有一定延續力，顯示了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未能進入民族國家進程而產生的語言、文化複雜性。不管是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或傳統漢文，都並非國家正規教育體制教授與訓練的對象，因此企圖以此發展近代文學的新知識份子們，也就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慢慢實驗著能夠傳達現代性思想、表象近代殖民地社會、又能為殖民地大眾所閱讀接受、統合被殖民民族的文學語言。這樣的過程，非預期性地產生了所謂的「殖民地漢文」，兼具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甚至部份日語的語法與詞彙，作為此時期文學語言的主要型態。¹²³雖然殖民地漢文生產出若干足以標誌日治時期文學里程碑的作品，但卻在 30 年代中後期遇到了瓶頸。主要的現象，即是日語文學作品在質與量上的增加，已經逐漸壓倒了漢文作品。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陳培豐認為在殖民地漢文發展的過程中，缺乏對於世界文化的翻譯鍛鍊，造成其本身難以如日文或中國白話文一樣得以表達近代式的思考與感覺，因此失去了作為近代文學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可說是明晰的洞

¹²² 《臺灣文藝》1 卷 1 號

¹²³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史研究》第 15 卷第 4 期（2008）



見。¹²⁴由於台灣人知識份子往往具有公學校以至於中學校、日本留學等教育經歷，接受世界思想與文化的途徑，也已大量仰賴積極翻譯世界知識與文化經典的日文出版物，即使有少數台語的翻譯工作，又大多僅是作為啟蒙失學民眾之用的工具性格，因此殖民地漢文在先天發展不足、後天又發展失調的情況下，自然難以於文學場域上與日文霸權相互匹敵。這樣的過程可說證明了語言同化教育的政治性，台灣人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同化於文明」策略，並無法阻止殖民地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下本土文化的被衝擊與邊緣化。

除了殖民地語言霸權此消彼長，內地文壇的場域影響也是重要的背景。進軍中央文壇，以此實績確立於本島文壇的聲譽地位，可說是 30 年代以後許多重要的台灣人日語作家如楊逵、張文環、呂赫若、翁鬧、龍瑛宗等人的共同軌跡。事實上 30 年代台灣文壇的發展，除了在文藝典範、創作理論等知識資源上多來自於日文的作品或翻譯，而以 1934 年楊逵的〈送報伙〉獲選文學評論獎項為始、張文環、呂赫若、翁鬧的陸續得到日本文壇認可，更掀起了一股文學青年企圖進軍內地文壇的熱潮。

這樣的情景對於把「同化」當作獲取現代知識文化之工具的台灣知識分子來說，也許是圖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發展的必經之路。然而正如同和泉司指出的，殖民地作家在 30 年代被內地文壇認可，其實與內地知識份子的異國想像、或者引進新刺激以解決文壇危機等原因有關。¹²⁵與殖民地文壇的「中央文壇志向」相對應，內地也存在著「殖民地熱」，問題是雙方的需求未必合拍，甚至可以說是同床異夢。相較於台灣的知識分子意圖藉由內地文壇的認可與資源挹注，為「轉向」後的文化運動提昇能量，內地文壇卻往往只能侷限於帝國中心的視野，給予教條的左翼訓示，或異國情調的看待，雙方的交流難以深刻。而這樣的矛盾也在 1937 年龍瑛

¹²⁴ 陳培豐，〈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收錄於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190~237。

¹²⁵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 — 〈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東京：ひつじ書房，2012），頁 127~164。



宗的獲獎中被暴露出來。無法忍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以落後、難以進步、熱帶風土等意象描繪台灣鄉土，卻獲內地文壇青眼看待的台灣輿論，突顯了殖民地與帝國核心知識份子間的心結糾葛。而在此之後，也未再有台灣人作家以「進軍內地」之姿於中央文壇認可下揚名立萬，到了40年代，部份台灣人作家如黃得時甚至打出「台灣文壇建設論」的旗幟，展現出反對「中央文壇志向」的姿態。¹²⁶然而不管如何，前述的內地文學場域影響之結果，台灣文壇的坂塊也逐漸由30年代的多語並呈，到日本語文學佔據明顯優勢，而後1937年新聞廢用漢文欄政策下，更是順水推舟地已經確立了日語文學及作家在台灣文學場域中壟斷性的地位。

台灣人知識份子對語言同化政策背後的帝國意識型態並非沒有警覺，自20年代以來，他們試圖透過舉辦講演、創辦刊物、改良創造台灣話文、訴求漢文教育的延續等方式，為本土文化找到一線生機。然而在新知識分子階層的生產過程中，追隨世界先進文明的現代教養，已經成為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與物質基礎。這當然與近代東亞接受殖民現代性的歷史經驗密不可分。日語在殖民地社會形成的權力機制，並不僅止於對於既有本土文化的戕害，並且更進一步地，在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形成的權力結構之中，透過大眾媒體的形成與成熟，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也獲得廣為傳播的途徑，使大眾成為帝國戰爭動員的潛在對象。正如佐藤卓己對於大眾雜誌《King》的分析指出，嫻熟於資本主義的商業操作，使得《King》得以在日本大眾讀書市場中確立難以動搖的國民性地位，但也因此成為法西斯主義發展的溫床。¹²⁷在30年代的台灣，不僅類似《King》的內地讀物獲得廣泛的接受，顯示此時日語讀者市場已然成型，新聞雜誌也為了搶奪大眾讀者的市場而面臨激烈的經營策略競爭，台灣知識份子也意識到必須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方能真正地掌握大眾、動員大眾，否則空有理念也無法傳達。相較於此，漢文讀書市場則在政府的嚴格控管、強勢市場競爭，以及知識份子的世代交替之下愈加萎縮。可

¹²⁶ 參見黃得時，〈台灣文壇建設論〉，《台灣文學》1卷2號。

¹²⁷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国民大衆雜誌の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3）。



以說在 30 年代大眾媒體市場的形成之下，更鮮明地促使具有民族意識的台灣人知識份子，為了實踐其「文藝大眾化」的理想，反而必須借助殖民者同化教育下形成的讀者大眾市場，可謂弔詭。

縱前所述，台灣人日語作家世代出現的重要意義究竟為何？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漢文文學的衰落、日語文學的取而代之為當然是民族運動受到壓制的最好證明，因此必須考察這樣的轉換是否涉及「民族意識」或「反抗意識」的轉化或繼承，日語世代作家也因而往往被從中國或台灣的民族意識形態加以特別檢視。另一方面，後殖民主義式的研究則強調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日語作品對於「日本語文學」此一正統概念的挑戰，以及其中對於殖民關係的顛覆潛能。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強調了國家機器（亦即總督府，或者具有憲法統治地位的日本帝國）對於殖民地文化的切斷與扭曲，造成日語世代的不得不誕生，也因此文學運動推動的意義上，台灣知識份子的角色難以被明確評價。但透過陳培豐對於語言文字表記與近代文學型態間關係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文學運動」本身就是鑲嵌在十九、二十世紀東亞現代化進程中的脈絡之中，與日本帝國、中國等帝國主義與民族國家權力交互關係密不可分。¹²⁸在殖民地台灣，面臨的是黃石輝所言「政治上不能由中國支配，民族上不能由日本支配」的矛盾現象，接受現代思潮的知識份子們所推行的文學運動，同時也是大量資源皆來自於先進國家的現代化運動，日本尤為「脫亞入歐」的先驅，自然成為師法的要角，進而形成如前述文藝場域霸權的現象。台灣人知識份子為了推行殖民地社會的現代化運動，並且作為前述「轉向」後的運動型態，便不得不主動參與進入這樣的場域運作之中，再針對台灣的特殊情境對文學運動的型態加以轉化。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運動方向雖有「文藝大眾化」的政治正確共識，在實際的行動上，卻因為路線左右或結盟政治、世代等意識型態、社會位置差異而顯得步調並不一致，甚至互不相讓、彼

¹²⁸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

此攻訐的情形。然而，因為台灣人日語世代作家的形成，他們在文學場域甚至學院位置都逐漸佔有不可忽視的位置，也使得與在台日人的共同的文學場域基盤成為可能。此不僅預告了戰爭期（尤其是進入四零年代之後）台灣文學場域的基本樣貌，也顯示了三零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困境，不僅來自於殖民政府的直接鎮壓，更與台灣作為東亞後進殖民地的知識份子文化意識、文學場域霸權、媒體市場等問題密不可分。瞭解這點，我們也才能更清楚知道楊逵、張文環——這兩位以日本語作為主要文學實踐工具與場域的知識份子，是在怎樣的結構限制下發展各自的文學、思考與社會實踐。





第三節 張文環的回鄉之路

(一) 徬徨於帝都的左翼青年

如果說 30 年代初期，台灣文壇的形成是由於政治社會運動挫敗後的「轉向」所引起，那麼張文環——這位日後回台扮演戰爭期台灣文壇組織要角的作家，當時還是上京沒多久的弱冠少年——又在帝都面臨了怎樣的社會運動浪潮？張文環出身台灣嘉義梅山，家裡小有田產，主要從事竹紙加工業，畢業於梅山公學校後即到日本留學，1931 年才到東京，進入彼時活絡的左翼文藝社群。據現今資料顯示，張文環並未進入其自稱的岡山中學，在東洋大學學歷部份，也可能僅是旁聽而非正式入學。¹²⁹這意味著張文環十分清楚內地學歷在文化與社會資本上的意義，並且有意識地加以操作。在當時學運湧動的背景，類似的學歷謊報情形應該頗為常見，因在學潮之下往往造成學生被退學或自行脫離常規學業，導致中輟的情形。但這並不意味著學歷在殖民地台灣就失去意義，相反的，因為日本長期的穩定統治，導致台灣的殖民地菁英普遍投入國家教育體制，日本的學歷依然成為社會上重要的資本，雖然民族壓抑的結構仍然普遍存在著，但顯然同時並未有其他的機制可以與它競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享同一套文化資本顯然有助於殖民政府的統合主義運作，但在近代東亞情境下，東京的學院節點也串連起東亞諸國異議分子的交流網絡，張文環正是活躍於其中，逐漸發展他與日本、中國、台灣左翼文藝運動者的關係。

日本文學運動的發展，在 20 年代末達到普羅文學盛行的高峰。由於一次大戰後戰間期累積的社會矛盾並未順利排解，此時期民生凋敝、租佃與勞資爭議頻生、

¹²⁹ 參考藤澤太郎，〈金川中学校から見える「都市」、岡山と東京と——張文環・岡山時期の学籍問題を出発点とした台湾人内地地方留学生の意識をめぐる論考〉，《櫻美林世界文学》第 6 期（2010）、野間信幸，〈張文環の「父の要求」について〉，《東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紀要》第 3 期（1995）




失業率高居不下，日本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運動也隨著共產第三國際的指示下狂飆而起，奉行國際革命即將到來的「第三期理論」，強調對於文學藝術領域的共同戰線鬥爭，1928年5月「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略称ナップ）因而成立。同時期中野重治與藏原惟人的「藝術大眾化」論爭，代表著左翼思想作家對於文學自主性的堅持，以及政治宣傳至上兩者間的對立，但終究在共產黨再建、左翼運動激進化的浪潮之下，前者主動放棄，將自身的理念獻給政治運動，藏原惟人並在1931年11月高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組織論，提出在學校、工廠、農村各地建立分層式的左翼文藝細胞組織的circle，創立「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聯盟」（簡稱KOPF）。此時日本共產黨已在1928、1931的連續大規模逮捕下面臨崩壞，這樣的行動一方面正是重建共產黨組織的努力，但因為一方面奉行激烈鬥爭社會民主派、自由主義者的「多數者獲得」路線，也造成腹背受敵的艱困處境，在國家的強力鎮壓下難以維繫組織，反而更促使以普羅文藝為大纛的文學理念逐漸失去領導的力量。¹³⁰

1932年3月成立的「東京台灣文化サークル」前身為台灣民族運動重鎮：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亦屬於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聯盟的細胞分子，藉由與日本左翼文化運動組織的聯繫，以延續發展1929年鎮壓後瀕臨潰散的在京台灣左翼學生團體網絡。這也是張文環於今日史料可見參加左翼運動的開端。柳書琴認為在此之前，張文環應該已經與主導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相關團體有所接觸¹³¹，這也可以說明後來張文環後來與台灣新民報社的楊肇嘉、羅萬俔、吳三連結識的機緣為何。¹³²然而相較於前述人士的右翼穩健立場，張文環卻選擇加入了具有左翼色彩的「東京台灣文化サークル」，雖然不知詳細過程為何，但畢業於台中

¹³⁰ 栗原幸夫，《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平凡社：東京，1972），頁154~202。

¹³¹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2001），頁248。

¹³² 同上註，頁549。然而柳書琴的說法亦缺乏實際資料佐證，且據周婉窈，自1932年起請願運動即已邁入衰勢，因此解讀上也未必須強調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對張文環的影響，重點仍是以《台灣青年會》、《台灣新民報》為主的人際網絡。周婉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台灣史料研究》第37期（2010），頁2~31。



師範學校後上京，與王白淵、林兌等左翼運動者保持密切聯繫的吳坤煌應該是重要的牽線人。在 20 年代末東京的台灣人社會運動，也複製了島內左右翼鬥爭對立的框架，台灣青年會中社會科學研究部一派於 1927、1929 年的兩次奪權，即與台灣新文協、臺共分子的活動有密切關係。¹³³張文環遊走於左右兩派之間，應是知識青年仍在眾多政治浪潮中心意未決的表現，但相對於林兌、吳坤煌等左翼青年的路線堅持，他的左翼傾向的確是較為隱晦不明的。然而成立後不到一年，成員葉秋木、林兌因參加 9 月 1 日朝鮮反帝震災遊行被捕，組織因而瓦解，經過三次準備會之後，才終於在 1933 年 2 月成立臺灣藝術研究會，但經歷激進派魏上春、柯賢湖、吳鴻秋、林添進與穩健派張文環、吳坤煌的對立衝突，¹³⁴實際參與運作的成員已有保守化傾向，部份成員如蘇維熊、巫永福等人更是興趣在文學藝術更多，而非左翼運動。7 月發行創刊號的「フォルモサ」傾向於純粹文學藝術的創作與研究，失去了激進的性格。雖然時間較晚、形式不同，但在東京的臺灣青年知識份子也的確和島內一樣踏上了「方向轉換」的道路。

《フォルモサ》創刊的 1933 年，日本的普羅文學運動正面臨崩壞的境地。伴隨帝國政府對コップ成員的大規模逮捕起訴，普羅作家林房雄經歷「轉向」出獄，發表〈作家のために〉一文，對昭和初年以來成為文學運動教條的普羅文藝路線表示不同意，引發小林多喜二、宮本顯治等普羅文學指導者的批判，預告了文學運動轉向期的來臨。¹³⁵1933 年 2 月，小林多喜二遭特高警察逮捕，遭刑求慘死，普羅文學運動頓失領頭人。6 月，日本共產黨領導人佐野學、鍋山貞親發表〈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的轉向宣言，引發轉向風潮，同年末約九成獄中的共產主義者宣告轉向。¹³⁶日本共產運動在文學、政治戰線的重挫是顯而易見的。雖然這成為

¹³³ 王詩琅，《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1995），頁 70、81。

¹³⁴ 林添進甚至於 1932 年 11 月 27 日的王白淵抵東京的歡迎會中批判張文環接受楊肇嘉資金、以及不堅持林兌的政治路線等，但受到王白淵的袒護，更加深了激進派與穩健派的對立。同上註，頁 101。

¹³⁵ 平林初之輔等，《現代日本文學論争史·中卷》（東京：未來社，2006），頁 529~542。

¹³⁶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作家卸下教條與政治運動的重荷的契機，是形成日本文壇「文藝復興」的條件，而以各方派別聚首的《文學界》創刊為指標，但同時文壇亦存在極大的陰影，「轉向」與背叛與否的爭辯，以及思想的虛無化等現象後續浮現。¹³⁷然而此時期在東京的「フォルモサ」同人似乎自外於左翼運動的困境，以「純文藝」為旗幟，建立起與島內文藝社群「臺灣文藝聯盟」的聯繫，十分積極地活動著。

有趣的是，福爾摩莎發行雖不到一年即停刊，發行量比起同時期島內其他文藝刊物亦是小巫見大巫，但依然吸引了島內不少作家的投稿，確立了日後福爾摩莎同人成立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的基礎。張文薰認為，對於此時的台灣人作家而言，獨自之「文藝」尚未建立，自無法如日本文壇一樣算是「復興」，但《福爾摩莎》確實提供有志於各方文藝的青年——無論其方向是在研究或創作、寫實或浪漫、革命或感覺——一個伸展身手的空間。¹³⁸據現有的資料顯示，從東京台灣文化circle至東京支部的團體活動，可說是戰爭前台灣人青年在東京積極從事左翼、民族色彩活動的最後紀錄。柳書琴的研究積極考索了在1930年代初期以東京為節點的帝國（日本）—殖民地（台灣、朝鮮）—半殖民地（中國）間左翼知識份子的文化交流活動，吳坤煌顯然是串連其中的要角。相較於吳坤煌對於《福爾摩莎》純文藝路線的不耐煩，¹³⁹張文環不僅接下《福爾摩莎》的編務，負責資金來源，一方面更穩定經營與台灣島內文藝界的關係，同時一定程度涉入了中日台的左翼知識分子交流網絡，終於奠定日後戰爭期在台灣文壇的領導地位，和吳坤煌浪跡東京、上海、台北、北平的經歷，努力尋求政治運動實踐空間的姿態正好形成對比。形象一點的說，這正是在30年代的歷史情境下，台灣人知識份子面對日漸高漲的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間藉由個人移動而做出的政治選擇：左翼或是右翼、國際還是民族、體制外或是體制內？

¹³⁷ 平林初之輔等，《現代日本文學論争史·中卷》，頁529~542。

¹³⁸ 張文薰，〈1930年代臺灣文藝界發言權的爭奪——《福爾摩莎》再定位〉，《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期（2006）

¹³⁹ 吳坤煌自述曾經因覺福爾摩莎不夠左翼而離開，但並未因此切斷與張文環等福爾摩莎作家群的關係。吳坤煌，《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221。



與吳坤煌加以比較後可以知道，他們的差異正是在於對東亞局勢的視野並不相同。他們兩者都深知居於東京的好處，正是它是彼時東亞文化、知識、思想交流的重要節點，並藉此培養文化與社會資本。吳坤煌的目光與日本左翼劇作家秋田雨雀、朝鮮人戲劇工作者金斗鎔的交流，始終是以東京為舞台，他在此時期發表的文章也是依靠著與中國、韓國留學生的交流而得以成立。相較之下，張文環則有意選擇以台灣為主要的注視與對話對象，藉由 1934 年〈父之顏〉獲中央公論選外佳作為契機，張文環標舉出「回歸鄉土」的鮮明文學特色，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穩定的投稿而初步確立在文壇的地位。從張文環於 30 年代返台前的文學創作與言論，可以看見東京留學生活給他的左翼思想洗禮，然而對於母土人事物的執著書寫，使得他脫離開左翼寫實主義的路線，也有別於日本左翼作家轉向後的懺悔書寫，而這個「鄉土」脈絡並不同於在此前鄉土文學論戰，當時以鄉土文學為名，實則以書寫語言作為論爭的核心，但是正如同吳坤煌在論戰尾聲擲出的〈論鄉土文學〉一文所示，就算再怎麼展現了對於台灣本土民族文化邁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期待，卻往往突顯了以日語作為媒介背後的知識文化霸權。張文環的「鄉土回歸」書寫嘗試，在初期可以看見對於左翼思想的運用的鮮明痕跡，但逐漸專注於鄉土人情的描繪，這一方面反映了普羅文學運動崩壞後作家重新尋找自我文學實踐的新出路，也可以看見「內地文壇志望」的文學霸權已經開始轉變了，他必須調整自身的路線，才能夠順利地在島內文壇佔據一席之地。以日語書寫的「鄉土回歸」，就是他在這樣的情勢下找到的答案。接下來將藉由對於張文環 30 年代文學的分析，討論他的摸索歷程。

（二）父親的要求：張文環於島都的方向轉換

張文環〈父親的要求〉據信脫胎於其於《中央公論》的得獎之作〈父の顔〉(1935 年原稿募集，選外佳作)，該作雖未刊出，至今原稿也已佚失，但消息公佈後受到台灣文壇的熱烈報導與關注，張文環也以文壇新興之姿成為受注目的焦點。然而

這篇作品的問世卻一波三折，先是張文環在 1935 年 5 月號的《台灣文藝》聲稱「若就此刊出必然有負作家之良心」因而道歉，延後至 10 月號方才刊出修改後的作品〈父親的要求〉，耗時將近一年方修改完成，¹⁴⁰期間張文環也並無重要的作品發表；然而刊出後，卻遭到島內文藝界冷落以對，少見針對此作的評論，與同時期在內地得獎的翁鬧的〈憨爺〉、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受到的高度評價相比差異甚大。¹⁴¹

從〈父の顔〉到〈父親的要求〉之間究竟經歷怎樣的刪改變化，因為前者亡佚已經無從得知；然而張文環從此時期內地文學獎重視殖民地特色作品的現象，則可以知道〈父の顔〉得以被內地作家接受的背景為何。〈父親的要求〉的故事梗概為：受到父親的期許而至東京就讀法政科系的大學，未能符合家中期待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卻因緣際會與日本婦人房東及女兒形成擬似家庭。在他投入東京留學生的左翼運動，因而被特高警察逮捕時，這對日本人母女的情誼成為重要的支柱，但終究在父親的要求下，他感到階級與民族的矛盾使得愛戀不可能成真，因而回到故鄉。在故里，他知曉了原本參與運動的夥伴被隔離發狂的處境，也開始對左翼教條語言對「階級」的強調有了困惑，開始對「鄉土」的可能性有了不同想法：

他再一次回想起賀津子母親的一句話：「樹欲靜而風不止」。由愛生恨，愛和恨或許就像一對兄弟。¹⁴²


和泉司指出，為了挽救 1933 年左右開始陷入崩壞境地的普羅文學運動，此時的左翼作家開始拔擢具有殖民地色彩的新人作品，企圖以殖民地的題材造成話題性，為左翼文學運動找到一個新方向。¹⁴³〈父親的要求〉不僅描寫了轉向知識份

¹⁴⁰ 落款 1934 年 9 月作，1935 年 8 月改作。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台中：2002）第 1 冊。頁 27。

¹⁴¹ 此點參考張文薰，〈「風俗小說」的迷思〉，《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台南，台灣國家文學館），頁 95~96。

¹⁴²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頁 92。

¹⁴³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頁 127~164。



子的糾葛心境，也突顯了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特殊性，這些都很可能是其原作〈父の顔〉受到讚賞的條件。《中央公論》的原稿募集第2回入選作有島木健作〈盲目〉，選外佳作有中島敦的〈虎狩〉，第3回（即與〈父の顔〉同屆次）的入選作則有大鹿卓的〈野蠻人〉，不是描述知識份子處於轉向困境的小說，就是描寫內地人在殖民地生活的題材。同時期亦有1932年張赫宙的〈餓鬼道〉、1934年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等殖民地知識份子以殖民地題材進入文壇視野，可以窺見此時期日本內地文學獎運作的氛圍。張文環以〈父の顔〉投稿，想必也是瞄準了這樣的情勢吧。從前述在《台灣文藝》的「道歉」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於迎合文學獎邏輯進行創作的懊悔。從後見之明來看，〈父親的要求〉這篇作品的確不同於張文環一貫的作品特色，對台灣鄉土的描寫是空泛而浮面的，主要篇幅也在描寫知識份子在東京的戀愛與知識生活。與楊逵、呂赫若在內地展露頭角的姿態不同，〈父親的要求〉除了強調主角的堅不「轉向」以對立其同志阿貴的不堪外，並未揭櫫明顯的左翼運動旗幟，也並未描寫出殖民地人民受剝削與壓榨的悲慘樣貌，因而受到台灣文壇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張文薰認為，這樣的文壇反應應是促使張文環更決意朝向「鄉土」題材探索的「轉向」契機。對她來說，「轉向小說」概念用於分析張文環的重要性，並不是政治上立場上的效忠或背叛，而是由此可以看見作家在離開普羅文學運動的教條牢籠之後，如何找到與民眾、鄉土間新的關係與價值。¹⁴⁴換句話說，這即是作家自身如何面對群眾、面對鄉土的倫理問題。

張文環在中日戰爭爆發後近半年（1938.4）回到台灣，在此之前，他除了在《福爾摩莎》發表〈落蕾〉、〈貞操〉等短篇小說，也陸續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刊登了〈父親的要求〉、〈負重〉、〈部落的長老〉等作品，經歷過〈父親的要求〉的「失敗」之後，雖然在〈部落的長老〉中仍然沒有捨棄左翼概念的簡單套用，但到了〈負重〉以後等篇，張文環顯然已經捨棄這種作法，找到更直接平實

¹⁴⁴ 張文薰，〈「風俗小說」的迷思〉。



的語言去表述鄉土。這樣的方向轉換是否涉及政治立場的轉變？由於張文環在此時期的文章並不多，也很少明白的表述思想立場，很難據此判斷。真要說起來，張文環在東京就學時期是否真的深入地接受左翼政治的價值觀，實在都很成問題。但從實踐的層次來說，〈父親的要求〉的確可以稱作重要的轉折點：張文環自「東京台灣文化サークル」解散後，以文學工作者的姿態繼續參與左翼知識份子的活動，已經有走向純文學的傾向，但仍沒有辦法提出明確的質疑，¹⁴⁵而在〈父親的要求〉中慨嘆「這是階級的興起呢？還是階級的沒落呢？」的張文環，已經開始直接質疑左翼運動者以階級作為動員社會力的工具，是否真的符合底層庶民的真實生活了。這為張文環日後發展的鄉土倫理論述開啟了可能性。在〈被強制的題目〉一文中，張文環有一段在留日時期難得的對於現實政治的評論：

這樣每次遇到人都會談起台灣文學或社會的話題。但這原因之一是我從事文學工作的關係，不過我想法西斯的流行應該也是一個原因。有個集會席上，某一大學專門部的學生，偷偷向大家說不要醉心歐化，我也在心裡不得不說贊成。我雖然不是孔子的研究者，但自信瞭解一點。不過我說現在這個時代，說這些很無聊，他卻一副生氣的神情說，這是東洋的恥辱。……義大利拚命宣傳說，在衣索匹亞軍中有日本人的指揮官……這種要利用無色人種對有色人種的抗爭做宣傳，英國或美國的老輩，要怎麼解釋呢？這位可憐的學生，似乎也受到那些宣傳的影響了。¹⁴⁶

在這裡，可以看見張文環對於法西斯主義興起的關注。此時日本的左翼運動，應是在第三國際的指令之下開始採用了所謂人民陣線的策略，企圖團結社會民主派與自由主義者一同抵抗全球性的法西斯主義浪潮。¹⁴⁷然而張文環卻沒有直接進

¹⁴⁵ 從〈說自己的壞話〉(1935.1)(《台灣文藝》2卷3號)一文表述的心理樣貌最為明顯：「自己只想作為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是每天要逃避俗世進入圖書館的人」。張文環不斷強調自己的避世，卻無法明確提出自身與俗世的關係究竟為何，或可視作對於左翼運動挫敗下的失語反應。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1~5。

¹⁴⁶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1，頁131。

¹⁴⁷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台北：聯經，1984)，頁275~277。



入這樣的姿勢，而是強調自己對於東洋文明的認同，甚至強調自己對孔子思想的了解，以此作為討論日本文化國粹主義盛行下現實政治問題的條件。然而這樣的用意並非只是單純地以中華文化對抗日本文化，而是把重心放在對於「東方 vs 西方」、「有色人種對抗無色人種」的對立意識之破除。張文環在此曲折地展現了對於西方文明的認同，這從他的教養歷程，或從一個台灣人知識份子的角色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對他們來說，追求西方文明的教養正是使台灣擺脫後進殖民地地位的重要路徑。¹⁴⁸張文環口中的現實政治，難道不正是一戰結束以來世界諸國以英美為中心的威爾遜體制嗎？在這篇文章中，張文環不再堅持從對抗帝國主義、階級鬥爭的立場批判法西斯主義，而是從更為「現實的」角度去傳達對於戰爭的不同意。這包括了對於傳統漢文化的援用（但一方面又宣告古老的思想不一定適用於現代社會，確保自己作為現代知識份子的發言位置）、以及對法西斯主義的工具性認可（在摧毀傳統封建社會心態的層次上去同意它）。這樣的立場可以說已經逸離了左翼或者甚至人民陣線的對法西斯主義鬥爭路線，而是更積極地尋找與帝國政治既批判又合作的可能性，就這點來說，毋寧與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乃至於後期演變為台灣地方自治同盟的民族運動路線是相似的。這也呼應了〈被強制的題目〉一文中，張文環提及自己來往拜訪許多知名人物，但其實多為穩健派的民族運動者，如賴貴富、李延禧、吉田先生（田川大吉郎，日本眾議院議員）等，而非左翼運動人士之事實。¹⁴⁹對於此時的張文環來說，孔子（以及其背後代表的東洋學知識框架）已經成為定位自己與法西斯運動關係的重要資源，作為從左翼運動脫退的殖民地知識份子，他選擇以現代知識份子的立場挪用「孔子」這項屬於漢民族的思想符碼。「這是階級的興起，還是沒落呢？」彷彿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一樣，張文環正是以此為基點，開始建構他的鄉土倫理論述。

¹⁴⁸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


¹⁴⁹ 柳書琴解讀這篇文章，認為張文環拜訪了「大阪工廠的工人」，顯示了左翼運動的經歷，實際上是錯誤的詮釋，文章中與工人見面的是他的朋友「彭君」，張文環反而刻意選擇避開與工人的會面。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頁 290。



從張文環早期的作品來看，鄉土當然是重要的題材，而鄉村間規範著人與人關係的「倫理」，也無不存在著。例如〈落蕾〉中使得男女主角無法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貞操〉中使得男主角無法勇於追求所愛的鄉里謠言，以及〈父親的要求〉中令主角不得不捨棄戀愛與左翼運動的家族要求。然而在〈落蕾〉與〈貞操〉中，倫理都是以外在禁制的面貌出現，敘事者也帶有批判的態度。這是因為位處東京的左翼運動思潮中，張文環對鄉土輕易地採取了批評的姿勢，但來到〈父親的要求〉，當他面臨了左翼運動崩壞後的思想解構，在創作中，則是設想了一個以倫理要求面目出現的「不得不然」。這篇小說的主角似乎有著不願意轉向屈服的氣節，但他始終無法交代清楚為什麼自己無法違抗父親的命令，拋開家中的援助，真正以運動者的姿態活下去。在主角出獄後，父親寫來的信中文中出現了在房東眼裡看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殷殷期盼，但帶給主角的感受卻是「找不到一封可以喚起內心感動的東西」。¹⁵⁰在主角的理解中，這是不能不服從的命令，但是藉由目睹小偷、乞丐等等底層人民以不顧世間倫理道德的姿態活下去的契機，這位被囚錮於鄉土倫理結構的知識份子，宣稱道「由愛生恨，愛與恨或許是一對兄弟」言下之意，就是把鄉土倫理的「要求」轉化為自身尋求實踐道路的「契機」。鄉土倫理在此因而不再是知識份子從外部事不關己地加以批判的客體，而具備了改變知識份子自身的可能性。這樣的轉變並不能簡單的用「故鄉情感」加以解釋。從前述的分析可以知道，對於像張文環這樣的左翼運動參加者來說，他藉由塑造阿義這樣的角色，隱藏了自己對於左翼運動的疏離與背離，而以服從家鄉的倫理要求為由，合理化自己的選擇，這個過程與其說是刻意的掩藏，不如說是反映作家已自外於左翼運動的位置。¹⁵¹

¹⁵⁰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1，頁84。

¹⁵¹ 張文薰曾以日本轉向作家如高見順的「饒舌體」，說明張文環從〈父親的要求〉以降等小說文體中作家不斷介入敘事的現象。她認為有別於轉向作家的自我負罪感，張文環則是因為對於傳統價值觀的認同，導致無法明確地掌握所敘述的鄉土人物與敘事者、作者間的距離。張文薰，《植民地プロレタリア青年の文芸再生—張文環を中心とした『フォルモサ』世代の台湾文学—》，頁100~103。



這樣的說法不免挑戰許多前行研究將張文環視為「左翼作家」的觀點，¹⁵²但本文的用意並不在僅於左翼／右翼的區分，而是作家在具體的結構環境下思想如何轉變的軌跡。在〈父親的要求〉之後，仍在東京遊學的張文環陸續發表了〈過重〉、〈部落的元老〉、〈豬的生產〉等作品。〈過重〉在發表之時獲得不錯的迴響，主要的梗概則是描寫一個跟隨母親背負農作物到市場出售的殖民地少年，一路上掛念著學校、老師（象徵著殖民體制的現代化誘惑與威嚴）卻在市場辦事人員收購時索取稅收的蠻橫中看到殖民體制的無法信任，因而獲得啟蒙。這篇小說與〈父親的要求〉先後發表，但因為對殖民體制的批判意識明確，因此比起後者受到更多注目。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的敘事者透過主角「健」這名少年的眼睛，讓讀者看到了〈父親的要求〉中那名在東京留學的知識份子青年所看不到的家庭倫理的溫情。這樣的差異是透過從知識份子轉換到孩童視角，以及父親的「要求」不存在等一系列強調鄉土的「母性」色彩的設定而達成的。透過少年「健」的感悟，張文環也找到了另一個論述鄉土倫理的基點，像「健」這樣的少年可以說是〈父親的要求〉中「阿義」的成長雛型，透過回憶起童年時候看到存在於母土的不平等與屈辱，如同楊遠在〈送報伙〉中所做的那樣，張文環向讀者證明了鄉土的倫理是值得知識份子挺身捍衛的，但此時的他已經無法明確揭櫫得以指導這位少年投入抵抗運動的道路何在了。這不僅是由於日本帝國對於左翼運動的壓制，也由於張文環對於「現實政治」邏輯的接受，使得他選擇在帝國體制內進行文化運動的反抗。鄉土的倫理，也因此成為張文環得以訴說自身政治與生命選擇的載體。

總的來說，張文環雖然因為於東京留學，參與福爾摩莎文藝集團、結識台灣新民報社的民族運動領袖、並與日中鮮的左翼文化運動者交流，這些累積起來的文化、社會資本，都形成得以積極介入島內文壇發言權的優越位置。然而因為日

¹⁵² 如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

本政府的軍國主義鎮壓，加上左翼運動的挫折，使得原本對島內文壇具有優越性的「帝都膝前」位置開始變得黯淡甚至危險，¹⁵³張文環因而於1938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一年回到台灣。此時的他已經不同於在〈父親的要求〉中的主角阿義那樣對未來茫然無緒，而是更積極的發展對於台灣社會處於傳統與現代間各種問題的論述，成功地拓展了除了文學創作以外，更廣泛的文化與政治的參與實踐。

¹⁵³ 張文環在日本曾被逮捕兩次，第一次（1932年）雖很快就釋放，但第二次受到淺野次郎及其所辦刊物《ズドン》牽連的事件，則和巫永福被收押了一個月之久，同時期針對左翼知識人而非單純運動分子的逮捕事件也越來越多，由此可見張文環處境之險惡。但張文環於獲釋後仍然選擇待在東京一年，也許代表著仍然對於這個空間位置對文化與社會資本的累積效用仍有所期待。



第四節 楊逵的國際主義路線及其頓挫

(一) 從運動到文學：第一次的方向轉換

楊逵年輕即在對抗家族封建的意識之下前往日本留學，¹⁵⁴並在左翼運動的浪潮之中返台參加農民運動，然經歷連續的派系鬥爭之後選擇以文學的方式進行社會實踐。這樣的轉變意味著什麼？早期他參與台灣農民組合的運動，是在1928年左右台灣的左右翼狂飆浪潮中摸索，在社會運動的組織中實踐理想，卻經歷接連的派系鬥爭，因而隨著總督府的鎮壓而退出。此後他仍翻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出版，可以知道他對於自己的期許，仍在於社會運動方面，並試圖透過啟蒙的方式喚起更多的同志。然而也許是派系鬥爭的陰影，或者生活的重壓，他並未參與1930~1931年左右那些日治時期勞工與農民的最後激烈鬥爭。但另外的出路是，他獲得了賴和的賞識，不僅在其建議下以「楊逵」為筆名發表《送報伙》，也由此進入了台灣文壇，真正以一名作家的身份開始活動。

從運動到文學，這種中間的過程是如何？據他自述，不僅是由於整體社會運動的崩壞，更可以說是在面對殖民地處境與自身思想時，有意識的方向轉換。「不願意轉入地下」也許是因為吃過派系鬥爭的苦頭，面對殖民政府的專橫統治，楊逵並不願意走到更激進的革命路線，如台灣／日本共產黨一樣進行地下的革命鬥爭；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認同，以及經濟生活上的不穩定，也不可能加入彼時僅尚在官方許可下活動的右翼社會運動路線，如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但與同時期其他新文學作家不同的是，楊逵在理論工作上有著更明顯的堅持。這也許是曾赴日留學的經歷，以及對於左翼理論的信仰使然，楊逵自從藉由〈送報伙〉的得獎在文壇獲得知名度，接著便大量發表對於其他作品的評論，甚至主動掀起論戰。在這些論戰之中，楊逵的優勢往往在於知識與理論的武裝，並且能夠活用這些武器標

¹⁵⁴ 〈我的回憶〉，楊逵，《楊逵全集》，卷14，頁59。

舉出明確的左翼路線。他曾譏笑劉捷自封理論領導者的舉動，¹⁵⁵事實上楊達在 30 年代中日戰爭前的台灣文壇，的確是少數具日本留學經驗、又能迅速掌握日本文壇脈動的台灣人作家。楊達有意識地運用這樣的文化資本，透過一次次的論戰掌握文壇的話語權，他對自己的定位，顯然也並非只是一介作家，甚至也並非如張文環一樣的「文學尖兵」，而是更具領導行動能力與理論高度的左翼知識分子。

楊達與連溫卿曾同樣是新文協的同志，也在台灣共產黨的鬥爭中被迫離開組織，然而連溫卿因為失去了組織，在當局的高壓取締下只能放棄運動的理念，楊達卻嘗試走出一條新的路線，對台灣文化界的知識份子們進行組織工作。一次次的論戰，正是在仿效日本左翼思想與文學界在共產主義運動下激發的一次次鬥爭與批判，藉以結合理念相同的同志，明確化己方的路線與蓄積實力。能夠讓楊達走出這樣子路線的關鍵也許是賴和。賴和一向以好客愛才聞名，他給予楊達的照顧，當然也絕非鼓勵其創作〈送報伙〉而已，而更可能是經由他的中介，楊達建立起了與其他台灣知識份子的密切關係。¹⁵⁶例如楊達在台灣文藝聯盟成立的全島第一次台灣文藝大會就受邀，後來投稿大溪革新會《革新》、經由何集璧認識張深切等等機緣。創辦《台灣新文學》後，楊達亦跟中部文人賴和、楊守愚保持緊密關係，共同進行編輯工作。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楊達藉由〈送報伙〉的獲獎，而在台灣文壇引發的注目。河原功曾挖掘楊達當初面臨〈送報伙〉在台灣被查禁的處境，積極使用各種筆名對〈送報伙〉加以評論，藉以引發島內討論的過程。¹⁵⁷由此可見楊達的確充分認識到在日本的重要雜誌《文學評論》獲獎的意義，對於自己在台灣文化界打開知名度有多麼重要，這同時也是他在島內與其他知識份子進行思想鬥爭的重要資源。例如楊達與張深切、劉捷的論戰，就可以說是影響台灣島內對於「文藝大

¹⁵⁵ 楊達，〈關於大眾——張猛三氏的無知〉，同上註。卷 9，頁 346~352。

¹⁵⁶ 參考黃惠禎，〈楊達與賴和的文學因緣〉，《台灣文學學報》第 3 期（2002）

¹⁵⁷ 河原功，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伙〉——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達——〉，《臺灣文學學報》第 7 期（2005）



眾化」賦予左翼態度的重要事件。¹⁵⁸而楊逵積極地與內地文壇聯絡，為《文學評論》、《日本學藝新聞》、《時局新聞》等雜誌撰寫文章，甚至負責專欄，也因而獲得了與內地作家持續交流溝通的實力，楊逵之在台灣文壇居於領導位置，不能忽略他與賴和的交往，以及背後日本左翼文化場域對他的支持這兩個因素。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台灣新文學》便是楊逵在進行從運動到文學的方向轉換後，得以實踐自身理念的重要地盤。楊逵於1934年左右加入台灣文藝聯盟，這應是他首次加入台灣的文藝組織，初期並非核心成員，但在五月的成立大會亦受到邀請，但此時尚未在報刊雜誌積極活動，但而後楊逵的〈送報伙〉獲《文學評論》徵文二等獎的殊榮，並刊載於十月號。諷刺的是，這篇作品被總督府嚴格的審閱制度所查禁，無法使一般的讀者目睹全貌。為此楊逵以「王氏琴」、「賴健兒」等筆名發表對於該作的評論，並且針對徐瓊二、賴慶等右翼路線的作者展開旗幟鮮明的批判。¹⁵⁹此舉顯現了楊逵於左翼運動鬥爭的經驗，並且將其活用於文壇話語權的爭奪之上。挾著這道旋風，楊逵同時也進入了日本的左翼文化圈，在《文學評論》、《行動》這些日本左翼運動崩壞後對社會主義仍抱持信念的知識份子佔有的據點發表文章，甚至同步性地參與「行動主義」等論爭，可見其對於進入左翼文化戰線的強烈企圖心。¹⁶⁰在1935年6月左右，楊逵正式對台灣文藝聯盟中據主導地位的張深切發動論戰，主要批評藍紅綠〈邁向紳士之道〉一文遭刻意棄稿引發的編輯方針獨裁問題，實際上是堅持左翼階級的大眾化路線之爭。¹⁶¹相較於日本文壇在30年代初期掀起的文藝大眾化論爭，是共產黨文化剛性指導下的

¹⁵⁸ 1935年8月至9月於《台灣新聞》，張猛三（即劉捷）發表〈何謂藝術上的大眾〉批評楊逵和德永直堅持藝術大眾化的觀點，楊逵則寫作〈關於大眾——張猛三氏的無知〉等文章加以反駁。詳細參考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頁150~167。

¹⁵⁹ 其過程見河原功的考察。河原功，〈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伙〉——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台灣文學學報》，第7期（2005），張文薰譯，頁129~147。

¹⁶⁰ 詳細的考察見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台北：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¹⁶¹ 趙勳達指出這篇小說具有對左翼知識分子轉向的諷刺，以及對殖民統治辛辣諷刺的特色，可能是造成楊逵與張深切對它評價差異極大的原因。趙勳達，《〈台灣新文學〉（1935~1937）定位及其抵殖民精神研究》（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6）。頁67~84。



教條鬥爭，楊逵刻意在台灣文化界擾動的這一疊疊浪濤，應認為是對於殖民地文化發展方向的想像差異造成了衝突。張深切的文學論除了對於地主與新興市民階級的認同，也顯然揉合了對於傳統漢文化的親近特色，並且不願意立出鮮明的旗幟，以博取各方勢力的支援；相較於此，楊逵則意圖透過對於日本普羅知識界的學習，確立台灣文化向「左」發展之道路，傳統地主舊勢力的封建要素，更不可能納入左翼的進步想像之中。¹⁶²楊逵發動的鬥爭並沒有在台灣文藝聯盟中激發明顯的左右對立，但卻暴露了張深切在階級或民族路線上並無特別堅持的問題，¹⁶³導致了彰化賴和與楊守愚、萬華王施琅等文化人群體均轉向參與《台灣新文學》。經過這樣的歷程，楊逵也因而得以在鮮明的旗幟下與楊守愚、王詩琅、吳新榮等人合作，透過明確的編輯方針，在提高階級意識、鼓勵漢文創作、挖掘新人作家等方向都交出不錯的成績。相較於《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藉由楊逵標舉著明確的左翼路線，一方面吸引到台灣各地重要的知識人參與，一方面也形成與日本左翼文化界的交流網絡，使得它有別於30年代初如《伍人報》、《洪水》等左翼雜誌的短命，或如《南音》走向小集團性，而真正對當時台灣的文化界留下了影響力，就這點來說，它的確是楊逵在日治時期重要的運動成果。


（二）國際主義路線的頓挫

楊逵在30年代的思想性質，多被評為「國際主義」式的，¹⁶⁴理由在於〈送報伕〉中協助窮迫潦倒的台灣人主角，是具有樸素正義感的「田中君」，以及帶領送報伕們起來抗爭的組織者「伊藤君」等日本人，這般明確的台日無產階級連帶的

¹⁶² 江亢虎於1934年8月來台的演講效應，台灣文藝創刊號出現了堅如〈文藝大眾化〉一文，追隨江抗虎對漢文學的提倡，然而楊逵卻連續以〈評江博士之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疑刊載於台灣新民報）、〈小鎮剪影〉（刊於《文學評論》一卷十號）兩篇文章批評江亢虎對文言文的提倡。由此可窺見《台灣文藝》本具有與傳統漢文化親近的姿態。除此之外，台灣文藝聯盟第一次全島大會時推傳統漢文人黃純青為議長、籌委會並提出「與漢詩人聯絡」案，可見其與傳統文人之關係。

¹⁶³ 張深切面對《台灣文藝》之漢文作品品質愈加低落，誌內幾乎為和文作品所佔一事僅只於慨嘆而無實際作為，可見其身為編輯的鄉愿無能，實是造成《台灣文藝》後期衰落的重要原因。

¹⁶⁴ 代表性見解見呂正惠〈論楊逵的小說藝術〉，呂正惠，《殖民地文學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2002），頁243~256。



構圖。而從其他的論述雜評來看，楊逵的確積極地連結日本的左翼思想資源，這也符合他自日本留學以來的行動脈絡。¹⁶⁵在日本，1933年的轉向風潮，使得普羅文學運動組織也迅速崩解，除了轉向純文藝、轉向文學等方向，部份仍堅持階級意識的作家如德永直，則試圖透過引進俄國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為普羅文學找到新生之道。另一方面，也有自由主義作家如舟橋聖二等人，透過創辦《行動》等雜誌，對於法西斯主義提出批判。這些文壇的動向反映了軍國主義日益熾烈，知識份子卻難以找到現實上的解決道路之苦悶；對於文學應如何影響政治與社會，統一戰線始終困難，各個路線派別彼此批判，卻又難以拿出具體的實踐方案。楊逵積極參與這些論戰，在內地的雜誌上發表言論，並同時將其立場發表於島內雜誌報刊，顯然有以自己為媒介，將內地的文化熱度延燒至台灣的企圖心。¹⁶⁶他提出「真實的寫實主義」，刻意避開日本左翼文化圈的派系對立意識，是針對法西斯主義的欺騙性質，企圖明確化真正反法西斯的「行動」路線。然而相較於對於日本內地各種路線的熟稔，楊逵在臺灣發表的論述往往是簡單襲用日本文壇的問題意識，對於殖民地臺灣文壇的境況，似無法確切回應，也未引發討論的熱度。或許正是因為這點，楊逵才試圖以「真實的寫實主義」在臺灣打出自己的旗幟，問題是怎麼操作？如何實踐？沒有具體的方向。對於內地理論思潮過份地關心，卻無法真正回應臺灣本地的思想問題，成為楊逵的一大困境。

前述提到約在1931~1933年激烈討論的臺灣話文論戰，正是在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問題下自然生成的問題意識。楊逵真正於文壇嶄露頭角，積極活動的時間是在1934年下半，並未參與論戰，但1932年便經由賴和協助，在《臺灣新民

¹⁶⁵ 葉石濤描述他在留學三年的日本經驗「仍是美好的。他認識了許多位著名日本作家以及善良的日本勞工，參加臺灣留學生的讀書會，在思想和生活的結合中確立及接受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葉石濤，〈日據時期的楊逵〉，黃惠禎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楊逵》（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頁137。

¹⁶⁶ 參考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頁55。

報》發表〈送報伙〉的他，想必不會不知道這場論戰吧。¹⁶⁷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話文論戰中後期參與的日語世代作家，往往將討論重點導向鄉土文學的意識形態，而非臺灣話文的語言工具危機之上，可見其站在帝國優勢語文使用者的位置。早先力主中國白話文的論將之一賴明弘，也從中國白話文的實踐者，在參與《臺灣新文學》時期成了完全的日語作家。¹⁶⁸楊逵於1935年四至五月間曾於《台灣新報》發表白話漢文小說〈死〉，並受賴和的協助完成台灣話文版的草稿，直到《臺灣新文學》創刊號，賴和仍發表極具實驗性質的臺灣話文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然而楊逵顯然有意識地選擇了日文寫作的方向，並且積極地實踐，此後一直到戰爭結束，未繼續創作漢文的作品，在他的文章中積極的討論，並為後人稱道的「真實的寫實主義」、「報導文學」等理念，皆不證自明地援引了日本或俄國的左翼理論，¹⁶⁹卻彷彿忽略了如果無法擺脫日語寫作的魔咒，臺灣的大眾先天地無法接觸這些寫實主義作品之事實。

在《臺灣新文學》成立之初，包涵德永直等眾多的日本普羅作家便受邀提出對於臺灣的文學建設期許。如「對臺灣的新文學的期望」(創刊號)、「臺灣作家的任務」(二卷1~3號)等專題，的確可以看出與楊逵經營的內地文壇人脈關聯極深，應是其主導運作下的結果。這些內地作家幾乎皆期許臺灣作家們描寫真實的民眾生活樣貌，使臺灣勞苦大眾的風俗與生活得以傳達給內地文化界，作為基於左翼立場的誠摯建議。然而對於臺灣「實情」的渴求，在此時普羅文學運動崩壞的文壇，是作為挽回讀者注目的獵奇性對象而存在；在這些內地知識份子的建議中，並沒有能夠反省帝國對殖民地文化戕害的內省思想。他們略帶遲疑提到的「殖民地文學」概念，雖然本為《臺灣新文學》編輯方所提出，但因為沒有處理日本知

¹⁶⁷ 賴和亦在臺灣話文論戰中略為參與，與郭秋生等臺灣話文派站在近似立場。

¹⁶⁸ 陳淑容，〈跨語、跨境、跨時代——賴明弘的漂泊與追尋〉，收錄於《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二集》(高雄：春暉，2008)，頁277~311。


¹⁶⁹ 趙勳達認為楊逵能夠超脫日本左翼的派閥主義，並且發展出台灣在地的左翼立場。然而從其整體論述來看，頂多只能說他將日本的左翼理論以台灣之脈絡較能吸收的形式論述，而不能說他突破了語言文化的阻礙。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

識人對於殖民地的權力關係之反省，雖然包覆著共同對抗帝國主義期待的外衣，在建立真實反抗力量的連帶上，其效果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甚至有反過來確認「臺灣文化建立的知識論附屬於日本左翼知識界」這種正當性的危機。



楊逵與賴和長期的交遊，不會沒有察覺到以日文進行臺灣文化運動的矛盾問題。相對於此，與楊守愚、王詩琅等漢文作家的合作使得他能夠將《臺灣新文學》的實踐維持與在地文化的連結，「漢文創作特輯」(一卷 10 號)可以說是在這樣的意圖之下的產物吧。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楊逵與漢文作家的合作的極限也僅只於此，並未得以達成對於日本左翼理論與在地知識的真正交流或挑戰。在《臺灣新文學》之中，和文與漢文的作品成為兩條不自然地並置的平行線，日文的創作與論述掌握了對於進步知識的詮釋權，而漢文作品雖然保留了對於庶民生活的體驗與感受，卻在語文近代化的困難中舉步維艱；取而代之的，則是作家愈加努力在日文作品中表現出「臺灣味」，嘗試在殖民者的語言創造具混雜性的表現方式，以表達自身的生活與感受。然而楊逵於〈關於藝術中的「臺灣味」〉一文，強調臺灣的特色必須於題材內容中尋找，而非藝術形式。這種強調文化普同性的思維，當然與彼時左翼運動中強調團結階級、泯除民族界線的呼求有關，然而這樣的知識論忽略了民族與民族的文化形式，正是與他們欲團結的工農大眾之生活感密切相關。楊逵對於題材、內容的強調，展現了對於階級運動不分民族界線的理想與自信，但也壓抑了從被壓迫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尋找反抗動能的契機。

楊逵在 30 年代發表的小說創作，包含〈送報伕〉、〈靈籤〉、〈難產〉、〈水牛〉等都是以自身形象為第一人稱敘事者的作品。這些敘事者一方面都是知識份子，卻也面臨了生活無以為繼的艱難，楊逵透過書寫自身的勞動經驗，去除知識份子的光暈，使得閱讀的知識份子群體亦能瞭解到勞動者的痛苦並非身外之事，可說是將自我的主體性認同靠近為勞動者的努力。但在這些作品之中，脫離貧困處境的方法依然指向了對於知識啟蒙的渴望，至於團結起來對抗強權，這種理應在左



翼敘事中被大大強調的敘述，往往不是曖昧不明，就是省去了許多弱勢者間建立信任的過程。〈送報伙〉可說是少數詳細描寫了這一過程的作品，但敘事者楊君與田中君的交情，與其說是勞動者的團結意識，毋寧說是同為學生的互助情誼，而除了這兩人以外的勞動者形象是曖昧不明的，甚至敘事者亦有意的避開與穿著勞動服裝的其他送報伙，而選擇與穿著學生服的田中君親近，並且描述了雜居於勞動者之間的不愉快心情。¹⁷⁰這不僅突顯了楊達的留學經驗，也是他對於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主體意識描寫，正是在對於日本近代的左翼文化運動抱持親近的態度下形塑出來。楊達曾寫到「要更積極瞭解資本家和官員的生活以進行描寫」但其實他的盲點更在於，雖然能以客觀的方式對弱勢者受到的不公平處境做出描寫和分析，但對於勞動者的實際社會生活與情感缺乏想像與描寫能力，這更突顯了他身為知識份子的「疏離」特質。¹⁷¹

在中日戰前，楊達對於倫理的論述往往針對於階級，鄉土的傳統倫理在他看來是必須被批判的對象，被化約於相親結婚、查某嫖等制度對人性的戕害。他所描繪的勞農大眾團結想像，也因而具有跨民族的理想特質。在他看來，只要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解析日本帝國的支配本質，並且對於大眾進行啟蒙的工作，就可以對抗彼時日漸盛行的法西斯主義。因而當他不斷撰文論述，向台灣的知識份子宣傳「真實的寫實主義」，也正是在提出一種基於左翼知識論使命感的倫理要求。對他來說，知識份子在殖民地政治體制下遭受的種種困境，與作為第四階級的工農大眾是類似的，因而他反對如張深切、劉捷等人屏除弱勢者需求的文學論，也認為唯有服從這樣的倫理使命，台灣的文藝才能朝向建設性、有生命力的方向發展。楊達完成於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的作品〈模範村〉，在戰爭結束前並未得到發表的機會，但可以說如實地呈現了他對於台灣文化發展期待的樣貌。小說中描述一位年輕的知識份子，在瞭解故鄉農民在維持「模範村」光鮮外表下實際生活的慘況

¹⁷⁰ 〈送報伙〉，楊達，《楊達全集》卷1，頁67~69。

¹⁷¹ 對於楊達小說中呈現的知識份子疏離形象，許達然曾作過討論。許認為「疏離」亦正是楊達對抗法西斯主義的方法。

後，不惜與地主父親決裂，並且在離家出走後秘密寄送左翼書籍給故鄉的教書先生，以供給村中青年團結起來行動的理論養分。¹⁷²這說明了楊逵在此時期的思考，雖然以台灣在地的工農階級處境作為行動的倫理依據，但背後仍指向了以帝都為核心的啟蒙知識譜系。當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的左翼運動被法西斯的集體主義所完全吸納，楊逵也因而被迫中斷這條中日左翼思想交流的實踐路線，在警察入田春彥的協助下開始了「首陽園」的躬耕生活。然而前述的日本左翼知識背景，依然影響了他在日後復出文壇時的行動邏輯。

¹⁷² 〈模範村〉，楊逵，《楊逵全集》卷5，頁99~147。



第三章 鄉土倫理的再定位：張文環

第一節：重塑國民性：從帝都回歸的知識份子視線

（一）返台初期的國民性論述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在駐北平陸軍的挑釁下正式爆發，近衛內閣一開始試圖控制戰局，讓它像九一八事變一樣獲得控制，但顯然局勢已經沒有如此簡單，不管是日本軍部或是中國政府都不想再粉飾虛偽的和平，要以武力正式解決從1931年以來雙方的恩怨。¹⁷³此時在東京的張文環，似乎還沒能從去年底受左翼刊物牽連被捕入獄的驚魂中鎮定下來，因為1936年8月台灣文藝聯盟解散，《台灣文藝》隨之停刊，1937年6月《台灣新文學》也在內外壓力下停刊，張文環接連失去了兩個原本活躍的文藝場域，因而從3月開始便沒有新的作品發表，一直到1938年返台接掌《風月報》和文欄後，才真正獲得了發展的空間。根據陳淑容對於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分析，此時期由於《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兩大文藝雜誌相繼停刊、許多雜誌的漢文欄也自主廢止，作家得以發表作品的文學場域轉移到一般報刊的文藝欄。¹⁷⁴但此時漢文欄廢止的衝擊影響未消，四大報刊的文藝欄仍未順利轉型，張文環雖然已經確定自己「回鄉」的路線，也積極在台灣文壇打下知名度，此時卻頓失用武之地。此時在東京的台灣人社群已少見顯著的文化活動，然而張文環仍選擇在東京滯留，不知是否對於應否返鄉開創事業感到疑惑？或者是透過東京的台灣人社群尋找其他活動空間？已不得而知。¹⁷⁵但可以確定的是，經過這約一年的「空窗期」，回到台灣的張文環已經在台灣文化圈的

¹⁷³ 鈴木隆史，〈日中戰爭〉。

¹⁷⁴ 陳淑容，《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市：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57~60。

¹⁷⁵ 據柳書琴製作的年表，張文環此時於圖書館苦讀，但既然沒有特定的目標，實在很難說明他此時在圖書館苦讀的意義為何？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596。



網絡中站定腳步，並且在實踐行動上也有明確的變化。本文將張文環於1938年回台，至1941年6月創辦《台灣文學》的這段時間稱作「返台初期」，此時期張文環頂著留京知識份子的光環，參與了台灣文壇度過「支那事變」前後的不景氣而恢復興盛的階段，在《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民報》、《台灣藝術》、《文藝台灣》等文藝場域活動，最後終於藉由集團的力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活動空間。本節將藉由探討此時期張文環的活動與作品，解析他在戰爭期形成倫理論述的過程。

首先以張文環仍在東京時發表的雜文〈教育と娛樂〉¹⁷⁶為例，可以說是重要的指標，看出張文環在實踐活動上的方向位移。這篇文章之所以特別，是因為這是目前所知張文環最早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的文章，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張文環的活動的場域以《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兩部文藝雜誌為主，並未投稿至一般報刊，而《台灣日日新報》濃厚的總督府官方色彩，也使得這樣的舉動顯得異常。原因正應該是島內文學發表空間的壓縮，導致張文環選擇投稿至這個在他口中具有民族歧視的報紙，¹⁷⁷但卻也是當時台灣碩果僅存的文藝空間¹⁷⁸。然而不只發表空間，這篇文章的內容也引人注意。張文環過往的雜文往往強調對於台灣文學文化的堅持，但在這篇文章中卻強調台灣人應該對於日本的傳統藝術有所認識和了解，「這也正是理解我國國民精神的一個途徑、一個手段」¹⁷⁹並且舉出不懂得欣賞日本傳統表演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努力學習日本傳統藝術的中國人教授夫婦，作為對照。從「只想做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說自己的壞話)¹⁸⁰到「這也正是理解我國國民精神的一個途徑、一個手段」這中間的跨越是怎麼產生的？欲理解其間的邏輯，就不能不探索張文環在返台初期的「國民性」論述。

¹⁷⁶ 1937年11月30日刊於《台灣日日新報》。

¹⁷⁷ 張文環曾表示他要父親「除了新民報和台灣新聞以外的報紙都不要買。……有民族歧視的報紙都不要，如果想要看，那麼就買東京的報紙來看好了」言下之意當然是在抨擊另外兩個知名的日報《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台中縣：2002c)。卷6，頁5。

¹⁷⁸ 出自河崎寬康，〈關於台灣文化的備忘錄(二)〉，原刊《台灣時報》195號，1936年2月。葉笛譯文見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第一冊，頁360。值得玩味的是為何張文環不選擇投稿至台灣新民報。

¹⁷⁹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14

¹⁸⁰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1

張文環在 1938 年前後的雜文，突顯了甫歸台灣的內地知識分子視線，特別是對於相較於內地的文明化有所不足的批判。他在具代表性的文章〈大稻埕雜感〉中，破題便以形象化的方式，從一個甫從帝都歸國的知識分子角度描寫台北這個城市：



台灣的冬天，很像內地的晚秋，空氣裡帶有陰影，就像長久被懷念的回憶追逐著似的，連腳步聲都讓人覺得是沈靜的移動。¹⁸¹

對於內地的懷念，構成了張文環批判台北文化現象的參照軸。例如內地的都市是帶「有批判性」、「深刻」的，相比之下，台北則因為女服務生和藝姐的缺乏教養、以及電影院觀影文化的吵鬧，而受到張文環的批評。這樣的批評事實上可以聯繫到〈教育與娛樂〉中對於「理解國民精神」的期待。所謂的國民精神，特別是在戰爭期的殖民地台灣，可以說就是將異質民族統一起來帝國的構造，¹⁸²它假設了帝國的統治結構可以將不同文化的民族、族群放在一個共同的「文明」尺度加以衡量，這樣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因為若沒有將人民教化為符合競爭、理性邏輯的行動者，就難以使得西歐資本主義這具龐大的機器順利在風土不符的東方世界著陸運轉。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企圖仿效西歐都市進行改造，而東京的都市空間發展更在 1923 年的關東大震災後，獲得了根本性的改變，不管是國家權力對於住民的掌握、出版資本主義的興盛等等，都與戰後重建的都市空間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張文環自 1931 至 1938 年，在東京度過約八年歲月，他浸淫在帝都空間旺盛的文化活動中，顯然不只對於左翼文化運動投注心力，其實也被日本的傳統藝術，特別是傳統的庶民表演所吸引；¹⁸³但他選擇在歸台前發表針對市民文化批判的評論文章，可以說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文化資本，企圖確

¹⁸¹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6，頁 21。

¹⁸²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

¹⁸³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6，頁 12。

立在本島文化界的位置，而這個文化界正是以島都台北為主要陣地¹⁸⁴。以台北為主要讀者群的《台灣日日新報》自然成為適當的舞台¹⁸⁵，而就結果來看，也的確使張文環在羽翼未豐之際獲致穩定的曝光度，得以參與《台灣》、《文藝台灣》（文藝家協會）等文藝團體的運作，累積自己的人脈，形成日後《台灣文學》創刊的基礎。

而不只如此，在〈大稻埕雜感〉中內地知識份子的視線，不斷出現在張文環訪台初期的雜文之中，例如台灣の演劇問題に就いて、巷を歩きて、選舉風景を見る、先覺者の悲哀等文章皆是如此。他習慣將內地的都市體驗與台灣的文化社會現狀作比擬，訴求台灣民眾的自覺革新。吳若瑩在其探討大稻埕地景的碩士論文中，以張文環對大稻埕的性產業地景之評論為代表，指出這是彼時台灣知識份子典型的「反城市」（anti-urbanism）的道德重整稱之：亦即，面對藝妲在殖民現代性的摩登文化影響下越來越不受拘束的身體，男性知識份子難以抑制心中的焦慮，因而將島都的藝妲問題道德化，由此生產訴求當局以公權力介入的論述¹⁸⁶。由此可見，張文環的態度轉換並不僅是為了躋身文藝場域的策略運用，而更具有扮演知識份子角色的自覺。所謂知識份子，當然有參與公共事務，屏除單一領域專家的侷限，貢獻所學所能的積極意義；但在葛蘭西的分析之中，「有機知識份子」雖然有別於「傳統知識份子」的墨守舊規、自我設限，但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他們往往扮演著促進與推動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等社會結構成形的角色，具有被國家機器驅使的功能。對於戰爭時期的台灣社會而言，有機知識份子協助或是阻擋了國家——此一現代意義下戰爭的發動者——的權力運作，就成為重要的問題點。從前述的討論來看，張文環對於公共議題論述的基礎往往來自於帝國首

¹⁸⁴ 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相繼停刊後，台灣的文學場域顯然由以往偏重台中的集結，轉移到台北為核心。除了因為《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台灣藝術》、《民俗台灣》等重要文藝雜誌都發行於台北的現象，張文薰更指出了台北帝國大學作為戰爭期文學場域中心的分析可能性。張文薰〈一九四〇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

¹⁸⁵ 陳淑容，《戰爭前期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成和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頁113。

¹⁸⁶ 吳若瑩，2009，〈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頁28～30

都的治理經驗，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因此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質。當他強調「國民精神」養成的重要性時，其實也是在訴說著自己意圖成為推動台灣納入日本國民國家體制的「有機知識份子」。



張文環長期利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文章的情形，在 1940 年於《台灣新民報》連載《山茶花》後有了改變。這項連載計畫起自學藝欄編輯黃得時的「新銳中篇創作集」企劃，而其實早在 1939 年 6 月，黃便策劃了「鄉土隨筆集」以與《台日》報西川滿策劃的「明信片隨筆」相互較勁。張文環則是先後對兩者提供稿件，為了「新銳創作集」而創作的《山茶花》共連載 111 回，是張文環唯一於戰前發表的長篇小說，正式開啟了他與黃得時的文學合作因緣。而在《台灣新民報》學藝欄走出「文學之夜」的陰影之後，每年元旦的作家文章邀訪成為重要的象徵儀式，代表著《台灣新民報》學藝欄引領台灣文學前進的自信心。¹⁸⁷張文環在 1940 年、1941 年元旦皆受邀，寫下了〈獨特なもの存在，今年は大いにやろう〉、〈文学するもの心構〉兩篇文章，展現了對於台灣文壇進步的樂觀期待。對他來說，日本內地的文學發展不可避免的牽動了台灣的文化氣氛，在中日戰爭「日華親善」的口號，以及大政翼贊會的推波助瀾下，中央文壇關心著中國文學、地方文學，張文環也因而期待著文化政策給予從事文學者的任務，由此建構起獨特的精神論，希望從事文學的同好能夠把握時勢，以堅定的精神力來拓展台灣的文學發展。¹⁸⁸可以說張文環對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期許，和期待國家政策對於台灣文學的推動，兩者是重合一致的。這也解釋了張文環從在京時期對於建設台灣文化的期待，為何返台前後會轉變為強調「國民精神」，因為他體認到在帝國的文化霸權之下，台灣的文學工作者唯有先對於日本的國民性有所認識，得到國家力量的承認，才能進一步建設屬於自己的文學文化。這是屬於被殖民者的悲哀。張文環在〈台灣文學の將來に就いて〉這篇文章中明確陳述了這樣的矛盾。對他來說，學習日語

¹⁸⁷ 陳淑容，《戰爭前期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成和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

¹⁸⁸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6，頁 57。

文學是和學習法語文學一樣，是當弱小民族要建設自己的文化時，不得不克服的門檻。¹⁸⁹這種將帝國文化工具化的思維，並沒有將日本文化上升到本體論的層次，卻很能代表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的思路。因此張文環生產的國民性論述，始終是圍繞著對於自身經驗，期待成為參與建設台灣文學文化的「有機知識份子」，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二）返台初期張文環都市書寫的意義

張文環回到台灣是在 1938 年的 4 月，此時台灣的戰時體制已經明確化，雖仍未有明確的文藝統制政策和組織，但透過同盟通信社的統一稿件、報紙漢文欄的廢除，戰爭的氣息已經蔓延到台灣文壇，而進入黃得時所稱「文學之夜」。張文環返台後一開始的文學工作，便是翻譯漢文通俗小說《可愛的仇人》（徐坤泉作）以及主持少數僅存的漢文雜誌《風月報》（主編為徐坤泉）的和文欄。¹⁹⁰這兩件工作皆與當時身為台灣新民報學藝欄主編的徐氏有關。徐坤泉為當時著名通俗文學家，又兼具台灣新民報編輯等身份，後來主持改革後的《風月報》，是當時文壇活躍的人物。張文環經由台灣文藝聯盟的劉捷介紹與其認識，爾後進入董事長謝火爐、總經理徐坤泉的「台灣映畫株式會社」工作數年。由此可見張文環回台初期的活動與劉捷、徐坤泉這一台灣新民報的人際網絡密切相關。然而弔詭的是，台灣新民報的學藝欄卻似乎無法提供給他適當的活動空間，¹⁹¹而逼得他只能往《台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台日》）投稿。相較於《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的純文藝性、甚至左翼色彩，《台日》報的調性顯然更站在殖民政府立場，並且作為一個日報新聞能給文學作品的版面也不多，張文環因而採取雜談的文體，並且突顯自己在東京留學的文化位置，在返台前透過《台日》報發表〈教育與娛樂〉

¹⁸⁹ 同上註。頁 46。

¹⁹⁰ 對比於 1937 年報刊漢文欄的「自主」廢除，張文環的這兩項工作都象徵性的說明了日文如何在戰爭爆發後開始膨脹其勢力。

¹⁹¹ 此時已由黃得時主持。



(1937.11.30)〈大稻埕雜感〉(1938.12.25~27)〈論台灣的戲劇問題〉(1939.7.29)、
〈走在街巷，看看選舉風景〉(1939.12.5)、〈平林彪吾の思い出〉(1940.4.13)等
涉及都市文化空間的評論文章。從這樣的角度看來，此時尚未在台灣文壇據有一
席之地的張文環，顯然有意以自身都市經驗的寫作策略，找到發聲的空間。以往
的前行研究鮮少檢討張文環的都市書寫，誠然就文學價值來看，前者並未如鄉土
題材的書寫那樣成功，但它卻誠實紀錄了張文環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活動軌跡，
甚至反面映射了其鄉土書寫的複雜意義。

張文環此時期的都市雜文書寫，有兩種鮮明的特色。一是努力挪用皇民化運
動的語言以為己說，如「內台融合」、「皇民精神」等等，雖然目的在提昇台灣文
化的水平，但不免將帝都作為了文化的尺度，一方面也採取對政府訴求的姿態，
對只注重教條的文化政策表達不同意，也批評投機不認真的文化工作者，這些都
是可以看出配合《台灣日日新報》質性的策略，但也提醒了我們張文環迥異於在
《台灣新文學》活動時的多面性，甚至思想轉向的可能。第二種方向則是以自身
的回憶連結「帝都」與「島都」，進行文化位置的自我確認。這當然有展演文化資
本的一面，同時也彷彿再次宣示了自己負有建設台灣文化的任務，並尋求與其他
殖民地知識份子讀者間的默契共感。如〈懷念平林彪吾〉這篇文章展示的，張文
環與轉向作家平林彪吾的友誼，必須在與帝都的魚雁往返中獲得確認，再次激發
了張文環實踐其建議的「就照你方才說的寫吧！」，所謂風俗／饒舌的寫實主義路
線之決心。¹⁹²張文環對於兩人友誼的詮釋其實模糊了左右翼的界線，平林彪吾的
樣貌只以執著的文學工作者此一面貌出現，是良師也是夥伴。在此「帝都」與「島
都」間的都市空間連結並非如柳書琴所詮釋的喚起左翼思想的連帶，¹⁹³而是安放
作者對於自身在島都從事文學文化運動的價值認同，台北的都市空間不免被安放
在帝國的階序中，不是具有接受帝都資源的機能，就是充滿獵奇不堪的色彩，等

¹⁹²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49。

¹⁹³ 參見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347。事實上日治時期大多數強調日本與台灣革命連帶的小說也鮮少以台灣的都市為背景，這也是值得思索之處。



待有志知識份子的努力改善。

而或許是感受到內地留學的光環不能一用再用，若真要在台灣文化界佔據一席之地，還是得找到能夠突顯身為台灣人知識份子的特色；在〈走在街巷，看看選舉風景〉（1939.12.5）這篇雜文中，張文環嘗試轉變帝都知識份子的自我標榜，以《論語》中諸多名言，勸勉欲參政者須先修身才能治人。這承接了〈父親的要求〉中以「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漢文資源表達傳統情感與社會關係之作法，也預告了張文環在日後的鄉土書寫中對傳統漢文資源的援用。¹⁹⁴野間信幸認為，張文環在作品中引用傳統漢文的經典，不僅反應了他從小在私塾的漢文素養，也是他發掘自身台灣人認同的路徑呈現。¹⁹⁵但值得探問的是，張文環對於漢文傳統經典的運用，是否還能回到傳統漢文人與鄉土共同體的認識基礎？從他對於傳統守舊文化多所批評的姿態來看，近代的東洋學論述或許對他有更多的影響。¹⁹⁶而在這篇文章中，過多的引用語句充斥，不僅無法顯出作者對於《論語》典籍的掌握精熟，而更像是甫讀完書後的急切試刀；雖然這可以說是一個失敗的試驗，但卻可以窺見張文環在島都台北穩固自身位置的努力。同時，對漢文知識的「惡補」，也是張文環對於中日戰爭局勢的積極反應。正如他在數日後刊於《台灣新民報》的文章所述：「最近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中國文學的研究。像東朝（東京朝日新聞）出現了村松梢風的新水滸傳，台日出現了吉川英治的三國誌。本誌既有黃得時的水滸傳在連載。所以能夠想像今後必有台灣的傳說或故事，被挖掘出來。」¹⁹⁷這裡的「研究」並非指學術上的知識考究，毋寧是以日文——大東亞戰爭下的霸權語言——對中國文學進行翻譯的文化再生產。走在台北街頭巷尾觀看地方選舉的張文環，也因而嘗試著「翻譯」《論語》這部被中、日、台的傳統社會共同閱讀的經典，

¹⁹⁴ 「樹欲靜而風不止」出自中國典籍《韓詩外傳》，但其在日本的傳統漢學界中已經以訓讀的方式成為重要資源，甚至也因為它表達的是親子的素樸情感而廣為流傳在民間，並且收錄於教科書。

¹⁹⁵ 野間信幸〈張文環作品に表れたる漢文教養〉《東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紀要》第12期(2004)，頁78~81。

¹⁹⁶ 「我在此時常引用孔子的名言，其實他的言論，不適合於當今時代的也不算少數，不過，我所引用的大抵都是值得好好學習的」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41

¹⁹⁷ 同上註。頁44。




透過引用「適合於當今時代」的語句，尋找建設台灣文化的路徑。都市空間書寫對張文環的意義，於是也暗示了一種中介的可能性，在帝都的文化霸權，以及傳統的台灣鄉土社會之間，存在著同時作為接受文明與散播文明功能的島都空間，而這正是屬於台灣知識份子的發話位置。

而在這些都市雜文書寫的延長線上，張文環創作了《山茶花》這篇作品。這篇作品不僅具有張文環擅長的鄉土風俗人情，也描寫了殖民地鄉村少年對於台北、東京等現代都市的複雜感受。據作者言，這篇作品的創作概念是「即使是在鄉下，卻又有時代之知識階級在其中活動著，因此將其名為山茶花」¹⁹⁸而以生長於山村的「賢」為主角，刻劃他與青梅竹馬「娟」從青澀地相互思慕到漸行漸遠，終於因為賢赴東京留學，自覺與不願意繼續升學的「娟」已經難以溝通理解，而主動寫信切斷這段關係。這篇長篇小說獲得讀者的廣泛好評，箇中原因不只是張文環拿手的鄉土氛圍，更在於他利用山村鄉土的描寫再現了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的經驗，他們在殖民地的教育體系中越爬越高，尋求立身出世的道路，卻與故鄉產生難以化解的隔膜，《山茶花》的成功，正是因為描寫出似近時遠的鄉土記憶，而得到許多讀者的共鳴。¹⁹⁹這篇作品同時可以視作張文環真正確立戰爭期文學書寫路線的開端，從此之後，台灣知識青年的童年啟蒙與返鄉成為重要的母題，一再出現於張文環的小說作品中。《山茶花》中知識青年對於島都台北、帝都東京欲拒還迎，終究不得不在近代主義的誘惑下背離故鄉的描寫，也是〈父親的要求〉以來，對於殖民地城鄉關係的更深化詮釋，與前述張文環重新確認自身文化位置的歷程應有密切關聯。

回過頭來說，如何看待張文環在返台初期的「國民性」論述，其實正應該放置在他來到島都的空間轉換下來看待。與戰爭爆發前截然不同，以日報為主的文

¹⁹⁸ 張文薰，〈由「現代」觀想「故鄉」--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期（2006b），頁16

¹⁹⁹ 同上註。



學場域，使他意識到《台灣日日新報》對於島都讀者發送訊息的大眾傳媒能力，使得他一方面持續寫作台灣鄉土題材小說的同時，也透過書寫島都台北這個殖民地都市，以及與帝都東京間的關係，終於透過《台灣新民報》學藝欄的振作，找到「翻譯」傳統鄉土社會的立足點。就這一點來說，雖然張文環最特出的文學成就在於描寫山野農村，但他筆下的鄉野人情圖景之成立，卻是根基於從都市眺望懷想的視線。具備文化生產機能的都市，是身為具內地留學經驗知識份子的他，得以積極介入實踐位置的空間，返台初期張文環的「國民性」論述也因而多半只能出現在都市書寫之中，而鮮少及於鄉土書寫。我們一方面指出張文環在此時期思想趨於保守，而另一方面他對於文學工作的自我認識，是框架於「都市」（現代的）與「鄉土」（傳統的）之間的中介與翻譯，然而兩者之間始終難以獲得統一。因此當他越鍾情於描寫記憶中的鄉土故事，卻越只能書寫出孤立的片段文字，難免「風俗小說」之譏。²⁰⁰（可以〈二人の花嫁〉為代表）張文環小說中都市與鄉土空間之間的無機性割裂，這可以說是自〈父親的要求〉以來即存在的問題，²⁰¹直到《山茶花》的寫作，才找到一條解決的方法，亦即作家=知識份子的主體性介入，將城鄉關係有機性地納入故事之中，這也成為我們在討論張文環戰爭期的鄉土小說創作時不能忽略的創作特色。

²⁰⁰ 「風俗小說」是評論家在描述轉向作家武田麟太郎作品中，常以聲色場所的紅藍綠女為速寫對象，卻缺乏思想或理念重心時使用的概念，也曾被用以質疑張文環小說中的鬆散特質。張文薰，〈「風俗小說」的迷思〉。

²⁰¹ 將鄉土題材放置於暗示殖民關係的城鄉架構的〈負重〉，卻因而成為少數的佳作。



第二節 作為（反）近代化的女性問題

前一節討論張文環在返台初期的活動，並且指出他企圖以文化知識份子的姿態展開活動，逐漸穩固在台北文化圈的位置；在一邊創作鄉土題材作品的同時，張文環利用雜文的形式書寫在東京與台北兩個都市的感懷，也明確化了自身觀看鄉土的立場。對他而言，「文明」的確是在都市中人們生活的重要指標，而他也樂意從近代知識份子的經驗和學養作一個指導者。在此同時，也可以看見他試圖化用《論語》等漢文傳統的思想資源以為己用。張文環對於市民共同體生活的批評和建議，試圖用近代文明與漢文思想傳統加以規範，本就具備了形成倫理論述的潛力。而當他將目光聚焦於都市中風俗業女性的同時，我們也反向可以窺見自許為近代知識份子的張文環，如何在性別的層次構想倫理秩序，並且利用城市與鄉土的對比以強化這樣的思想理路；同時，這樣的倫理論述也與戰爭時期的國家動員有著曖昧的關係。

談到張文環筆下的女性描寫，一般論者多半強調他描寫女性在封建社會下受壓迫的一面，為了女性的自主權益發聲。²⁰²而柳書琴、游勝冠更是分別從不同的路徑，指出張文環的女性書寫不只想要反抗傳統社會的封建父權文化，也同時是抵拒殖民者的象徵。²⁰³這樣的研究成果，正是立基於〈藝妲之家〉、〈閩雞〉等以女性情愛追尋歷程為主題的作品之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張文薰對於〈藝妲之家〉等作品的解讀，放置於張文環在戰爭期發表的社論雜文、座談會紀錄等文脈之中，指出他的男女性別觀點其實仍帶有父權中心的色彩，反映出男性近代知識份子的實踐侷限。²⁰⁴正如前文所述，張文環對於自身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很大程度框

²⁰² 如津留信代(1995)〈張文環作品裡的女性觀——日本舊殖民地下的臺灣(上、下)〉，《文學臺灣》，v13~14，頁171~210，194~218。江寶釵(2000)〈張文環〈閩雞〉中的民俗與性別意識〉，《中國學術年刊》21期，頁447~464。

²⁰³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

²⁰⁴ 張文薰，〈評論家/小說家的雙面張文環--以藝妲·媳婦仔問題為中心〉，《臺灣文學學報》第3期



架了他的倫理論述生產。〈藝妲之家〉描寫的，正是在都市中前現代的性產業女性工作者，為什麼張文環認為自己必須，且有能力為這樣的群體做出價值的評斷，以及指出一條更生的道路？不能只從作家精心營造的文學作品再現中去觀看，而必須瞭解作家其他公開言動中反應的實踐位置。

發表於 1941 年〈藝妲之家〉，如同題目所述，描寫的是臺灣自清代以來的特殊風俗產業，和平價、以賣身為主，亦存在於鄉間的「土娼」不同，藝妲是都市空間中繁盛的商業、文人社群活動下的產物，主要從事活動賣藝、陪酒、應酬等等活動，而不一定涉及賣身。前述提到的雜文〈大稻埕雜感〉中，張文環強調大稻埕的風俗產業「非文明」的性質，突顯了知識份子凝視城市「他者」的角度，是初返台時的姿態。²⁰⁵而在 1940 年通俗雜誌《台灣藝術》創刊後，張文環也參與了一場由該雜誌社主辦的「大稻埕女服務生、藝妲座談會」(1940.8)，與這些女性對談，涉及愛情、婚姻、媳婦仔制度等話題，苦口婆心地勸說她們「靠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幸福」²⁰⁶，因此這篇作品可以視作他長期關心此議題的結晶。

〈藝妲之家〉以台北的大稻埕作為主要敘述空間，開頭以藝妲采雲的情人楊秋成的內心獨白開始敘述，心緒與回憶不斷流動，臆測與現實交錯，也凸顯了在都市空間的戀愛敘事特色。轉換成采雲為主的敘述之後，則增強了寫實的色彩，敘事者的評論也往往打斷情節進行，往往充滿道德評價的判斷。采雲自小經歷過的低階工作，如盲人隨侍、茶行女工等，是城市底層庶民的生活寫照。經過朋友的推薦，她終於得以進入時髦光鮮的大稻埕商家工作，與好友談論資本主義、戀愛至上等話題，與老闆兒子的朋友陷入愛河，呼吸著都市中文明開化的氣息。然而，小時候因為養母的貪慾，曾失身於茶行老闆的陰影始終未曾遠離，更導致了

期(2002)

²⁰⁵ 描述藝妲、女給現象時指出「她們講話的聲音很高而且步調一致，被老鴿子帶著消失於昏暗的巷子裡。這樣的女服務生群，想到將來也有必要每一個人給一個丈夫，我便覺得碰到社會的大問題而心裡慌張失措。不過，她們真的每一個人都能做家庭主婦嗎？也不無疑問。」(張文環，2002，卷7，頁22)

²⁰⁶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7，頁129。



初戀的破局。在此，都市的啟蒙氣氛已經無由引導女性走向幸福，反而狠狠將其推落人性貪慾、歧視的陷阱。采雲成為藝妲後的生活空間，也與張文環在隨筆中批判的大稻埕情色化地景一致。采雲在養母的安排下走上藝妲之路，雖然始終不願陪宿，堅持賣藝不賣身，甚至對賣身的好友懷抱憎惡感，終於再次找到戀人的她，卻無法鼓起勇氣脫離母親的掌握，而只能沉溺在軟弱的情緒中，面對混沌的未來，望向映著曉雲的淡水河面，湧起了輕生之念。

事實上，張文環對於藝妲的關注，並不止於同情其悲慘遭遇，更進一步在爾後的〈無可救藥的人們〉(1942.6)、〈老娼消滅論〉(1943.11) 等文章中大聲呼籲，²⁰⁷認為「單憑我們的力量是無法達成『島都』台北明朗化的計劃的」²⁰⁸、「我們必須期待當局的用心計策和民間的協力」²⁰⁹希望透過國家的禁止消滅都市中不斷擴張的性產業文化。可見得在皇民化運動的浪潮下，張文環的確期待與當局的合作，希望達成本島人都市空間的文明化、現代化。一方面，這種對於本島人風俗空間的嫌惡，更蘊含了對殖民城市中差別對待之自覺與不滿。²¹⁰故事結局中，采雲無法果斷地拒絕家庭束縛，追求愛情，反而軟弱地繼續沉淪，另一方面，采雲與同業的交際往來也成為她不思上進的原因：

在台北生了私生子時，男人是會有困擾，女人卻可以沉浸在藝妲的社會，經過三四十年就被叫祖母，可以去找附近的不良老年打麻將，或玩五色牌，過有閒夫人一般的快樂生活。如此一天一天過去了，卻散漫地過一天又一天。²¹¹

由此可見，在〈藝妲之家〉中的本島人都市空間，呈現了人性負面的貪慾、

²⁰⁷ 俱發表於《民俗台灣》。

²⁰⁸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116。

²⁰⁹ 同上註。頁186。

²¹⁰ 日治時期，相對於日本人將遊廓設置於萬華，即遠離城內生活區的本島人社區，本島人的風化場所則散佈於萬華、大稻埕等自身的生活區域。

²¹¹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頁235。




怠惰、誘惑等形象，此問題的解決，若對照張文環日後的公共言論訴求，則指向了警察權威的介入，²¹²將都市空間的文化治理訴求國家權力介入解決。張文薰指出，張文環將藝妲問題的根源追溯至媳婦仔制度遭老娼濫用，並呼籲當局加強取解決；這代表了張文環從身為關心此議題的知識份子身份，嘗試了有別於單純服從或反抗殖民者的實踐路徑。²¹³但在這裡值得追問的是，知識份子選擇與他所關心的對象保持何種距離？在前述的「大稻埕女服務生、藝妲座談會」中，張文環毫不掩飾地展現知識份子的角色，並且建議她們自由戀愛結婚、不要讓下一代操持賤業等等，但始終無法給出具體的方案，只能重複說著「單獨的時候也要維持堅強」²¹⁴，因此在場的女服務生、藝妲們的回應是消極的，就算這位文化人提出的話題讓她們感興趣，對話也往往在三言兩語之後無疾而終。具體來說，這是一場沒有交集的座談會：扮演指導者角色的張文環並無具體的想法，只能操弄膚淺的同情語言，扮演被拯救對象的底層女性們（subaltern women）的意見不被重視，顯見主辦方用意只在炒作，增加雜誌的話題性。張文環會被邀請，除了曾經寫過相關的文章，與主持《風月報》和文欄的經驗也是密不可分吧。由於這樣的經歷，可以說他不僅僅是從外部觀看，而有絕佳的機會透過風俗業女性的寄稿接觸到她們的所思所感，並且與之對話。但是從結果來看，張文環選擇在《可愛的仇人》電影拍攝計畫告吹後便離開《風月報》，專心投入自身的文學創作，顯然在意台灣文學在純文學素質上的提昇，而非真正進入通俗文學的場域，並與他宣稱關心的弱勢群體發展更進一步的關係。²¹⁵

²¹² 張文環參與寫作此篇小說前的「大稻埕女給、藝者座談會」（1940）時建議這些女子可以尋求台北北警察署長協助，而在後來一連串批判養女制、娼妓行業的文章中也不斷訴求當局做出禁制的政策。根據竹中信子（2009），當時的北警察署長榊原十分重視養女問題，進行了救援行動與改善待遇的措施（頁 202）

²¹³ 具體的來說，則是和台北帝國大學教授金關丈夫一樣，在保存並改良台灣民俗的同時，採取口號與姿態上配合當局政策的方向。

²¹⁴ 《張文環全集》卷 7，頁 129。

²¹⁵ 張文環曾主持《風月報》和文欄，實際編輯藝妲、女給的文學創作，但因為感受到作品品質不足而失望離開。筆者曾另有專文論述，參見吳嘉泓，〈試定位《風月報》和文欄中的「新文藝」路線——以作為書寫對象與創作主體的女性形象為線索〉，收錄於許素蘭主編《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第十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頁 337~364。



吳若瑩（2009）站在肯定妓權的角度，認為張文環的廢娼思考可以用「反城市」（anti-urbanism）的道德重整稱之：亦即，面對藝妲在殖民現代性的摩登文化影響下越來越不受拘束的身體，男性知識份子難以抑制心中的焦慮，因而從鄉村價值出發，訴諸「養女風氣」的遏止與導正，希望將這些勞動力趕回人手不足的農村。²¹⁶張文環將島都的藝妲問題道德化，認為是「老娼」的壓迫所致，卻忽略台北自清代以來便有藝妲的活動，「老娼」亦是在父權社會的限制下，只能藉由購買養女，令其操持賤業，以維持生計。張文環的焦慮與其說是擔心這些女性的處境，不如說是對道德淪喪的憂慮²¹⁷。吊詭的是，從早期訴諸都市公民共同體，到戰況危急時開始訴諸鄉村共同體，期待風俗業女性能夠被農村所吸納，這樣的倫理想像雖以弱勢女性群體為規範對象，卻幾乎不顧慮對方的需求與渴望，一律以「貪慾過剩」的刻板印象視之（〈無可救藥的人們〉（1942.6））因此當張文環以文化人的身份撰述為文、大聲疾呼的同時，卻更反過來映照出他對於生產一套倫理論述以規範女性的焦慮感。這樣的狀態不僅發生在風俗業女性，也出現在張文環看待鄉村女性的視線之中。

早期張文環描寫鄉土的女性，往往具有突破禮教、自由奔放的特色。例如早期的〈落蕾〉、〈貞操〉，返台後的〈辣薤罐〉、〈闖雞〉，這也往往為論者津津樂道，認為反映了作家的性別意識。然而以大受好評的〈山茶花〉（1940.1~5）為始，張文環開始創作符合傳統溫婉形象的女性，這樣的角色未必與女性自主的理想衝突，但卻時常具備襯托出作家理想倫理秩序的功能，這樣的作品可以〈地方生活〉（1942.10）為代表：故事中接受現代化教育的女性因違反鄉土倫常被排斥，而作為具傳統美德女性的對照組。而另一方面，張文環在描寫女性追求自主歷程的同時，也往往寄予了身為男性知識份子的投射，以下將以〈闖雞〉進行詳細的分析：

〈闖雞〉這篇小說可稱作是張文環的代表作，不僅在當時改編成舞臺劇，由

²¹⁶ 其見解見〈高級娛樂的停止〉（1944.3）、〈養女的躍進〉（1944.4）

²¹⁷ 頁 28~30



名劇作家林搏秋撰寫劇本，獲得熱烈迴響，在當代也以其「女性自主」的意義而受到特別關注，由臺南人劇團再次改編為舞臺劇演出，《印刻》文學雜誌也曾也專題大幅介紹。²¹⁸故事的女主角月里，夾在夫家與娘家的利益盤算之間，因而斷送了自己的婚姻幸福。這件悲劇還牽涉到鐵路建設的投機生意失敗的背景，月里的婚姻是作為生意投資而做的買賣祭品，終於毀於兩家家長的貪婪。而近來的論者意見，可從「女性主體」(female subject) 與「殖民主體」(colonial subject) 兩方面的角度歸納：前者強調月里不受到家父長制婚姻的限制，追尋個人的自由戀愛，找到女性情慾的主體性；後者則認為月里身為女性的悲劇是在殖民統治下作為被殖民者的象徵縮影，正如鐵路帶來的殖民現代性破壞，蘊含著張文環抵殖民的意識。²¹⁹

然而，上述討論方式的主要方法是將月里這名角色的處境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卻忽略了小說花了極大的篇幅在描述鄭家（月里的夫家）一族的歷史及地方關係，以及與林家（月里的娘家）間的恩怨，從而鋪敘出「SS庄」空間（及其鄰近地區）的社會關係此一主要結構。²²⁰正如小說中不時出現的插敘，將鄭家的諸多事件與許多庄民都熟知的共同記憶互相比擬，營造出家族與地方的共感，不管是月里、其丈夫阿勇，以及後來戀愛的對象阿凜，也皆身處在此一鄉村社會中緊密的人際網絡之中，而正是在此地社會關係的劇烈變動之中，才發生了三人的悲劇事件。建構這樣的觀察角度，並非是要抹消月里具有的女性主體之意義，反而

²¹⁸ 見《印刻文學生活誌》59期（臺北，2008），收錄有：編輯部，〈有理由的反抗：跨時代經典劇作《閩雜》完整演出、編輯部，〈閩雜〉劇情概要〉、楊照，〈殘廢者的生命尊嚴——重讀張文環的〈閩雜〉〉、陳玉慧，〈女性自覺是悲劇？——也談〈閩雜〉的女性形象〉、藍博洲〈麥子不死——《閩雜》之前與之後〉，等文章。

²¹⁹ 前者如津留信代，〈張文環作品裡的女性觀——日本舊殖民地下的臺灣（上、下）〉，《文學臺灣》13-14期（高雄：春暉，1995），頁171-210，194-218。江寶釵，〈張文環〈閩雜〉中的民俗與性別意識〉，《中國學術年刊》21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2000），頁447-464。後者則如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

²²⁰ 據柳書琴的推測應為當時嘉義梅山地區的小梅庄。參見氏著，〈從部落到都會：張文環《山茶花》與近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收錄於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張文環》，頁215。

是要在這個張文環建構起的「地方倫理」網絡中，看見作為「他者」的女性被賦與了什麼特殊意涵。



〈閩雞〉的故事結構，先以月里與丈夫阿勇在家道中落後的悲慘生活起始，描述由於種種精神打擊而成為廢人的阿勇，以及月里在孤寂之下答應扮演祭典中的「車鼓旦」一角，²²¹引發庄民圍觀痴狂，卻因有礙風俗而受到兄長打罵斥責。以此為線索，敘事者反而牽引出月里的自白，表現出她受到娘家斷絕往來的事實，讓這樣的干涉顯得更為不堪：「如果你真正親切地關心我，就不要只在祭典的時候才來。每個月都來啊，還有也帶爸爸和媽媽來啊。不然，你就不要叫我妹妹。要飲我的血的時候，我才是你的妹妹，這種想法，我不要接受。」²²²接下來，敘事者更深入地描寫月里的寂寞，其實與家道中落後和娘家失去聯繫有關：

丈夫還沒有患這樣的病以前，還有患病以後，也有過一次，父母親以及堂姊夫等一起來到這裡，姊夫的手錶放在桌子上神像邊，而大加讚美自己未結婚之前的女孩子時代，大家回去，錶也不見了。太陽炎炎照射，晒暖棉被。那是客人用過的棉被。一隻蜜蜂不知怎樣飛進來的，嗡嗡地響著，迴響在屋裡。月里匆忙把棉被收進房裡，寂寞就一起全衝上來，覺得胸口都被壓碎了。好像是從那天起，自己的不幸就開始了。²²³

這段對於女性心緒的描寫極其詩意，也深入地傳達了月里身處的困境。其實，與其說針對父權結構，不如說小說的陳述傾於揭露一個崩壞的家族關係。正如前述，此時期的張文環對於傳統的倫理情有獨鍾，甚至賦予它理想的色彩，相較於

²²¹ 「車鼓旦」指的是在臺灣傳統漢人的地方小戲「車鼓戲」中，有丑、旦二角，一般皆由男人扮演，劇情多與男女私情有關，丑角挑逗旦角，旦角則含情羞怯、眉目傳情，在鄉間地區受到婦女的喜愛。參見江寶釵，〈張文環〈閩雞〉中的民俗與性別意識〉，《中國學術年刊》21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2000），張文環在小說中則指出，由於受到客家戲曲的影響，民間廣泛流傳的歌仔戲也出現女角由女性扮演的現象，村人也有想要跟進嘗試的念頭，月里本人也受到很大的刺激。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45。

²²²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48。

²²³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50。



上一節討論的〈地方生活〉、〈閩雞〉中兩個相互盤算利益、各懷鬼胎的姻親關係顯得十分不堪，可以說反而是以負面的角度突顯了作者對於理想婚姻關係的想像，是以人情義理為基礎，而非架構在金錢利益的交換之上。小說中段描寫鄭家先代起經營的福全藥房，原本秉持公道的經營態度，成為地方上的有力人士，卻在阿勇的父親三桂手上改變作風，歧視貧窮的客人，而終於遭到投資失敗等連續的報應，使得家族命運衰落，也不再受眾人敬重。與其結成姻親的林家，也是意圖透過月里的婚事奪取鄭家的產業，成功後反而對投資失敗的鄭家不聞不問，毫不顧念親情。將月里的不幸命運放在整個小說的脈絡觀察，可以發現這是一曲對於鄉土倫理崩壞的輓歌，其中蘊含了張文環對於地方倫理重構的思考。

正如小說敘事者在開頭便言明「假如改從月里的立場來說，既然要制定多管閒事的道德規律，這些民眾的目光為什麼不投向逼迫一對男女，不得不墜入這種地步的事件呢？」²²⁴兩個家族基於金錢利益而非人情義理定下這齣婚事，的確是造成月里與阿勇婚姻失敗的重要事件。就小說的描述來看，這對夫妻的感情算得上融洽，但由於鄭家種種變故接踵而來，使得精神軟弱的阿勇無法支撐，淪為痴呆的廢人。正是由於人們投身於現代化的浪潮，顧於追逐金錢慾望而捨棄合作互助的群體倫理，使得月里的婚姻不得不失敗，而敘事者對於福全藥局的招牌「閩雞」之評論：「去勢就會造成虛榮，而虛榮是毫無基礎的」²²⁵也都符合張文環此時期在「地方倫理」論述中對於物質慾望的批判，以及看似懷念傳統倫理，實則抱持著知識分子的姿態而期待對於鄉土能有所建設革新的路徑。

如果回到月里對於幸福的追求歷程，可以看到張文環對於現代性的積極一面，亦即自由戀愛的正面評價。在丈夫阿勇淪為廢人的情況下，月里先是透過車鼓旦的表演展演自己的身體，與村裡的男性眉目傳情，卻發現淨是沒有骨氣的傢伙，直到身負殘疾的阿凜登場。讀過公學校的阿凜，具有繪畫的才能，抱著到外

²²⁴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46。

²²⁵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52。



地學習藝術，描繪現代事物的志向。由於條件不如人，由父母決定婚事的他，只能與毫無感情而其貌不揚的大頭仔阿凜結為伴侶，鬱鬱寡歡。月里由於幫傭的關係而接近阿凜，知道他的志向而受到吸引，感到自己也是被限制在某種環境限制下的「殘廢」，兩人交流這種精神性的覺悟，而互相愛慕，終於為眾人不合而相伴殉情。相較於〈地方生活〉中對於傳統婚姻型態的謳歌，此處則沿襲了 20 年代以來臺灣知識分子對於傳統婚姻但有肉慾，而缺少精神結合的批判。²²⁶透過月里與阿凜的精神式戀愛，突顯其不足之處。這裡的批判對象很難說是針對傳統婚姻的父權中心，相反地，兩人純精神性的戀愛模式，反而可以說是日治時期鼓吹戀愛結婚的男性知識分子的理想具現，月里身為女性的情慾自主雖在故事前期曇花一現，終究還是收納在「同志」般的啟蒙戀愛關係之中。²²⁷

最能呈現問題點的，是月里對於阿凜的妻子之凝視視線。阿凜的妻子大頭仔，小說中僅設定其「頭大，手腳都很小，每天早晨要梳頭髮，都要小姑幫忙她綁結」，卻也被視作身體缺陷，然而在月里的眼中，這與阿凜或她自己的「殘廢」是不一樣的：


大頭仔在院子裡邊趕走要來啄稻穀的雞……看了大頭仔，卻會產生了一種敵愾心，感到嫌惡。看到大頭仔覺得她好像是殘廢的一塊肉。自己是人變型的另一種人，雖然是殘廢，但是自負自己持有寶貴的東西。譬如說，大頭仔是天生的雜種，自己是被壓碎而變成的筍根那麼具藝術性的深度。²²⁸

此處月里對大頭仔強烈排斥的視角，似乎並不只來自於嫉妒的情緒，此段月

²²⁶ 洪郁如指出，20 年代盛行在臺灣人知識分子間的戀愛結婚論，是認為沒有愛情的婚姻只有肉慾，是動物性、未進化的表徵，就演化論而言，具有精神性戀愛的婚姻的層次較高。參見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 194-196。

²²⁷ 阿凜與月里的戀愛關係是透過精神性的交流達成的，例如阿凜幫月里作畫，兩人討論人生意義的話題等，鮮少及於情慾之事。這點與月里在扮演車鼓旦前後，與男人互送秋波的情慾展現恰成對比，或可看做是作者的有意安排。當兩人的精神相通，認知彼此的「殘廢」處境，阿凜喊出一聲「同志」，最能代表兩人的戀愛型態與意義。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2，頁 188。

²²⁸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2，頁 186。



里對大頭仔的心理拒斥，與她利用「殘廢」建立自我認同的時間點是極為接近的。可以說，對大頭仔的貶抑與排斥成為月里自我認同的基礎。透過強調對方是「一塊肉」、「天生的雜種」，把她與經歷各種倫理秩序崩毀而終成「被壓碎而變成的筍根那麼具藝術性的深度」的自己區分開來。具有象徵性的「殘廢」意象，指的便是想要掙脫現有環境限制，爭取自由戀愛，此種殖民現代性下誕生的、具有啟蒙與反封建意味的話語。值得玩味的是，月里與大頭仔同為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村婦女，對自由戀愛的追求，竟得以讓月里在自我認知上一舉躍升，轉而卑視大頭仔這名從小即接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觀念教養（正如月里自己一樣），主體性建立在傳統道德規範上的婦女。藉由決裂於傳統農村婦女的缺乏啟蒙與毫無自覺，月里得以將自己體內異質的、不符合戀愛話語系統的「封建性」排除出去，投身於愛情的精神境界之中。張文環在此處的書寫，其實不只牽涉到對於傳統農村婦女的刻板貶抑，更透漏了他作為近代知識份子，企圖建構鄉村的地方倫理之同時，更展現對現代性的強烈欲求。在此，作為傳統鄉土倫理中「他者」的女性月里，反而得以成為張文環建構兼具鄉土感與現代性的「地方倫理」之基點之一。

不管是阿勇或是阿凜，都是在新式教育下懷抱理想，而對澆薄的鄉土價值觀無法適應，引發了各自的悲劇。由這點來看，這兩位男性正是接受現代化洗禮下，一暗一明的對照組：阿勇因為性格較為軟弱，無法承受鄉民嘲諷的壓力，而終至精神崩潰，阿凜則在月里的幫助下，擺脫家族的束縛，奮而為愛犧牲。²²⁹相較之下，月里則是一名勤奮勞動、不怕吃苦的傳統農村婦女，但又能接納受教育男性的文明戀愛理想。對比於〈地方生活〉的女學校畢業生淑，可以看出張文環對女性描寫的價值判斷取向，正是夾在傳統倫理與現代性的慾望之間，而不觸及、動搖男性在家庭／家族中的權力位置。某方面來說，正是透過書寫返鄉的知識份子、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青年等青壯年世代的失敗、慾望與焦慮，張文環突顯了自己

²²⁹ 小說中也描寫到雙足不便的他勉力撐著工具去找月里的橋段，相較於意志力薄弱，受不住家庭變故而精神崩潰的阿勇，似乎更顯示了阿凜的優越處。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88。

在公共論述中不斷強調的臺灣社會的倫理現況問題，複寫了二二零年代以來臺灣知識分子對於現代化進程的迫切要求，以及戰爭意識型態下文化人重省地方風俗傳統的思考。



總的來說，張文環在戰爭其的公共言論強調傳統道德的美好，批評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物慾橫流，希望政府與社會可以透過積極的動員與取締，改善社會的風氣。張文環雖然處處強調傳統價值，排斥都市的金錢生活，卻也往往以「文明」、「教育」、「國家」等角度支持上述的倫理論述，是一種「反城市」(anti-urbanism)的道德重整，可見張文環的倫理論述與國家現代性難以分割的關係。這也是當張文環在文章中大聲呼籲「單憑我們的力量是無法達成『島都』臺北明朗化的計劃的」(〈無可救藥的人們〉(1942.6))、「我們必須期待當局的用心計策和民間的協力」(〈老娼消滅論〉(1943.11))之時，難以避免的特殊位置。另一方面，張文環在小說中塑造出美好的古典傳統女性美德，但同時也期待她們能夠理解現代的文明、知識、戀愛，是他同時反對物質慾望的資本主義，但又對國家體制的現代化欲拒還迎的矛盾顯現，也是對自身作為男性知識份子的自我確立方式。



第四節 作為理論與實踐的鄉土倫理

回過頭來，又該如何看待張文環在作品中不斷出現的鄉土倫理論述？在同時代的台灣文壇中，張文環的「風俗作家」傾向，是最被討論的特質，這本來指涉的是作家偏向對世相的單純描寫，卻不重視思想觀念的傾向，同時更影射了從左翼運動脫退的思想脈絡觀察。²³⁰但是到了戰後的台灣文學研究，張文環小說的「風俗」特色不但被「鄉土」的概念代換之，從民族主義的視角給予正面評價，也因為他時常描寫小人物庶民的各種形象，而被視為具備了左翼關懷的視野。民族與階級這兩種屬性，在針對張文環作品的前行研究中，已經成為反覆被論證的兩種重要命題，游勝冠也正是在這種趨勢之下，甚至將兩者視為張文環「同型異構」的思想特徵，而對於張文環支持女性自主意識的讚揚，也往往在這樣的脈絡中被標舉，可以說形成了民族、階級、性別「三位一體」的論述結構。²³¹問題是，這樣的描述方式扁平化了這位知識份子的複雜性，代之以「鄉土文學」此一誕生於戰後本土化運動的政治正確概念加以描述。不管在西歐的現代化過程，或是台灣的經驗，「鄉土」這一概念對於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建構形成居功厥偉，但論者在使用時鮮少反省現代國家本身的暴力性質，因此沒有看見張文環在「傳統—現代」、「民族—國家」這些矛盾中的曖昧游移、進退失據。延續此前對於倫理論述的討論，張文環對於鄉土倫理的建構，其實正是對於戰爭時期日本帝國國家倫理的回應，應該被放置在彼時台灣人知識份子的實踐路徑中加以理解。

從張文環歷來的作品可知，他習於以自身的生命經驗形構出台灣鄉土的面貌，在當時的台灣文壇上博得盛名；相對的，除了〈藝妲之家〉以外，他描寫都市經驗的作品往往反應寥落，甚至遭到批評。²³²當代學者也因而考究出其作品中描寫故鄉梅仔坑的訊息，以作為其熱愛鄉土的證據，甚至引發當代梅山地區的將

²³⁰ 張文薰，〈「風俗小說」的迷思〉。

²³¹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

²³² 如〈父親的要求〉、〈憂鬱的詩人〉



作家與〈閩雞〉、〈夜猿〉等作品納入社區營造意象的迴響，則或非本人所能預見的。然而，日本都市社會史學者成田龍一提醒我們，「故鄉」本為在現代化浪潮下進行空間移動的知識份子，在遠離原生地的情境下，以都市為背景形構出來的理念形象，並非有真正純粹的故鄉面貌，它之所以被廣泛討論，也往往與國民國家的形成或轉型密不可分。²³³張文環在作品中所書寫的「鄉土」本非真正紀實、即時性的書寫，而是赴都市求學、工作後對於遠方鄉里的追懷與寄託，著迷於個人經驗的召喚，與同輩知識份子的鄉愁經驗發生共感，是其獨特的風格。「鄉土」的召喚是集團性的，得以凝聚這批經歷殖民現代性洗禮的台灣知識份子對於台灣母土的情感，同時也含納了都市與故鄉的複合認同，徘徊在傳統與現代性的誘惑之間。²³⁴從張文環創作於1942年的〈地方生活〉這篇小說，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到他如何建構同時具有現代性與傳統性質的「鄉土倫理」。

〈地方生活〉講述一名自東京留學回到家鄉的青年「澤」，由於無法順利謀職而決定先與父母決定好的對象結婚。一反20年代以來的自由戀愛論述多將家長決定的婚事視作封建遺毒，主角澤對此事抱持著正面的態度。婚姻對象是父親摯友的長女「婉仔」，兩家家長自幼是書房時代的青梅竹馬，往來十分密切，而在孩子未出世之時就訂下姻親；對方次女「淑」更從小送至澤的家中撫養，因緣際會下跟著澤至外地接受了新式的中等教育（即高等女學校）。相較之下，澤的未婚妻是自小接受傳統漢學教育，熟知傳統的倫理道德。故事內容主要在描述澤回到位處鎮上的老家，隨著父親至山中探訪已遷居至部落的好友，並且與未婚妻見面，透過簡單的互動，澤與父親都瞭解到婉仔是適當的媳婦對象。在新婚之初，婉仔剛加入澤的家庭過著融洽的生活，卻得知父親重病的消息。澤的父親將摯友接至家中照顧，卻不見起色。當病況越加惡劣，山中的親戚都趕來探望之時，次女卻擔心著遺產分配的問題，為著要嫁給作醫生的未婚夫婿一事盤算，而非擔憂父親的

²³³ 成田龍一（1998），《「故鄉」という物語 都市空間の歴史学》，頁成田龍一，《「故鄉」という物語 都市空間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同上註20-23。

²³⁴ 同上註。同上註。

病況。澤發現此事之後，知道無法改變次女的想法，不禁感嘆社會道德的走向將會如何。故事就在此嘎然而止。



在這個故事之中，結構上最為鮮明的是「近代—反近代」的對照組。澤的父親「王主定」及其好友「楊思廷」分別是象徵著「近代」與「反近代」生活的兩家人。雖然兩家人曾一同搬到鎮上做生意，但感覺到土地才是生活的根，楊家因而決定搬回到老家的部落裡，對下一代的教育，即使是男性，也只是讓他們學習傳統的四書五經，而非進入現代教育體系；相對之下，澤與寄養王家的淑，則是到了都市中接受中等甚至高等教育。在深山的部落，楊家過的是與世隔絕，生病也要自己準備藥草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養成的少女婉仔，也深諳傳統倫理與人情世故，作為媳婦十分得王家喜愛。而接受現代教育的澤與淑，卻時常搞不清楚待人接物之理，需要長輩提醒。故事開頭，母親用咖啡迎接從東京回來的澤，讓他感受到故鄉的變化，讓澤去東京留學也是為了「學習現代的學問」的意識下所做的決定，種種因素，都說明楊家較敏感地接受現代化的生活，而有別於王家的有意遠離。然而，這並不是說兩家人的差別是對立性的，相反地，楊家的決定是源自於王主定的理想：

「上澀就不會攝」²³⁵

意思是年齡超過四十就無法掙扎，做生意沒有根。而耕農有土地，種下的東西會萌芽。這原來是王主定的想法，但是思廷時常有不把王的理論，親身實踐就不罷休的個性。要在俗世跟人家爭利而生活，寧可過著以自然為對象的生活才能快樂。土地是不背叛人的，假如被背叛了也卻較容易想得開。這就是主定的理論。因此，可以說思廷這個人是主定的理想對象，能

²³⁵ 「上冊袂攝」（音讀：tsi ũ nn-siap-b ē-liap/tsi ũ nn-siap-bu ē-liap）釋義：冊為四十的意思，上冊表示人到中年的意思。這句話表示人到中年萬事休，生理機能走下坡，心理也逐漸失去青年時期意氣風發的理想。引自「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twblg.dict.edu.tw/>）最後查詢日期：2013/4/24。



把自己喜歡的事予以實踐的人物。²³⁶

也就是說，楊家的「反近代」生活其實也是王主定的理想實行之後的結果，這賦予了它一種相對於現代的學問、知識之下的實踐性格，「反近代」的行動其實某方面也脫胎自「近代」。這可以從敘述者解釋，楊家之所以能順利回到家鄉生活，是因為阿里山鐵路的開通致使生活改善這點加以佐證。對於張文環的小說中「市鎮—部落」空間所象徵的「近代—反近代」情結，雖然一般的論者多解釋為對「近代—殖民統治」的排斥，²³⁷然而從此處可以看出，兩者並非對立，甚至可以是「理想—實踐」的關係；也就是說，在 40 年代初「地方文化」運動的理想之下，張文環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角度回望鄉土，塑造了它所代表的理想性質，把鄉土當做一個連結人與土地、傳統倫理價值的特殊空間。

在這種結構之下，主角澤的婚事就額外具有象徵意義。正如前述，這是一場「指腹為婚」的婚姻，主角經歷過在都會東京的戀愛，領悟到那只是「現代女性虛榮的縮影」²³⁸，回鄉接受家長的安排，本身即是一種知識分子「回歸鄉土」的絕佳象徵。在與婉仔的弟弟阿海的對話中，對於阿海在傳統漢學的濃厚興趣，澤表示：

譬如你在想的中庸之道，如果據於狹窄的論語性，或儒教性來思考，而不考慮事物及現代這個科學進步的社會道德的話，那麼，中庸反而無法得到真實的中庸吧，因此，如果能夠思考新的東洋文化的話，在此會產生新的中庸之道啦，這點才是困難。²³⁹

澤所提出的「新的東洋文化」，正是一名知識分子透過新式教育而瞭解近代社會的巨大變動下產生的思考。在大東亞戰爭的背景下，這樣的思考也具備著排除

²³⁶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3，頁 7。

²³⁷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

²³⁸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3，頁 10。

²³⁹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3，頁 22。



西方文化、強調東洋優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潮作為基礎，提供了張文環，以及澤這名新知識分子重新審視中庸、論語等傳統漢學經典的立足點。在此處，傳統漢學的修養與鄉土的倫理道德緊密連結，支持了張文環的地方倫理論述之樣貌。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近代事物都能夠順利納入張文環心目中地方倫理的構圖。正如前述所提到，「地方文化」的提倡，本身就包含了對於都市文明、物質慾望的排斥，在張文環的都市雜文中，則明顯地將都市中的風塵女子視作道德敗壞之下的產物，而企圖用傳統倫理的話語加以導正。在〈地方生活〉之中，則是將自小與澤一同接受新式教育的淑視做近代性中代表物質慾望，而必須加以否定的象徵。小說中婉仔、淑這對姊妹互相比較的場合，多半在凸顯婉仔的善體人意、知所進退，另一方面，則呈現淑的莽撞無禮，雖然這樣的矛盾多在親友間的談笑化解，卻為結局的衝突埋下伏筆。當澤同父親來到山中部落探訪楊家，澤穿著學生制服，雖在大都會中看似失業者，「在這山裡反而覺得奢華」，²⁴⁰見到楊家姊妹，兩人卻是「穿著女學生的裙子，上衣是臺灣服的淑，跟上下都穿著臺灣服裝的婉仔，澤從衣服似乎看到兩位姊妹趣味的差異。」²⁴¹這則是另一處突顯姊妹倆人在「近代一反近代」象徵中的敘述。然而，即使澤與淑同樣是接受新式教育而與鄉土有所隔閡，敘事者卻強烈表現了男女有別的意識。例如當澤隔了近十年重新見到婉仔，思考自己勞苦的生活是否會讓婉仔受苦，心中接著浮現的卻是：「或許像淑那樣的女孩，看起來比較能吃苦耐勞，但是那樣現代感的女人，總會很任性而現實，具有喜歡追逐享樂的形象。」²⁴²正如同張文環在〈關於女性問題〉中批評現代女性喜歡享樂而忽略家庭，妹妹淑的形象作為姊姊婉仔的對比，被敘事者強烈的道德意識所指責。當澤參觀婉仔的弟弟阿海的房間時，牆上貼著由婉仔所繪，

²⁴⁰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頁16。

²⁴¹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頁27。

²⁴²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頁21。



主題為「陳杏元和番」的畫作，也同樣是針對女性婦德要求的道德象徵。²⁴³

李永熾、林繼文的研究顯示，日本帝國在打造「國防國家」的過程中，不管在政治宣傳或經濟統制上都呈現致力於抨擊西方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加強資本與國防國家的密切關聯，塑造保守的集體主義之現象。²⁴⁴楊雅慧的分析則指出，在戰時體制下政府對女性的動員與教化，「勤勞觀」是被強調的重點，包括藉由勞動能夠體會新的人生觀、女性必須代替參與戰爭的父兄從事勞動、沒有勞動而悠閒生活是可恥的等。勞動女性的姿態被描繪成美麗的，鼓勵女性不施胭脂、勤儉為國。²⁴⁵在張文環的「地方倫理」話語中，則可以發現這種意識型態與傳統漢人家父長社會的倫理道德合流的情形。接受近代教育，而沒有辦法順利融入鄉土的澤，由於男性知識分子的性別優越位置而被接納，透過婚姻、以及對於近代知識掌握的能力展現（²⁴⁶）而確立自己的位置，相形之下，作者在再現（represent）淑這位中等女學校畢業生的時候，卻無意描寫相應的知識形象，而僅以父系中心的家族倫理加以打量，將之形塑為必須被「反近代」的鄉土倫理否定的「他者」。劉紀蕙（2011）在反省東亞知識分子的倫理論述建構時指出，「從他者視點切入，並不是破壞整體，而是不斷以動態的方式重組，改變現有狀態。透過這個被排除的「他者視角」，我們才能夠看到共同體內部的壓迫性以及不可見之處。」²⁴⁷若從淑這位近代女性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見張文環的「地方倫理」話語的一個盲點：亦即雖然塑造了不顧人情義理的近代女性作為批判近代的象徵，無形中卻合理化了同樣接受近代教育洗禮的男性知識份子自身在鄉土的位置。與其說張文環客觀

²⁴³ 此故事梗概為唐代吏部尚書陳日升之女陳杏元遭到奸臣盧杞陷害，被迫出嫁至北國和番，而與丈夫梅良玉分離，決心一死，在九泉下報復仇人。此故事在日治時期的歌仔冊中有所記載，參見《新刊雪梅新重臺別合歌》、《盡忠愛國新歌》等冊，搜尋自「國立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

²⁴⁴ 李永熾，〈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形塑〉，《思與言》15卷6期（臺北，1978），頁37-58、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臺北：稻鄉，1996）。

²⁴⁵ 楊雅慧，〈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85-91。

²⁴⁶ 例如澤與表弟阿海的對話，從近代東洋學的角度給予正在學習《論語》的阿海建議。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頁22。

²⁴⁷ 劉紀蕙，《心之拓樸》，頁54。

地描寫男女兩種接受新式教育的類型重新進入鄉土時展現的樣態，不如說藉由讓澤這名男性知識分子對身為現代女性的淑加以譴責，才更加穩固了他回歸鄉土的形象。



故事末尾，淑心中的顧慮被挑明，遭到兄長與澤的譴責甚至肢體衝突，當她離去之後，澤的感想是「如果，這就是現代的道德，那麼接著下來的社會道德會是怎樣的？澤似乎想像的到。」他望向田園自然的景象，突然領悟「自然的法則如此養成植物，在這另一面，天倫在運轉人的社會。」²⁴⁸因而慰勸淑的兄長每個人有自己的心情，難以左右。這樣的結局，其實也暗示著同為文化、知識分子的張文環，在地方文化論述中標舉的理想，具有找回臺灣社會道德之任務。衝突看似得到暫時的平息，其實這樣的倫理秩序建構在男性知識分子與鄉土家父長的合作下，仍潛藏著許多未解的矛盾。

臺灣在戰爭期盛行的「地方文化」論述，與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爭行動，及其隨之而來的人力物力動員緊密相關。這種關聯一方面是政治意識型態的操作，卻也延續了臺灣的新知識分子對於殖民地臺灣的文化得以擺脫封建愚昧的現代性展望。懷抱著這種意識的文學書寫，一方面得以著墨於鄉土民俗人情的細緻書寫，一方面也必然滲入了從現代性視角出發的特殊評價。如上所述，張文環對於地方文化的再現，對鄉土倫理的題材做了特殊的處理，既賦予它抵拒近代物質文明的理想性格，也批判了其澆薄失能的可能性。這反映了張文環在政治論述中建構的地方倫理論述，本身即使以傳統鄉土為理念，基礎仍建構在殖民現代性上的事實。張文環在強烈意識到自己知識份子的身份之情形下，希望同時透過理論與實踐，一方面形塑具有現代化意味的東洋道德、傳統倫理、一方面則參與國家動員，期待鄉土的新生。

²⁴⁸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頁41。





第三節 國家倫理暴力與志願兵論述

上一節談到張文環關於女性的倫理論述，其實有與國家權力合作的一面。不管是對於都市中性產業的掃蕩純化，或是型塑古典、反近代的女性形象，都顯示了張文環鼓吹的倫理論述與戰爭中厲行的道德主義相貼合，而這樣的貼近並非只是策略性的運用，知識份子對於女性一廂情願的規制，其實正是自身焦慮的投射。當日本帝國為了戰爭的順遂，進行意識形態的動員，其邏輯也是性別的：保家衛國、為帝國拓展生命線的男性兵士們，以及在後方進行支援與慰安的女性與孩童。殖民地台灣從 1937 年左右開始被編入「準戰」體制，前行研究多強調伴隨而來的皇民化運動在民族主義上的動員，卻鮮少看見從性別角度的探討。然而從張文環的例子來看，面對這場帝國戰爭的動員，身為被殖民者的焦慮感往往以「性別」的角度形象化地呈顯，這不僅是身為文學家的感性，而更關係到戰爭體制本身對於台灣漢族父系社會的動員策略，以及其回應。²⁴⁹

作為日本帝國戰爭動員意識形態的「國家倫理」之所以得以運作，正是在規範日本國民對國家的權利義務之（不）平等的同時，賦予未能納入平等地位的殖民地人民羞恥感，將政治經濟地位的結構性不平等，轉化到個人主體的效忠問題。始終未能跨越此一障礙的殖民地男性，便只有藉由繳納戰爭的「血稅」以擺脫「去勢」的陰影，重振男性的雄風。²⁵⁰ 死亡的風險，在帝國的戰爭動員下被包裝為「死亡的美學」，與男性氣概的形象緊密結合。周婉窈曾分析戰爭時期的宣傳語言使用，整理出如「荒鷺」、「櫻花」等意象的使用，搭配對於女性動員從事看護慰安工作的「大和撫子」等語言，「死亡美學」背後的性別操作策略呼之欲出。²⁵¹ 這當中當然會面臨民族意識的對壘，但是這樣的張力在殖民現代性的中介下，往往被

²⁴⁹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2009），頁 274~283。

²⁵⁰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

²⁵¹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185~213。



轉化成傳統家族內的世代鬥爭：新世代的知識分子對殖民現代性的認同，也使得他們願意透過戰爭博取晉升正常國民的機會，而年老世代往往被描繪為守舊、不知變通。²⁵²這樣的對立雖然暗藏了大和民族與漢民族的意識鬥爭，但並非決定性的因素，反而更多體現了父系中心的家族體制面對國家權力動員時，對於家族權力交接的敏感與不安。以下將會介紹到，張文環許多與戰爭有關的社論雜文，正是用這樣邏輯描繪了國家倫理試圖吸納了鄉土倫理——亦即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漢人家族，所賴以維繫的集體性價值體系——之過程。這樣的意識形態描寫並非只有張文環，而是存在於當時台灣文壇普遍的現象。

1941年4月，皇民奉公會為了因應大政翼贊運動下戰爭動員的需求而成立，此時以林獻堂為首的民族運動人士已經在總督府與台灣軍的懷柔與威逼下公開放棄不合作的立場，發表聲明支持志願兵制度，並集體參與皇民奉公會的成立。²⁵³與羅萬俤等《民報》人士關係密切的張文環，也於6月擔任台北州支部參與，正式被整合進戰爭動員組織的體系。在此之後，伴隨著總督府情報部的運作，他開始以文化界代表的身份接受訪問、參加座談、發表社論等，進入「被動員去動員」的角色。柳書琴從張文環在文壇的活躍、以及與台灣人文化運動的密切關係，指出總督府看見了張文環作為被動員者的價值，²⁵⁴但另一方面，張文環在返台初期即積極運用皇民化運動的國策言說以取得發聲權，也可以看出他在動員體制中的積極性格。張文環呼應戰爭動員的言論是前行研究中常被爭論的焦點，爭執重點被放在張文環是否只是在國策下虛應故事，或是心甘情願地服從集體主義的召喚²⁵⁵。然而，如果說倫理論述本身即是行動者在結構的限制之下以主動的姿態生產出來的產品，那麼當國家倫理的動員以接管整體社會的話語權之姿態出現，應該被問的問題就會是：作為一個積極活動於台灣文化界的知識份子，張文環選擇了

²⁵² 例如王昶雄〈奔流〉、呂赫若〈清秋〉、周金波〈志願兵〉都是很好的例子。

²⁵³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頁366~369。

²⁵⁴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393。

²⁵⁵ 前者：柳書琴，後者：劉紀蕙，野間信幸則是採取較為折衷的見解。




哪些資源以詮釋國家的倫理論述？他的活動與言說，不應該被視為基於固定認同的直線性發展，而應該看見不同脈絡的社會位置，如何影響著張文環，以及其他同代的知識份子，他們又在詮釋的過程中採取了怎樣的主動性；這些行動可能並不是基於固定的認同，而是個人不無斷裂的一次次選擇，這樣的詮釋對於我們理解台灣社會在戰爭時期的文化現象有莫大的幫助，也更能理解作家在那些艱難的時刻如何回應著時代與自身。

張文環在皇民奉公會成立以後發表呼應戰爭動員的言論，除了散見於台灣時報、新建設、台灣新報等官方色彩濃厚的刊物，也見於朝日新聞台灣版、台灣公論等民間的日報或政論性刊物，但大體上來說，的確時常可以看到背後來自當局的動員脈絡。柳書琴分析張文環的奉派報導活動，認為在無法違抗殖民政府動員的情形下，他採取了游移曖昧的「雙聲」策略，隱微的傳達了反抗的意志，看似符應國策的言論，最後都被作者不安的態度所打消。²⁵⁶柳書琴的分析固然是有趣的嘗試，然而正如在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所述，連綴瑣碎事物，曖昧游移的敘述方式，正是張文環自〈父親的要求〉以來重要的文體風格，固然張文環在〈宿營印象記〉等文章中展現了曖昧的敘述方式，但在〈一群鴿子〉等文章中主張的態度與敘述的語言卻是明確的。張文環類似的「饒舌」語言與其說傳達了反抗的意念，不如說表現了他面對龐大敘事（可能是左翼革命理想，也可能是戰爭的國家動員）時自期為「鄉下小人物」的處世之道。

例如〈宿營印象記〉這篇文章，是因應 1941 年 11 月 14-16 日，台灣軍第三部隊在蘭陽平原進行演習，徵求當地居民提供房舍作為舍營，並安排島外媒體大量跟隨採訪，作為皇民奉公會台北支部參與的張文環也因而被動員陪同，寫下所見所聞。這次見聞張文環寫成了兩篇文章，分別發表於《朝日新聞台灣版》及《台灣時報》，題目皆為〈舍營印象記〉，後者的篇幅較短，顯然為前者的節選之作。

²⁵⁶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 393。



柳書琴所指的「雙聲」策略，則是對於前者的分析，作者從搭上前往宜蘭的二等列車，因不習慣較高級車廂的尷尬開始，也寫到作者初到宜蘭便隻身隨意採訪缺乏教室而在孔廟上課的幼童，被地方的教師冷淡以對的場景，其他也有在採訪初代志願兵時老人吐出「吸完鴉片就去參觀演習」、阿兵哥住的地方過於豪華等描述，柳書琴認為這些敘述都是張文環掙脫了奉派報導的角色，而以小說家之筆如實寫出台灣人的辛苦落魄，與官方意圖呈現軍隊的光鮮亮麗產生對比。²⁵⁷這些都是敏銳的分析，但若要將其擴大解釋為，作家本於民族意識而進行的抵抗策略，則解釋能力似尚有不足。更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張文環在類似的動員歷程中，對於集體行動的經驗的曖昧態度。因戰爭動員，原本就是強制地要求國民以集體的方式接受國家的指揮，個人的需求往往被泯除，或者轉化成為了集體服務。張文環在想像都市居民、鄉村父系家族的共同體時，則是往往透過對於精神、道德的論述與提醒，要求在其中的邊緣者屏棄私慾。問題是當知識份子自己成為被動員者時，他的態度又是如何？在〈舍營印象記〉這篇文章中，張文環同時是作家本人也是敘事者，向讀者傳達他採訪軍隊生活的體驗，與其說是報導更類似遊記；但這並非文學家的個人感懷，而是在動員體制下以知識份子作為政策代言人的形式。參與奉派報導的集體經驗顯然帶給張文環許多的緊張與不安，但當他想要擺脫集體的束縛獨身進行採訪時，卻面臨到採訪對象間的不理解，沒有察覺到自己作為官派人員身份的尷尬，而只能黯然回到旅館，從此之後的採訪便只能讓自己鑲嵌在集體的行程中。柳書琴的解讀方法提示了我們，將文章中敘事者和作家的意志分離開來是可能的，亦即張文環透過小說筆法，特意安排敘事者遭到受訪者拒絕的情節，呈現了無法脫離被安排的採訪以獲得民眾真正心聲之苦悶感受。但即使如此，綜觀張文環在日治時期的言論，都無法一貫地提出有別於國家集體倫理的社會實踐想像，這一點與楊逵對於報導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正好成為對比，未能擺脫「風俗作家」魔咒的張文環，在努力表達對於國家集體生活之質疑時，其

²⁵⁷ 同上註。



聲音也是破碎、缺乏自信的，無法形成有別於國家的倫理主體，這才是真正值得注意之處。劉紀蕙認為，在殖民地的差異政治結構下，張文環等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往往內化了「殘缺」的自我評價，對於戰爭的集體式召喚充滿嚮往，形塑出甘願被帝國吸納的主體構造。²⁵⁸然而正如前述，張文環對於國家的集體生活毋寧說是消極的，在實際體驗之下，他往往無法不感受到其中的矛盾，而使得呼應戰爭的言論往往成為一種理念的姿態。

在〈宿營印象記〉中，張文環試圖獨自接觸民眾的過程，呈現了文學家的浪漫而非記者或社會運動者的敏銳，正是在類似這樣的裂隙中，作家發現自身對現實的無力，於是發展出各種應對的策略；其中一種，便是以另一種自己熟悉的集體想像，來替代過於龐大的國家集體想像，對張文環來說，即是對於傳統漢人家族的認同建構。²⁵⁹

在所謂開啟新的歷史階段的大東亞戰爭敘事中，許多臺人作家感受到殖民地台灣在日本帝國圈的重要性即將提昇，而表現出了雀躍之情。²⁶⁰以張文環脫離西川滿旗下而創辦的《台灣文學》雜誌為據點，黃得時打出「建設台灣文壇」的旗號，呂赫若則創作出許多以台灣傳統家族為對象的小說，可以視作在此背景下臺人作家感受到機會來臨而採取的實際行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張文環在〈一群鴿子〉、〈小老爺〉等雜文中描述了從軍青年與父祖輩的代間矛盾，其他台人作家的的小說創作，包括呂赫若的〈清秋〉、王昶雄的〈奔流〉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構圖；顯示了這群在戰爭動員體制下積極活動的台灣人作家，在民族意識與國家倫理的要求激烈對壘的夾縫中如何定位自身的實踐位置。

張文環〈一群鴿子〉這篇雜文發表於《台灣時報》，發表時間在志願兵制度實

²⁵⁸ 劉紀蕙認為張文環的確就是嚮往著戰爭的集體生活。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臺灣文學學報》第5期（2004b）

²⁵⁹ 其他類似的例子：呂赫若

²⁶⁰ 參見龍瑛宗〈台灣文學的展望〉（1941.2.2）（2006，頁79）、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自我批判〉（1941.8）（2002，頁68）。



施後第二年，因應「志願兵徵募要綱」的發表而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個月，這正是志願兵應徵人數大幅暴增的時期。日本主動發起珍珠港事變，此時的媒體宣傳一片熱烈，一掃對華戰爭長期化的陰霾，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正當性彷彿在東方對抗西方的戰事中被確認，而為了南洋攻略需求的技術與軍事人力亦大增，或許是申請人數大量增加的背景。近藤正己指出此時期大量志願熱的釀成，正是與學校、保甲、青年團、各政府機關的對地方社會的集體動員策略密切相關²⁶¹。張文環的這篇文章，被置於《台灣時報》該期「我們正是志願兵」的專題之中，正是總督府進行動員的策略一環。在這篇幅不長的文字之中，張文環一改平日瑣碎的雜談風格，昂揚地鼓動讀者（預設為有一定知識水準的台灣年輕人）：

我想經由當兵，才能使一個男人在進入社會之前，將理論與實踐一起鍛鍊，加強國家意識，培養出正確觀察社會的眼光。既然生為男人，與其死於神經衰弱或患病死在床上，不如扛著槍去戰場殉職，那是多麼雄壯有生存價值阿！

充滿雄性意涵的呼喊，並不是這位知識份子過往的風格，但正是這種對於知識份子「神經衰弱」的不滿，連接到張文環在具自述性質的《山茶花》中從小對於文弱書生習氣的自卑與敏感，²⁶²這樣的呼求可以說反應了張文環對於實踐的焦慮。這裡的實踐，在殖民地台灣社會的語境，則是指向了對於傳統社會的近代化渴望，以及彌合民族歧視的政治力量。藉由參加志願兵的行列，證明台灣人並非次等國民，成為「實踐」的必然面貌。張文環劈頭便訴諸的共同體對象，正是接受了一定新式教育，意圖改革殖民政治的不平等的男性青年，然而文脈接續，他便不得不批評傳統漢人家族（鄉土倫理的共同體）對於男性青年的限制妨礙：

為了改建才要破壞的話，雖然必需聽到轟然倒下去的悲鳴，但是這原則還

²⁶¹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

²⁶²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4。

是快樂的。男人是不能因此而怯懦。要建設新的家庭，就要把舊家庭的污濁一掃而去。東洋的道德是忠孝一條路。可是以往的台灣無法裝飾忠孝兩全的美，就像台灣到現在還不能產生偉大的文化一樣。這是因為台灣家庭上的缺陷，和身為男人不完全的生活使然吧。²⁶³



似乎因為是宣傳動員的呼告，張文環在這裡的言談未免輕率，然而卻可以看出他激動的情緒。台灣的傳統民間社會約在 1937~1941 年間經歷各地方在台日人發起的激烈「皇民化」運動，民怨四起，如今的全面性戰爭動員卻是在形式上取得台灣人意見領袖如林獻堂同意而進行的。張文環對於舊式家族的批評可能性除了民族意識，則最可能是對於獨善其身的自利性的批評，這同樣也可見於王昶雄、呂赫若等《台灣文學》同人的創作之中，相較之下，張文環則有將改革的方案指向烏托邦式的傳統倫理社會此一傾向。因此，「忠孝一條路」的價值宣稱與其單純說是對於日本道德意識的認同標舉，不如說是在帝國提供的價值框架之中，張文環安放了具有地方性的共同體倫理論述吧。這樣的倫理論述不是對於傳統漢人家族的肯定，而是必須透過男性青年基於立身出世需求的批判，而得以媒介完成，因而既不是革命地否定家父長的權力，也未曾否定國家的威權力量，而是透過對於家父長制代間的權力移轉，宣告了新一代青年擁抱殖民現代性／國民國家理想的願景。

在〈一群鴿子〉刊出之後，張文環隨即創作了小說〈頓悟〉，並刊載於三月的《台灣文學》，它的特殊性在於，戰爭期的張文環鮮少直接於小說中描寫從軍的情節，〈頓悟〉是他少數直面志願兵制度的作品。近藤正己指出，當時台灣的志願兵申請數量遠高於同為殖民地的朝鮮，²⁶⁴這樣的志願兵熱可能存在著殖民地接受戰爭意識形態教化的差異，以及地方社會動員機制的深入之別。「志願兵」可以說正是殖民地台灣面對日本帝國的戰爭動員最重要的象徵性事件，也在戰後的台灣社

²⁶³ 卷 6，頁 104

²⁶⁴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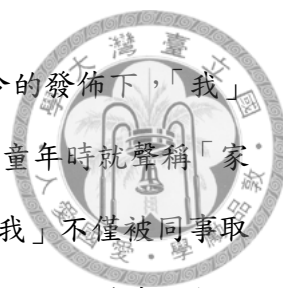


會持續引發爭議。但有別於日本本土對於戰爭現場描寫的熱衷，台灣文壇卻積極於描寫在「銃後」生活的人們，顯見殖民地社會的異民族性格在戰爭動員中的重要性，引發在意識形態上的反覆自我質問與掙扎。張文環於寫作〈頓悟〉期間致信呂赫若，表示「歸根究底，描寫生活，朝著國策的方向去闡釋它，乃是我們這些沒有參與戰鬥者的文學方向吧」²⁶⁵可見其面對戰爭動員中國家倫理的姿態，既是焦慮的，也是配合的，積極欲建構一條文學實踐的道路。

〈頓悟〉這篇小說場景發生在都市空間，明顯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的滲透為核心，戰爭動員的國家強制力則隱身於幕後。年輕的敘事者「我」來自鄉下，曾經在大稻埕度過童年，因父親友人介紹來到台北擔任記帳員，然而大稻埕的變遷之迅速使得故鄉已經難以辨認，只能將兒時的記憶比附鄉下的淳厚人情，創造出揉合「童年／鄉下」的記憶鄉土，藉以安慰自己身處大稻埕此一浸透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商業空間時興起的無措之感。「我」的名字是「為德」，正如其名，是謹守舊式倫理的一名人物。為德雖然遵守父母的教誨，對身兼公職的店主人必恭必敬，卻無法輕易同意其「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資本主義言說，心態徘徊於服從與抗拒之間，與其他服從金錢邏輯的同事間也產生了隔閡感。此時，與青梅竹馬阿蘭的重逢將為德拉進了都市浪漫愛情的佈景之中，雖然被強烈的暗戀感情所困擾，「我」卻在強烈的倫理自覺中採取了諸多可說是「反羅曼史」的行動，諸如相認、攀談等行動都必須在「與伯母打招呼」的家長秩序之名義下進行，阿蘭因傘被弄壞而傷心哭泣，「我」不以安慰同情為要務，反而進行「精神價值」為名的道德訓話，突顯了綽號為「老頭」的為德的確有古板保守之處，以及其作為抵抗城市摩登文明的鄉下小人物之象徵意義。

而當為德陷入單相思的困擾，以致於無法專心工作的同時，時局的壓力也緊迫而來，戰爭的動員宣傳，讓商店的基層店員也陷入了躁動之中，「我」更益加感

²⁶⁵ 1942年1月16日呂赫若日記。



受到自身在商業資本主義中的無能與困頓。本島人志願兵實施令的發佈下，「我」
「像被打了肩膀似的，開始思考做一個男人應有的作為」相較於童年時就聲稱「家
裡的財產工具都屬於自己所有，決不嫁去別人家」²⁶⁶的阿蘭，「我」不僅被同事取
笑為「老頭」，最念念不忘的童年初戀記憶竟是被阿蘭朝臉上吐了一口唾沫的往
事，與阿蘭的相處也畏畏縮縮，顯得弱勢而毫無氣概，這種情況卻在為德決定從
軍後產生了變化。當「我」向阿蘭道別之時，她第一次展現了軟弱的一面，為了
被店主無心弄壞的傘難過不已，主角除了表現出同理心，卻一邊理性地分析著「或
許有錢人會察覺女店員的心情，但為了抽一隻香煙，就要付十二、十三元賠償女
店員，確實不合算」而如此勉勵阿蘭：

「阿蘭小姐，不要為傘的事那麼難過，一把傘不能證明你的精神價值。我
來到台北，看到打扮得漂亮的人都不欣賞，還是樸素的人使我尊敬。沒有
個性的人才模仿人家。」²⁶⁷

對物質的失去感到認份認命，覺得樸素才值得尊敬，或許符合為德的鄉村倫
理認知，然而話中訴求的「精神價值」，卻明顯疊合了張文環的戰爭動員論述，強
調「精神力量」、「男子氣概」等從軍的價值，²⁶⁸如同劉紀蕙的分析，是在強烈意
識本島人不平等的情況下意圖透過「精神提昇」而超越此一困境的邏輯。²⁶⁹當此
種「恢復雄性氣概」的戰爭論述侵入戀愛敘事之中，便產生了結尾處「我」與阿
蘭的氣勢逆反的奇妙現象，甚至以精神價值貶低少女的物質欲望。為德的從軍不
僅是為了克服自身對都市資本主義的不適應，更是面對心儀的女性，企圖克服自
身的陰性化，穩固身為男性的優越自尊之道路。

²⁶⁶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頁132~133。

²⁶⁷ 同上註，頁140。

²⁶⁸ 張文環在戰爭動員期擔任皇民奉公會的支部參與，是當時文學家僅見，扮演了相當的社會教化的角色，不僅發表多篇鼓吹志願兵的文章，也參與相關的座談會，進行政策宣導的工作。參見鄭麗玲（1994，頁66~72）劉紀蕙則從「皇民主體塑造」的角度分析，認為張文環此時的公共言論表現出浪漫的戰爭美學，強調男性陽剛、精神勝於肉體的價值，並且有崇尚戰爭集體生活的傾向。

²⁶⁹ 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



〈頓悟〉雖然對於大稻埕空間的資本主義有所抨擊，卻隱然已經將砲火集中於商人、女性等「他者」展現的人性貪慾，不僅殖民者默默隱身，連身為資產階級的商店主也在主角「為了抽一隻香煙，就要付十二、十三元賠償女店員，確實不合算」的同理思考中失去了作為壓迫階級被批判的可能。從鄉村遷徙至城市的「我」，面對時間快速流動、商業資本主義無所不在的都市空間，一開始以掌握傳統文化的漢文，而能與父親保持聯繫聊以安慰，最後則以志願從軍證明自己追求立身出世的意志，告訴阿蘭「在（等待志願當兵）這期間，我打算回鄉下去鍛鍊身體，住在台北會弄壞身體的」²⁷⁰可以說是對鄉土倫理之懷念與參與大東亞戰爭的論理之融合。張文環的筆下時常出現宛若被「去勢」的男性角色²⁷¹，此處的鄉土價值卻如同戰爭一般，賦予了殖民地男性在不平等現實下重振雄風的陽剛活力。

相較於日本作家同時期書寫著擁戴皇國精神、發揚東亞榮光等殖民者的戰爭敘事，張文環在戰爭中卻看到個人的出身立世如何安置的問題。例如張文環的〈頓悟〉講述一名無法在城市出人頭地、也無法鼓起勇氣面對心上人的青年為德，在志願兵公告實施後下定決心從軍，追隨歷史的浪潮，因而找回了男性的尊嚴感。呂赫若的〈清秋〉、〈山川草木〉也分別以男性、女性知識份子為主角，描述他們在時局的浪潮下回到家鄉，重新發現人生意義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說都涉及了城鄉關係的描寫，而且主角多在故事結尾選擇回到家鄉，或是準備投入戰爭或是扮演統後協力的角色，城市被突顯為無法自我實現的場所，鄉村則伴隨家族倫理而成為優位的欲望對象。雖然鄉土書寫在日治時期的新文學中本來甚為普遍，但此處的城鄉情結與戰爭的背景交織，突顯在戰爭動員的壓力下，鄉土意象可能扮演的特殊角色，其實正與國家倫理的召喚相互交織。

張文環對於國家的戰爭動員回應，除了附和國策語言，也強調參與戰爭與男

²⁷⁰ 卷2，頁141

²⁷¹ 如〈辣蕪罈子〉（1940）中被老婆婆瞧不起的中年男子阿九，〈閩雞〉（1942）中性格軟弱而因不明原因殘廢的青年阿勇。這種意象或許反映了殖民地男性的「去勢」感受。

性氣概的關連性。在小說〈頓悟〉與其他社會議論的文字中，志願兵制度被作為確立台灣人地位的重要象徵，本節希望延續上述對於國家倫理的討論，指出張文環對於它的轉換借用，與性別想像密不可分，同時也延伸到他對於鄉土倫理存在著謳歌、卻又期待改造的矛盾立場。這是張文環對於戰爭時期國家倫理的回應，顯然在於建設台灣文化的期待之下，他採取配合動員的態度，但是真正進入集體動員的實踐，又難以忽視其中未解的社會矛盾；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之中，他選擇建構對於鄉土的共同體想像，這樣的倫理論述也是性別的，形成了國家父權與家庭父權的共謀關係，國家倫理在戰爭中的暴力性質並未被釐清批判，反而呈現了殖民地男性知識分子在差異政治的結構之下進行社會實踐的困局。





第四章 轉向/轉進的動員倫理可能：楊逵

第一節 往鄉土倫理的迫近：首陽農園的空間意義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約在 1937 年底，楊逵發表了〈首陽園雜記〉，正式掛出「首陽園」的招牌，²⁷²他引用東方朔〈嗟伯夷〉的詩句：「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如從孤竹於首陽」，表達對於時局之不滿。²⁷³之後就在文壇上幾乎銷聲匿跡，然而在 1942 年左右，又開始了文學評論、創作活動，也積極發表社會議論，至 1944 年 6 月則發表了〈解除「首陽」記〉，宣布捐棄個人的感傷，勇於自新，投入全民崛起的戰爭動員。²⁷⁴這樣的轉變不能不讓人訝異。「首陽園」的象徵意義在戰後被視為楊逵堅持中國民族精神的明證，本人也傾向於作此解釋，然而近來陳淑容等人的研究指出了「首陽園」之所以能夠建立，與入田春彥、田中保男等在台日本知識份子的協助有莫大的關係。如果由此角度出發，〈解除「首陽」記〉的存在就不應被僅僅視為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爭辯，而應與彼時楊逵與在台日人的交流，以及由此串連起來的戰爭期的文學與社會活動網絡有密切關係。

為什麼楊逵會闢建首陽園？第一可以說是為了生活。〈首陽園雜記〉描述到楊逵為了辦雜誌、參與文學運動弄得貧病交加的生活狀況，而日人警察入田春彥的資助毋寧是一劑強心針，不僅解除了負債的窘境，還獲得了拓展新事業的可能性。而〈首陽園雜記〉的末尾提到「連維也納飄揚著納粹著旗幟」，由此可見無法再進行文學運動的楊逵，的確有以僻居「首陽園」對彼時已經為法西斯主義掌握的台灣社會境況表達無言抗議的意圖。楊逵自小並無受漢學素養，〈嗟伯夷〉一詩據稱

²⁷² 參見黃惠禎的考證。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零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b）。

²⁷³ 楊逵，《楊逵全集》，卷 9，頁 486。

²⁷⁴ 同上註，卷 10，頁 150。



為林幼春所教導，²⁷⁵楊逵在以往的文學活動中力倡打倒封建化，然「伯夷叔齊」如此在五四以降的新文化運動中被批判為「愚忠」的典故，²⁷⁶竟在此時成為楊逵自我定位的符碼，可說是歷史的弔詭。然而與其說這代表了當時「皇民化運動」下引發的漢文化危機意識，不如說楊逵在此台灣文化運動陷入低潮的處境下，表達了對於賴和、林幼春等中部漢文人的連結與認同。

當然，與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相反，楊逵開闢「首陽園」有強烈的求生意志，是在社會實踐與經濟生活皆面臨貧困之際的養精蓄銳。從「首陽園」的地理位置來看，起初位於台中市郊的火葬場旁（梅枝町99番，今東興市場），而後資金充足，便移到更接近市街中心的梅枝町19番地（現篤行路與福龍街口），與彼時台中市街文化中心的寶町（中央書局）等位置皆在徒步可達的距離²⁷⁷。位在台中市郊的數百坪土地，種植花卉松樹等附加價值高的作物，「首陽園」儼然是楊逵建立起來的個人城堡，得以維持傳統知識份子理想的躬耕生活，又能夠不遠離都市的文化活動，保持對於台灣文化界的敏銳知覺。

固守於首陽園的楊逵約於1942年起又展開了積極的文學活動，但早在1941年10月，他便針對「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改組，對該會會報的積極功能提出建言。事實上「台灣文藝家協會」此次改組，正是為了因應「皇民奉公會」的組成，由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擔任會長，警務局與情報部官員擔任顧問，具辦官方色彩，並積極網羅當時台灣各方作家參與。此時的台灣文壇，正因為大政翼贊運動帶來的文化景氣，以及台日作家的積極較勁而呈現不同於戰爭前期的復興景象。也許楊逵正是感受到了這樣的氣象，因而不甘寂寞地從首陽園探出頭來吧。在1942年間，他發表了直至戰後往往被視為代表作的〈泥人形〉、〈鷺鳥の嫁入〉等作品，

²⁷⁵ 黃惠禎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

²⁷⁶ 魯迅晚年曾作〈採薇〉諷刺伯夷叔齊自絕於外界社會的滑稽樣貌。黃惠禎曾考證入田春彥自殺後留下《魯迅全集》給楊逵，對他產生莫大影響，但如〈採薇〉中伯夷叔齊的形象並未呈現於〈首陽園雜記〉中，可見此時楊逵或許還未對魯迅有深入的接觸或閱讀。

²⁷⁷ 依莊垂勝之子林莊生的回憶，首陽農園就在他家鄰近，兩家因而時常戶串門子，由此可窺見首陽園在台中文人網絡的空間意義。林莊生《懷樹又懷人》。

皆刊載於總督府情報部發行的《台灣時報》。為什麼素以對抗日本官憲為傲的楊逵會選擇在官方刊物發表作品呢？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當時在《台灣時報》有少數有良心的日本人編輯如植田富士太郎、淺田實男、池田²⁷⁸等人，願意透過他具有諷刺時局意味的小說來影響政府錯誤的決策。不僅如此，他也舉出金關丈夫、中村哲等台北帝大教授，說明他們都曾至首陽農園向他訪問邀稿²⁷⁹，而在吳新榮1942~1943年的日記中，也可看見數則他主動前往首陽園拜訪楊逵，甚至楊逵帶他到台中市的後街閒逛等記載，²⁸⁰諸如此不僅說明了楊逵在戰爭後期與台日文化界人士的活躍交遊，也顯示了首陽農園作為楊逵積極介入台灣文壇的重要空間意義。

第二章曾提到楊逵在30年代藉由將自己描述為勞動者，藉以迫近工農大眾的書寫策略，而在戰爭期，在首陽農園躬耕的經驗，更使楊逵轉而以「農人」的身份自居，並在戰後多次以「園丁」的身份自喻，「晴耕雨讀，靈感來時寫寫文章」²⁸¹，影響了日後自我敘說的主體認同，並且在戰爭期的書寫意識上，楊逵也期許自己以農人的角度，更貼近一般農村農民的苦惱與需求。他不僅在〈萌芽〉、〈鷺鳥の嫁入〉等作品中寫出實際農耕的心得經驗，也撰寫社論雜文討論農民對於「正條密植」等戰時政策的不滿，甚至在戰爭意識型態動員愈加激烈1943年以後，也發展出將「泥土」、「糞便」等農村的重要元素隱喻底層民眾辛勞的論述策略，藉以抨擊在戰爭中那些高高在上，卻不願意正視民眾生活基礎的指導者們。「糞寫實主義論爭」中楊逵「擁護糞寫實主義」的主張，可謂這種策略的明確實踐。²⁸²他在〈擁護糞寫實主義〉一文中舉出島木健作的小說《生活的探求》，說明農作與糞便的密切關係，而這正是講述左翼轉向青年回到故鄉，在跟隨父親耕作中重新找回人生意義的「轉向文學」。論者一般以為島木健作在戰爭期的思想是以農本主義為掩護，實際上卻是將「生活」取代了「思想」，以至於對法西斯主義缺乏批判力。

²⁷⁸ 疑為池田敏雄（曾任台灣總督府情報部囑託）

²⁷⁹ 楊逵，《楊逵全集》，卷14，頁24。

²⁸⁰ 1942.7.18、1943.8.3日記

²⁸¹ 楊逵，《楊逵全集》，卷14，頁163

²⁸² 楊逵，《楊逵全集》，卷10，頁119。



²⁸³楊逵在此並舉了廣受好評的戰爭文學作家火野葦平《糞尿譚》和島木健作這位轉向作家的作品，是否有為了掩飾自身對戰爭敵對立場的策略意圖呢？雖然無法確知，但由此可以看見楊逵在戰爭期依然延續著對日本文壇的關注，並且懂得加以援引以證成己說。

只要我們不將「首陽園」的空間意義放在單純的民族主義問題，就可以看見這一符碼同時也連接了楊逵對於「鄉土」接近的嘗試。鄉土民俗符碼的運用，在戰爭期的台灣文壇的確有了大量增加的現象，可以從皇民化運動下的意識自覺、戰爭動員下「南方」民俗學的備受重視、台北帝大為主的學術界對文壇的介入等等角度加以詮釋。在中日戰前，楊逵對於鄉土元素的運用是強調封建與階級性的，但進入40年代文化場域的轉變，他與池田敏雄、金關丈夫、中村哲等《台灣民俗》雜誌核心人物的來往，標示了重新思索鄉土可能性的知識路徑，相較於對漢族文化的自覺，更有可能是從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意識之下，跨越台日民族邊界的合作嘗試。同樣在〈擁護糞便寫實主義〉一文中，他極力稱許立石鐵臣對於台灣的庶民生活充滿同情而謙卑的態度，正是這樣態度下的展現。²⁸⁴

這種意識在對於農民生活的認識上尤為明顯。隨著楊逵身體力行農耕生活，他不僅慣於在小說創作中以農場作為場景設定，也多所撰述表達對於農民的民俗生活之關切。在《民俗台灣》中他曾發表〈民眾的娛樂〉、〈土地公〉、〈離婚者手記〉等文章，雖然發表的不多，但從文章內容來看，對於傳統農村民俗的不熟悉，應是楊逵較少投稿的原因。在〈土地公〉中，他自承：

我從小就離開村子，四處為家，和父母及其他老人在一起悠閒過日子的期間很短暫。因此，對於台灣鄉村的習慣、各種故事和傳說，都是十歲以前的見聞。如今殘留在腦海中的印象，實在少之又少，可以說幾乎沒什麼事

²⁸³ 《共同研究 轉向》中卷

²⁸⁴ 楊逵，《楊逵全集》，卷10，頁124。

能說給人家聽。²⁸⁵



楊逵對於鄉土生活的隔膜，可以說是接受現代殖民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或多或少

或少的寫照吧。²⁸⁶連勳斗雲都不知道是什麼的他，甚至要由孩子來教他包粽子、搓湯圓等民俗，以及牛郎織女的傳說故事，但藉由工作上與農夫接觸的機會，他也開始關心土地公等民俗信仰對於農人生活的重要意義。〈民眾的娛樂〉中楊逵則是強調國家在進行奉公運動的同時，也必須要瞭解民眾對於民俗娛樂的需求，並稱許黃得時與《民俗台灣》同仁的努力。楊逵此時期對於民俗的關心與其說是自發性的鄉土回歸，不如說是在保護民俗運動的氛圍下，將其作為論述「大眾」的工具來使用吧。在〈常會團樂論〉這篇文章中，楊逵提到了暫時自己鮮被注意到的身份：「奉公班」的班長。在皇民奉公會中，「奉公班」是最基層的組織，領導為班長，負責傳達各式戰爭動員的資訊，並且每個月定期召開常會。²⁸⁷在社會與文學運動中有豐富經驗的楊逵雖然並未如張文環一樣整合進奉公會的上層組織，仍舊在基層的動員組織中扮演指導的角色。他在文章中描述了民眾常在工作餘暇時聚會於雜貨店或理髮廳的慣習，並且認為這才是理想的常會應有的樣態。²⁸⁸楊逵在此並未對戰爭動員體制提出批判，而是於奉公會的機關報中認真地建議如何藉由民俗而能夠「改進」動員的方式。在此可以看見楊逵身為知識份子的自覺，甚至超越了對於戰爭的批判；當戰爭動員體系正是仰賴著一個又一個「指導者」而得以運行時，楊逵也展現了意圖貼近並領導大眾的欲望，然而背後呈現的思想理路，似乎已不如中日戰前那樣清晰。


楊逵在此時期對於民俗的討論，往往放置在「聽見勞苦民眾心聲」的脈絡之下，因而同時也必須在對於戰爭動員的附和與轉化之下進行詮釋（例如〈常會團

²⁸⁵ 楊逵，《楊逵全集》，卷10，頁45。

²⁸⁶ 然而楊逵宣稱對於民俗的接觸僅止至十歲，此時為他進入故鄉的大目降公學校的年紀，應是離鄉土民俗生活不會太遠，何以無法接觸到民俗習慣？著實令人好奇。

²⁸⁷ 中森藤市郎，《台灣に於ける常會の運営》（皇民奉公惠宣傳部，1941）

²⁸⁸ 雖然他似乎並未能做到這點。文中也提到，常會多半是由婦人出席，因為男人認為這件事並不重要而多半缺席。



圓論〉中提到皇民奉公會基層組織必須注意到民俗需求等)，相較於張文環對於鄉土的私密情感，產生了更能為殖民者所用的工具性吊詭。同樣在戰時期以都市作為據點從事文化活動，楊逵並無法如張文環一般回到記憶中的鄉土建立文學的主體性（從而也與戰爭動員保持了距離），而仍是在左翼政治的脈絡之下進行論述，由此可見兩人不同的思考脈絡。

不管楊逵如何意圖接近鄉土／傳統社會而不可得（對於童年民俗記憶的模糊），他對於鄉村農民大眾的討論依然是具有倫理性的，或者說正因為居於鄉土之外，楊逵才必須依靠「首陽園的園丁」這一身份找到自己與鄉土的接點；當他執著地將農民作為政治論述的倫理核心，也同時生產了將農民大眾與自己含括在內的我群邊界論述，用以與政治上占優越地位的殖民者進行對抗或協商。



第二節 支撐首陽園空間的性別倫理秩序

「父親（楊逵）其實是獨裁的，他非常重視東海花園的栽作，全家都必須來幫他的忙，但我當時不想只是待在家裡，就去彰化找了工廠的工作，父親依然要我每天幫助花園的工作，我沒辦法反抗，那陣子兩邊兼顧非常疲累，我必須騎腳踏車到彰化去，有時甚至騎一騎就一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竟也差不多到了目的地。」²⁸⁹

戰爭期的楊逵在小說作品或社會議論中雖未將女性作為重要的主題，但其實仍往往作為重要的文本成立條件。這大致可以從兩個方向去探討，一是將女性作為橫暴資本家或封建文化受害者的描述，一是從家庭的角度去討論女性的意義。前者在楊逵早期的小說中便已頻繁出現，而此時只是以更為通俗的筆法進行寫作。但就後者而言，楊逵對於家庭的思考與描寫已經更加深入，有別於 30 年代時的作品妻兒只是作為證實階級理念的工具。²⁹⁰或許是因為此時的楊逵兒女漸大，也經歷與父母的死別，而首陽農園的成功經營，使得他脫離以往漂泊不定的生活，開始得以經營穩定的家庭生活。家庭本就是性別互動與權力關係最重要的場域，而楊逵對於家庭的看法，也與其性別觀念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在 30 年代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土匪婆」葉陶，此時期的活動竟是十分沈寂，而只能當個「賣花婆」，以輔助家庭事業的角度被社會認識。當然，這也並非是傳統男女分工的體現，例如因為早期楊逵編《台灣新文學》時，楊逵負責寫作和編務，葉陶負責在外聯絡、募款、收稿，「楊貴嫂、葉陶兄」的綽號不脛而走，突破了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想像，此點亦為許多研究者提及。²⁹¹但若從社會參與及形象建構的角度來看，相對於 30 年代，以及戰後的公開活躍活動，葉陶在戰爭期是沉默許多的，缺少為自我述說展露的機會。從這點出發，可以看見楊逵在此時期頻繁出現於作

²⁸⁹ 楊建口述，2012 年參與「春光燦爛·走唱楊逵：楊逵文學音樂節」台中場活動所記

²⁹⁰ 典型如〈送報伙〉、〈蕃仔雞〉中受苦受難的母親妻子。

²⁹¹ 夏潮 1976 訪問，卷 14，頁 168。楊翠。



品中的家庭書寫，蘊含了更為複雜的性別邏輯運作。

戰爭初期，在〈首陽園雜記〉中，楊逵並未提及家庭的幫助，而是在書寫中強調於生活的艱困與知識份子間的互助精神。但到了1942年以後復出文壇，他的小說創作主題卻時常以家庭生活為核心，例如〈泥偶〉、〈鵝媽媽出嫁〉、〈萌芽〉、〈紳士軼話〉等作，皆有與首陽農園極為類似的背景設定，只是在少部份做了調整，這些作品中「耕作」都有朝向社會實踐的隱喻。位居家庭中心的，往往都是這位對社會理想懷抱期待與批判的知識份子，而家庭中的妻子兒女也是重要的協助者，丈夫負責耕鋤、除草、澆灌，妻子負責販售、叫賣，孩子們則幫忙掃除、餵鵝、拔草等等雜務，這樣子的分工圖像，在過往以楊逵為核心的研究中，父親，即楊逵進行「生產」的意義與價值最被反覆探討，符合楊逵平素提倡的勞動價值觀，但也無意中強化了家庭中以父親為中心的刻板認識。如果說「首陽園」本身除了有對抗戰爭意識形態的意義，也具有在資本主義非人性社會下找回自足生活的「新村」理想，²⁹²那麼就不能夠獨厚勞動生產的意義，而應該把「流通消費」、「再生產」等促使這一理想空間得以成立存續的條件給予同等的重視。具體來說，即是必須看見負責業務銷售的妻子葉陶，讓楊逵的辛苦勞作成果得以在市場中兌現為金錢，以及對於楊逵給予足夠回饋和撫慰，包含妻兒等家人的「家庭勞動」，協助楊逵而不至過度勞累，並在勞動過程中看得到對於下一代傳承教育的意義。若沒有結合了「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循環過程，只怕不管楊逵的精神有多麼堅韌也只能夠真的如伯夷叔齊一樣餓死於首陽了吧。²⁹³透過這樣的認識，就可以理解在〈泥偶〉、〈鵝媽媽出嫁〉中對於家庭像的描寫，是緊緊聯繫著「楊逵—首陽園」此一精神風貌的。在這些故事中，敘事者「我」對於家庭的經營，同時也指涉了楊逵對於首陽園精神的經營，而它往往是以身為知識分子的「父親」為核心的。

²⁹² 陳淑容〈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²⁹³ 事實上楊逵也在〈首陽園雜記〉中自嘲並非如伯夷叔齊般的聖人，他對自己的首陽園始終還是必須在市場機制中生存是絕對有意識的。




同代的論者角田兵衛，曾指出楊逵在戰爭期復出後的小說常常描寫圍繞在敘事者旁的天真孩童，對應於貪婪自私的成年人物，是鮮明的形象經營手法，但也質疑此舉使得人物顯得過於工具化而不真實。²⁹⁴誠然在〈泥偶〉、〈鵝媽媽出嫁〉中，敘事者「我」的小孩的天真可愛，往往襯托了反派人物的自私可惡，但他們的不知世事，也成為故事中隱性的衝突點。例如在〈泥偶〉描寫了一位以養家為藉口，實際上不過是想界激發戰爭財，而恬不知恥想跟敘事者借款運用的商人。故事同時描寫家中孩童熱衷捏製戰車飛機等諷刺情景戰。然而對於兒女全然接受軍國主義風潮，敘事者「我」並無法（如作者所願的）提供反戰的思想加以矯正，而只能以正向的戰爭邏輯給予教導（必須鋤強扶弱，不能欺壓弱小），這固然是由於高壓的政治氛圍使得楊逵不能暢所欲言，但另一方面更暗示了那些輕易接受了皇軍榮光而無法讀出小說隱藏訊息的讀者大眾是如孩童一般無知的。這不僅是楊逵對於當局的批判，更是對於無法抵拒法西斯主義的社會輿論之迂迴批判。而〈鵝媽媽出嫁〉中描寫一位醫院院長在採購花木的時候強行要求敘事者家中的一隻母鵝作為回扣，敘事者因孩童喜愛這隻鵝而猶豫不決，卻遭到前來像敘事者討債的農夫譏笑為不通世事。孩童和敘事者的天真，正如同故事中那位夢想著「共榮經濟」烏托邦而遭到欺壓死去的理想主義者一般。這些細節都說明了孩童的天真在楊逵的描寫中未必是全然正面的。²⁹⁵在成人世界的殘酷之中，敘事者扮演了保護孩童純真的角色，但因此同時也是難以被挑戰的，構成了家庭圖像中核心的父系權威形象。

在楊逵發表〈泥偶〉以後，《文藝台灣》1942年7月號的「文藝鼎談」，龍瑛宗與濱田隼雄興致勃勃地討論楊逵近來的作品是否為「私小說」的話題。他們對於楊逵的毀譽姑且不論，將其作品視為「私小說」的看待方式，也同樣出現在前述角田兵衛的評論之中，可見將楊逵的小說解讀為「私小說」的評論家並非個案。

²⁹⁴ 角田兵衛，〈追求真實的困境——楊逵論〉（《台灣時報》278號，1943.2.1）

²⁹⁵ 逵，《楊逵全集》，卷5，頁377~399。



問題是，主要在追求作家個人心境與生活之描摹與提煉的私小說文體，與楊達平素提倡並追求的寫實主義之精神可謂差了十萬八千里。²⁹⁶從一個慣於提倡「科學的」、「寫實主義」的左翼作家來說，這種評論甚至有如對於其「科學的社會主義」立場的質疑。雖然無法確定楊達是否有撰文回應，²⁹⁷但它於其後創作的〈萌芽〉、〈紳士連話〉卻在家庭生活的設定上有了微妙的改變，彷彿是要突顯非關作者本人生活一般：例如在〈萌芽〉之中，雖然場景仍類似首陽農園，但故事裡丈夫因重病而離家療養，妻子則遵循丈夫的指示辛勤地工作，並撫養孩子成長；而在〈紳士連話〉中，更是出現了一名專職推銷農園花木的活躍角色，他對於首陽園的功能讓人想起葉陶，但率直爽朗，專門說真話，即使四處得罪人也不在意的人生觀描寫卻應是楊達有意的角色創造。弔詭的是，這些有意為之的設定更動，卻始終並未改變家庭圖像中以丈夫為主的結構關係。在〈萌芽〉之中，楊達以妻子為第一人稱敘事者，模仿書信體的口吻向正因養病而離家的丈夫描述著自己透過照料他留下來的花園，在和孩子一同勞動的過程中，擺脫自己年輕時在聲色場所工作過的陰影，體認到積極的人生觀，並由此對於社會上追求聲名的浮華潮流進行批判。「父親的不在」，看似使得女性為母則強，找到自主的力量，但卻是建立在對於自己曾涉足風俗產業此一經歷的否定上。妻子女學校中輟的學歷，卻在與具備大學學歷的主角相遇後得到救贖，這又反映了什麼樣的男性焦慮思維？如果懷著這樣的疑問進而去觀看〈紳士連話〉中對於那位彷彿置換了葉陶而形塑出來的爽朗男性角色，就不能不注意到楊達揮之不去的性別偏見，使得葉陶雖曾為活躍的社會運動實踐家，理應成為絕好的創作題材，卻在楊達有意無意的書寫之中被迫消音，而在這些以家庭為背景的小說中，「妻」的角色也往往僅是附和丈夫觀點的

²⁹⁶ 如關於私小說的重要評論：久米正雄〈私小說與心境小說〉就主張將私小說視為對於作家主觀生活的探索，是小說朝向藝術道路的正確方向，而排斥如巴爾札克、杜思托也夫斯基等被寫實主義視為重要典範的作家。《現代日本文學史論爭·上》頁640

²⁹⁷ 1942年7月6日《興南新聞》上出現一篇署名「春田亮」的評論〈私小說に就いて—「泥人形」の場合と「無醫村」の場合〉，認為楊達的作品是否為私小說並非重點，不管是私小說或客觀小說，都必須有對於心理和外在現實的真實認識才能成功。從筆名的特徵，以及其論調，的確很有可能是楊達藉筆名所撰。



背景角色，並無自身特出的立場或性格。事實上，楊達的心境與生活與小說的關聯性在戰後成為被爭論不休的焦點，即使楊達試圖減少對於自己生活的影射，但「私小說」的批評彷彿難以擺脫的魔咒，而楊達本人的寫作也的確有長期侷限於此的現象，如〈泥偶〉、〈鵝媽媽出嫁〉等作，的確存在著不參照楊達實際生活就難以透徹理解的部份。

分析葉陶與楊達的關係，以及楊達實際的書寫，正可以理解楊達如何透過(不)書寫自己最親密的女性，²⁹⁸向讀者傳達他的性別倫理論述。當然，這樣的視角一定程度上是立基於讀者對於他們的夫妻像有所認識才能夠成立的。葉陶

(1905~1970)從小家境小康，經過公學校、台南師範講習科的訓練後，於高雄鳳山公學校執教時認識同為教師，卻積極從事農民運動的簡吉，因而於1927年辭去教職投入農民運動，主要在農民組合的婦女部進行組織工作，並在中南部地區多次擔任辯士進行講演，主要關心主題為婦女與無產階級運動、糖業剝削問題等，為了農民運動的發展而多次進出警局監獄，其對於楊克煌的勉勵可視為此時期她的意志寫照：「革命幹部像到深山探寶，先去的人會受毒蛇、猛獸傷害，但如果沒有一些先去的人犧牲，寶貝就取不到」在農民組合發生派系鬥爭之後，葉陶、楊達、謝進來等人遭驅逐出組織，但葉陶、楊達仍繼續參加文化協會的活動，直到文協為台灣共產黨所掌握。兩人約於1929年結婚，共同打拚度過左翼運動崩壞後生活的困頓，葉陶曾自己縫製成衣並擺攤販賣、後任霧峰吳家的家庭教師，楊達則輾轉從事家庭教師、清道夫、煉瓦搬運工、楊肇嘉秘書等工作，1935年11月，楊達成立台灣新文學社，葉陶負責集稿、募款、印刷、發行等事項，並曾於《台灣新文學月報》發表〈愛的結晶〉等日文作品。²⁹⁹由此觀之，楊達與葉陶的內外分工很早就已形成，到了首陽農園闢建，葉陶亦負責銷售等業務。有趣的是，資

²⁹⁸ 相較於戰爭期中楊達極少在作品中提到葉陶，戰後卻在大量的演講與訪問中提到這位伴侶，這一方面可說是悼亡的姿態，也說明了此前楊達不書寫葉陶知識的特異情形的確值得探討。

²⁹⁹ 楊翠並認為葉陶在此時期留有〈病兒〉一詩手稿，但彭小妍於編纂《楊達全集》時將其誤列為楊達所作。



助楊遠成立首陽農園的警察入田春彥自殺時，在遺書中指名希望由葉陶處理後事，由此可見入田對她的情誼，以及能力的肯定。³⁰⁰前面對葉陶經歷的簡要敘述，說明了葉陶確實是一名有能力、有想法的社會運動家，在這方面時人給予的評價並不遜於楊遠。甚至在寫作方面，她所著的〈愛的結晶〉雖僅是短篇，卻可看出對於經營角色諷刺形象的用心，對於不分傳統進步的家庭對於女性的壓迫皆提出批判，可看出其相對於階級以外的女性自主意識，³⁰¹可惜戰前並未發表其他的作品。從前面簡要的敘述可以知道，葉陶是一名自主、獨立的女性運動者，相對之下，在時人的敘述中楊遠的性格卻是沉默、寡言、甚至多病的，婚後葉陶的諸多經歷可說都是為了楊遠的理想而行動，友人「葉陶兄、楊貴嫂」的調侃雖然看似翻轉了傳統的性別分工，但葉陶的實踐仍舊是循著楊遠描繪的藍圖前進，直到戰後楊遠入獄時才有自己參加「台中市婦女會」的經驗。³⁰²葉陶在追求革命藍圖、扮演革命伴侶的同時在殖民地社會獲得了「越界/躍誠」的能量，³⁰³然而同時也擺脫不了以丈夫／父親為核心的家庭結構，成為襯托楊遠追求理想路徑的協助者，而失去了被自主看待的機會。楊遠在 1972 年葉陶過逝後接受《夏潮》採訪，認為他們夫妻的性別關係較當時流行的「新女性主義」更前進一步：

新女性主義者也曾跟我談過這個問題（與葉陶的婚姻是否類似新女性主義的理想，引用者註）。但我們以前的種種比現在的新女性主義更前進一步，因為我們並不是談好條件，劃分好全力義務，而是積極走同一條路，不計較得失，不分內外。……這種女權運動是針對整個社會，並不僅是在家庭裡向丈夫爭平等、爭利益而已。³⁰⁴

按 70 年代正是呂秀蓮在保守的黨國體制下提倡「新女性主義」，以較具妥協

³⁰⁰ 本段所述葉陶生平主要來自張季琳，並參考《土匪婆 v s 模範母親：楊遠的牽手葉陶》一書其他所選篇章寫成。

³⁰¹ 楊翠

³⁰² 《土匪婆 v s 模範母親：楊遠的牽手葉陶》

³⁰³ 楊翠使用之比喻

³⁰⁴ 〈我要再出發——楊遠訪問記〉，楊遠，《楊遠全集》，卷 14，頁 168。



性格的「男女平等」、「女子的獨立人格和尊嚴」為主要訴求，首先在大學學院等知識份子群體進行提倡，也引發不少波瀾³⁰⁵。雖然不清楚楊遠與哪些「新女性主義者」曾經接觸過，但從他不願意為其背書的態度來看，或許正是左翼運動者強調階級解放為本，性別解放為末的表現吧。他所強調的「積極走一條路，不計較得失」的團結路線，難道不正是以將女性作為運動中附屬者的政治策略嗎？日治時期文化協會重要成員莊垂勝之子林莊生回憶小時候家住首陽農園臨側，兩家時常戶串門子，一次葉陶來家中拜訪的經驗：

有一天我在客廳旁聽客人的議論時，陶姊（指葉陶，作者註）氣哼哼地進來，在座的客人她都認識，但卻沒向他們打招呼，直向父親申訴她在外面所受的氣，對方大概又是警察，陶姊對這個人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咆哮一陣，在座的一位客人說：「這裡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都很同情你的心情。……」另一個說：「查某人不要這麼兇！」第三個接著說：「這種事情你們查某人不用管，由我們查甫人去交涉就可以。」……她大概也覺得不好意思吧，慢慢靜下來，然後走出客廳去廚房找母親。……我心想，此刻她在廚房跟母親談「柴」、「鹽」、「米」等家庭瑣事，一定一點興趣都沒有。她是「身在廚房，心在魏闕」啊！³⁰⁶

這是一個充滿多重象徵意義的場景。一方面它呈現了日治時期從事文化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在男女平等上的保守性格，葉陶雖為具有自主性的「異端」，但始終仍是無法進入象徵公共領域的「客廳」，只能自動進入「廚房」，委身於支援男性的角色。即使女性角色積極地表現了對於男性民族解放敘事的認同和實踐，但她們仍然被認為是缺少代表性的，「如何抵抗」的權力被掌握在群聚在客廳的男性知識份子手中，而能夠洞悉其中不平等的，卻只能是尚未接受父系權力的孩童，

³⁰⁵ 謝蕙風，〈初探七〇年代男性知識份子對新女性主義的言論與態度〉，《東華人文學報》第8期，2006年1月，頁173-212。

³⁰⁶ 楊建等，《土匪婆 VS 模範母親：楊遠的牽手葉陶》（台南：楊遠文學紀念館，2007）。頁118




他們在公共領域中往往被認為和女性一樣缺乏自主能力。有了這樣的認識，就不會意外楊逵在幾篇以首陽園空間為藍本的小說將女性角色邊緣化的情形了，對他來說，只要呈現出丈夫／男性追求理想的姿態與精神，妻子／女性事實上正可以被擺在附從的角色，「積極走同一條路，不計較得失，不分內外」。

事實上，即使在戰爭動員已經控制殖民地社會的處境，女性的自主解放也絕非與反殖民的能量毫不相關。為因應戰爭動員的需求，如何將女性束縛在既有漢人家父長制的位置之中，避免在「女性解放」的口號下引發對於個人主義的崇尚，並使之成為國家可以運用的勞動力，殖民政府在宣傳上採取的是女性應同時為家庭和國家服務的「女性勤勞觀」³⁰⁷。雖然性別、階級、民族運動的孰先孰後、如何結合、是否勢不兩立已是長久以來難解的爭論議題，但面對戰爭情境下國家對於女性的收編，思索女性如何擺脫家庭、殖民政府的雙重控制，不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對於這點，葉陶在〈愛的結晶〉一文中其實早已有所發揮。³⁰⁸可惜這樣的思想能量在楊逵的書寫之中也並未分享或繼承。甚至在像是〈萌芽〉這樣的作品中，風塵女性捨棄浮華的自我，全心全意投入勞動生產，借以改造自我的敘事，已經與在戰爭中要求終止高級娛樂，全民節約報國的意識形態宣傳難以切割。

究其所以，對於「家庭」的性別想像，的確構成了楊逵此時期首陽園書寫的重要基礎。上一節曾討論到首陽園影響了楊逵對於鄉土的意識，而首陽園同時也正是楊逵身為「一家之主」，得以維繫自身理想實踐的重要空間。楊逵對於家庭的描述混雜著自身對於實踐挫敗的焦慮，例如身為父親對於幼兒被法西斯主義影響的無奈（〈泥人形〉），或者對於社會階級剝削的無力鬥爭（〈鵝媽媽出嫁〉）這些都顯示了「家庭」對於楊逵此時期文學思考的重要性，也建構出一種以男性知識份子為主的家庭／性別倫理論述，可以回到「首陽園」的空間意義上結合理解。如

³⁰⁷ 楊雅惠，《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

³⁰⁸ 楊翠認為，〈愛的結晶〉對於女性是否在「封建」或「進步」兩種家庭之中，接受到更大的父權或階級社會的控制，有著尖銳的提問。楊建等，《土匪婆 VS 模範母親：楊逵的牽手葉陶》。



此一來，更尖銳的提問就會是：是誰掌握了從戰前「首陽園」、到戰後「一陽農園」到「東海花園」等空間的使用與詮釋權？當蘊含著社會實踐理想的躬耕空間被建立起來，它的公共性是否只對於男性開放，即使女性未必缺少參與的意願或能力？從這個面向上來說，就算楊達透過首陽園空間建構出來的性別倫理不足以稱作對20年代左翼運動中強調婦女解放理念的背離，至少也是在面對國家與漢人父系家族的保守倫理意識時一種尷尬的妥協。



第三節 反思大東亞：楊逵的國家倫理論述

若要比較楊逵與張文環在戰爭動員位置中的差異，最明顯的應是張文環在皇民奉公會成立不久，便被網羅為台北支部、中央本部娛樂委員會等核心的幹部，而我們僅能確認楊逵曾擔任奉公會最基層單位「奉公班」的指導者「世話役」，以及在 1943 年左右加入奉公組織「台中藝能工作隊」。從兩人發表的文章觀察，張文環也的確是比楊逵更有系統地配合當局發表支持戰爭的文字。由於楊逵在戰後初期主動改寫了〈泥偶〉、〈鵝媽媽出嫁〉、〈萌芽〉等作品中應和時局的部份，戰後長時間以來楊逵於戰爭期的意識形態問題甚少受到挑戰，甚至可以說，在 70 年代重新建構臺灣新文學抗日精神的風潮之中，楊逵本身就被視為是台灣人抵抗戰爭的絕佳意識形態象徵。直到 1986 年張恆豪發表〈超越民族情結重回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一文，引發王曉波等人的論戰，楊逵戰前文學的曖昧性才藉由原稿的還原與翻譯而重新被認識討論。自 30 年代以來，楊逵便對抗著法西斯主義的進逼，雖然中日戰爭爆發後一度避居首陽農園，然而正如前述的討論，他是絕對不甘於就此湮沒無聞的，在生活上軌道之後，趁著文壇的景氣恢復，他便積極展開創作活動，然而在實踐的同時，也必然地要面對戰爭動員體制已經逐步掌握臺灣文化界的情境，無法標舉左翼先鋒姿態的同時，楊逵也必須作某種程度的妥協。

可作為明顯指標的時間點，是約在 1942 年底，楊逵開始在總督府情報課發行的雜誌《臺灣時報》上發表文章。此時正是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舉行的時間點，楊逵先是發表〈鵝媽媽出嫁〉這篇諷刺知識份子和平共榮幻夢的小說，接著便是〈寫於大東亞文學者會議之際〉這篇文章，同號刊載了張文環、濱田準雄等人出席的「大東亞戰爭と在京臺灣學生動向」座談會會議記錄。正如前面提過的，楊逵在戰後回憶，這樣的機緣是來自於臺灣時報編輯植田等人的熱情邀約，並且說明是由於這些日本知識份子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因而才同意提供稿件，同時不



忘提醒我們作品中的「批判精神」：

我對他（植田，引用者注）說：「如果要我們作家合作，必須讓我們報導實情在的情形，在文學方面，也是描寫實情。如要我們歌功頌德，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口答應了。所以我寫了一篇「泥娃娃」給他。泥娃娃的主題是不可仗恃。另一方面在指責日本軍部不該在幼兒稚嫩的心靈裡，灌輸好戰的思想。和他們主張的「東亞共存共榮」完全背道而馳。³⁰⁹

當然，即使在戰前原稿公開的今日，楊逵於〈鵝媽媽出嫁〉等作品中表達的「抵抗精神」依舊清晰可辨，造成當代爭論的是其中（或曰評論者的）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然而基於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必須對所謂的「批判精神」進行更徹底的分析。例如「真正的東亞共榮」、「必須清除阻礙我們建設大東亞的負面人物」等論述方式，可以看出楊逵對於國家倫理的論述，是有意識地操作戰爭意識形態的宣傳語彙，相較於張文環在傳統鄉土中尋求安身立命的思想資源，楊逵則不斷強調工農大眾在僵化的戰爭體制下的生命力，表達對於當政者須體恤民生、改革貪弊、正直行事的期許。在這種論述策略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大東亞戰爭的霸權性語言如何整合了「轉向」後的左翼語言而發揮影響力，一方面也可看見楊逵在這種困境中仍企圖建立一套倫理敘事的用心：與其在戰爭中高唱東亞共榮，不如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方更有說服力。類似的諷刺敘事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屢屢可見，那些描寫有權勢者俗惡面貌的段落在戰後的國族主義視角看來，固然具有證成國族正當性的意義，但這已是事後諸葛；³¹⁰若將情境置回當時的殖民地臺灣，楊逵對於殖民政權的批評往往只及於特定的樣板人物，而難以對殖民體制本身提出顛覆的想像，這與二三零年代楊逵的思想路線已經有了不小的差距。尤有甚者，楊逵屢屢對執政者喊話的姿態，說明了面對戰爭動員的社會情境，他的回應方式是透過《臺灣時報》等官方刊物直接對執政者喊話，而非（至少在言論思想上）

³⁰⁹ 〈光復前後〉，楊逵，《楊逵全集》，卷14，頁12。

³¹⁰ 在現今更為流行的概念則是「去殖民」

組織勞苦大眾或知識階層與之對抗。若說左翼社會運動的重要方法論在於藉由社會矛盾組織受壓迫者，楊達此時的文學與言論活動則是大大減少了煽動鼓舞的色彩，而轉變為一己知識份子的良心建言。他代言的對象已非想像的工農群眾，而是固守首陽農園的這位知識份子自身的良心。



鶴見俊輔曾經以「偽裝轉向」的概念討論以近衛文麿、尾崎秀實為首等短暫活躍於戰時日本政壇的知識份子，指出由於這些人士由於抱持著進入體制進行改革的信念，在主觀意識上仍保持著對於戰爭的批判、甚至對左翼理念的信仰，然而由於位居官職，不得不成為配合戰爭體制推進的協力者。對這樣的人來說，主體意識不得不產生分裂為「遵循體制」、以及「以旁觀者的立場抵抗體制」的兩個主體，如何保持兩者的分立而不混淆？能夠理解其純潔意志的理解者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便無從區分真實轉向與偽裝轉向的差異了。³¹¹而在楊達的案例，或許他不曾位處戰爭動員的重要權力位置，但或許因為動員體制是如此徹底而不容許置身事外，又或許自身對於參與時代政治的渴望，他選擇配合體制的運作，同時向時代發出不平的聲音。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對抗文學的法西斯主義上與張文環、呂赫若等台灣知識份子站在同一陣線，³¹²楊達似乎與部份在台的日本知識份子也達成了類似的信任關係。在楊達的回憶中，植田富士太郎、淺田實男等《臺灣時報》的編輯，是理解其批判精神而協助發表〈泥娃娃〉、〈鵝媽媽出嫁〉等作品的人道主義者，而長期任職《臺灣新聞》的文藝編輯田中保男，不僅是他 30 年代左翼文藝路線的重要支持者，在戰爭期也合作組成「台中藝能奉公會」，演出《怒吼吧支那》等劇目。可以說楊達在戰爭期的活動，完全沿襲了 30 年代與日本人知識份子合作的路線，不同的是，他已不再仰望中央文壇，而與在台的日本人群體有了更多具體合作，關係也顯得平等許多。

³¹¹ 鶴見俊輔〈翼贊運動の設計者：近衛文麿〉收錄於思想の科学研究所主編東京：平凡社，1962），頁 53。

³¹² 代表性的事件即如「冀寫實主義論戰」。




如果分析這些在台日本知識份子在戰爭期的言動，可以發現他們均發表不少支持戰爭的言論，然而也流露出在戰爭動員的時勢中依然堅持人道理想的色彩。例如植田富士太郎、田中保男。雖然此處沒有足夠的資料深入剖析他們此時期思想的性質，然而將大東亞戰爭視為難以抵擋的歷史動向，而企圖在其中進行某些社會實踐，可說是他們共同的思考。³¹³就這一點來說，的確與楊逵此時期的想法十分近似。甚至可以說楊逵與《台灣文學》陣營缺乏明顯一致性的合作，倒是《台灣時報》雖為官方刊物，卻堅持部份知識份子批判性立場的色彩，與楊逵在戰爭期以諷刺筆法對當權者提出建言的姿態更為近似。

從〈寫於大東亞文學者會議之際〉這篇文章來看，楊逵引用改造社《時局雜誌》、《文藝》對於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的言說，正是延續了30年代以來對於左翼文化界的關注，然而此時改造社已在「全民翼贊」的民族主義風潮中難以自持，也就讓人不免思考楊逵對於集體轉向後的日本知識界採取何種態度。文章中這樣強調：

雖然我們現在的理想是以共存共榮為目標，但是，自古以來，只要是關於政治，任何人都不能忽視支配與被支配這種明顯的事實。就算支配的型態各色各樣，底下流動的本質多半都不是一體同心，也不是共存共榮，這是不容忽視的一點。追求東亞共存共榮的日本，不能是這個樣子，而必須創造出一種新的型態。……讓這些文學工作者們坦率地寫出各地的民眾心聲，寫出他們的喜怒哀樂的真正樣貌，日本的一億國民就能和他們一起分享他們的喜悅和悲傷；只有這樣，才能期待獲得他們的協助，這是建設大東亞不可或缺的。我們應該要理解，當大東亞幾億人個個都不是被迫而是志願貢獻心力時，那將多麼美好！³¹⁴

³¹³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1），頁137。及參考《台灣時報》編輯後記。

³¹⁴ 楊逵，《楊逵全集》，卷10，頁53-55。



楊逵試圖利用「大東亞共榮圈」本身的理念對於戰爭的暴力性質進行批判，提出文化建設的可能性。然而這種思考理路，其實與進入戰爭動員體制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並無明顯差異。根據鶴見俊輔等人的分析，約在 1940 年前後經歷「全民精神總動員」、「大政翼贊」下的左翼知識分子動向並不如 30 年代的轉向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相反地，在大東亞戰爭已成現實的情況之下，是否能藉由戰爭體制下國家角色的轉變，藉而建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主義國家、甚至推廣至東亞地區的整體性變革，成為許多左翼傾向者的理想。³¹⁵楊逵雖往往表達了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不完全信任，但在他的論述之中，卻往往僅呈現出對於「正義」的訴求，而缺乏更實質具體的內容。雖然由此要推斷楊逵在立場上支持戰爭是難以成立的，但相對而言，卻也可以看出身處戰爭情境下的楊逵，思想的眼界難以跨越日本文化界此一疆界的事實。

在〈第三代及其他〉、〈談水滸傳〉等文章中，楊逵表達了對於認識中國的渴望，然而與其說這是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戀慕，不如說是對於無由參與東亞變動局勢的焦慮。綜觀楊逵在戰爭期對於中國的描述，其實也不脫「官逼民反」的人民革命式史觀。或許可以說，此時期楊逵的中國想像正是使他得以借力使力地在大東亞戰爭中談論階級觀點的一種寄託罷了。這種傾向在楊逵搬演〈怒吼吧支那〉這齣劇本的始末中顯現地十分清晰。

〈怒吼吧支那〉原為俄國左翼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的劇作，內容根據發生於中國萬縣的真實事件，講述英國船艦為了報復美國商人哈雷之死，竟以砲擊威脅地方官，要求以無辜的船夫作為祭品，雖然他們邪惡的行為終於得逞，但工人們也在廣東革命軍假扮的伙夫鼓舞下產生了反抗的意志。³¹⁶相較於原作對於革命動能的強調，楊逵所引用改編的版本，卻是於日軍佔領區經過大幅改編，以慶祝汪

³¹⁵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頁 69


³¹⁶ 邱坤良《人民難道沒錯嗎？：〈怒吼吧，中國！〉·特列季亞科夫與梅耶荷德》（台北：印刻，2013），頁 182。

精衛政權對英美宣戰，符合大東亞戰爭意識形態的版本。這套版本由竹內好翻譯回日語圈，最大的差異在於刪去了「伙夫」、「和尚」等具有共產主義、民族主義色彩的角色，並且新增了「大東亞戰爭宣戰當下」的序幕、終幕，將人民受到的剝削、由此引發的革命動能，用來合理化戰爭的意義。³¹⁷楊逵在改編此劇時並未察覺到這樣的落差，所作的少數更動，也僅是增添了犧牲者的兒子長大後於戰爭中意圖向英美帝國主義者復仇等橋段而已。由此可見楊逵對於大東亞戰爭的認識的確受到日本左翼文化界轉向後處境的侷限。³¹⁸而這正是日本帝國打造的國家邊界在殖民地知識份子身上造成的深刻烙印。如「國民帝國」這樣的體制容納了左翼轉向後的國家集體主義，以及右翼膨脹產生的國家法西斯主義，同時標舉了大東亞共榮的口號，企圖將多民族帝國的矛盾以酒井直樹指出的「種的論理」加以囊括。我們雖然不應將其視為密不可破的意識型態霸權，然而在殖民地日語世代作家楊逵的身上，它的確造成了思想的重重大困局。

楊逵如何看待「國家」的問題，其實長久以來並未被嚴肅看待。諸多對於楊逵思想與文學的評價，都急於指出楊逵的生命受到白色恐怖之摧殘，而藉此引伸出彷彿貫串一生的「抵抗精神」，卻鮮少探問楊逵八十年的人生，在思想與實踐上是否曾經有所轉變。正如前述指出的，楊逵在三零年代面臨的「轉向」問題，是從反體制走向文學抵抗，然而對於日本左翼文化界的過度依附，使他難以擺脫實踐上的矛盾。對於「日語」的依賴，正說明了日本如何以「國民帝國」的方式對於殖民地進行霸權式的治理。楊逵縱使在思想上堅持對於日本執政政權的批判，但在左翼文化界紛紛轉向解體的戰爭期，也變得難以建構對於國家體制本身之批判路線，而走向了烏托邦式的人道主義。

³¹⁷ 星名宏修〈中国・台湾における「吼えろ中国」上演史：反帝国主義の記憶とその変容〉，《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3期，1997，頁23~58。

³¹⁸ 此處並非要將竹內好等同於左翼轉向的思想家，然而他身為中國文學研究者，卻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支持「大東亞聖戰」的思考路徑，也正反映了日本知識份子處在左翼紛紛轉向後的困局，由於已經沒有能夠引領對抗帝國本身的共產主義理想，而變得難以抵禦戰爭的意識型態。



這並不代表楊逵已經失去了對於如何動員大眾的興趣，相反地，在國家以戰爭之名動員各種社會力的同時，國家倫理的動員取代了社會運動動員的可能性，引發楊逵的關注。例如〈常會團樂論〉、〈臺灣出版界雜感—特に赤本について〉等文，楊逵均十分關心戰爭體制對於人民集體性的捲動，向當局者指出庶民生活的豐富性，認為必須配合底層人民的喜好與慣習，才能有效地提昇其政治智識與參與。這固然可能是延續了楊逵從左翼立場對於人民集體行動動能的關心，然而動員的主體已經由階級意識轉變為國家。縱使楊逵對國家統治階層與其技術依然保持著批判性，然而由於他對於動員機制的過度著迷，反而使得其真實意圖變得模糊而難以定位。或許楊逵的確藉由操弄國家倫理的話語而獲得了實踐發聲的空間，同時又以「偽裝轉向」的方式堅持了自己不願妥協的價值觀，但不能不說這樣的基礎仍舊依附在此時期日本的「國民帝國」體制之中。楊逵在此時期強調的動員倫理，強調知識分子向勞農學習的必要性，以及勞動大眾的神聖性，在實有不同勢力角力著的殖民統治中獲得了特殊的傳播空間，但這樣的價值仍可以說是與戰爭的意識形態相當貼合，甚至可說支持了以「國家」為名對倫理敘事之壟斷。也就是說，原本具有階級矛盾意義的「大眾」，被轉化成為渴求被國家公正對待的「國民」。

只有清楚認識到楊逵在戰爭期對於國家倫理論述的侷限，我們才能如「火中取栗」³¹⁹般地挖掘他在這時期思想的重要意義。〈鵝媽媽出嫁〉這篇 1942 年發表於《台灣時報》的小說，正好體現了楊逵在戰爭期的批判路徑之樣貌為何。這篇小說在當代被視為楊逵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傳達了日本帝國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壓榨與掠奪，故事中「鵝媽媽」的被迫出嫁即為重要的象徵。若從故事結構觀之，敘事者先是談到好友「林文欽」的死亡，透過兩人在東京就學時懷抱遠大理想的

³¹⁹ 竹內好在〈近代的超克〉一文中，試圖在受到戰爭動員干擾的諸般思想之中找到能夠令戰敗的日本人找到真正「獨立」可能的思想方向，對他來說這絕不是一條沿著政治正確方向的簡單道路，隨時可能陷入自我矛盾甚至政治上的危險。但他強調不經過這樣的危險，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思想。竹內好，孫歌譯，《近代的超克》（上海：三聯書店，2005）



回憶，對比歸台後兩人先後只能自立耕作以求生存的窘境。林文欽家本為富豪地主，然因父親過於樂善好施，不僅財產虛耗，還遭公司友人騙光家產；林本人至死前仍致力於研究可說是結合儒家理想與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的「共榮經濟」，成為絕大的諷刺。故事後半部，敘事者與一名醫院院長談成一筆松柏採購的大訂單，但院長不僅順口討走許多價值不菲的商品，讓這筆生意毫無利潤可言，還暗示敘事者必須要贈送那隻敘事者孩童疼愛的母鵝作為回扣——但牠方才找到自己的伴侶，陷入濃情蜜意之中——否則便不願意支付貨款。這樣不近人情的行為呼應了林文欽的遭遇，因為那位家族的最大債主，同時也是騙走家產的罪魁禍首也曾提出條件交換，若將林文欽的妹妹嫁給他做妾，他就可以資助林文欽家族不至於貧窮。林文欽因否決這樣的「交易」而貧困至死，敘事者則在供應商的債務催逼之下不得不妥協，終於拿到比預期還要更多的貨款。這裡涉及的「交易」已不僅僅是經濟性的剝削掠奪，而是對於社會倫理，甚至個人尊嚴的欺凌。「為什麼非得執著於她（牠）不可？」是閱讀時會自然湧出的疑問。在這裡，掠奪者利用權勢、債務而提出的「迫婚」，並非是因為想要更多的利益，而恰恰是由於某種扭曲的「愛戀」而為之。

解讀到這裡，可以發現這正是對於「大東亞戰爭」裡中日關係的隱喻：林文欽家族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不管是「共榮」的理念或對於競爭關係的缺乏警覺，都可以看作是近代以來中國始終無法跟上弱肉強食的國際局勢之象徵，而自中世紀以來長期居於中國藩屬地位，接受文化餵哺的日本，卻也是在近代以來歐美以槍砲打造的競爭世界中脫穎而出。透過故事中這兩組並未被明說的情慾暗喻，楊逵可以說向讀者揭露了，日本帝國發動戰爭的背後集體心理狀態，正是基於某種反客為主的虐戀（Sadomasochism）心理，打出協助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口號，實際上卻反映了從自卑轉化而來的侵略性心理。竹內好在戰後對於日本近代思想的反省之中，曾經以中國與日本思想中對於「近代」的態度加以比較。他指出，日本知識份子對於歐洲列強的自卑心理，導引為對於「近代」的無限制擁



抱；相較之下中國的魯迅卻明白地察覺到「近代」本身作為啟蒙主義的問題，如果只是擁抱「近代」是無法讓殖民地甘為奴才的人們自由的，因為他們只會希望自己取代主人，成為另一個暴君。竹內好藉此指出，日本之所以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正是由於企圖對自卑心理的翻轉，雖然改變了自身在「主人—奴隸」的位置，卻並未改變奴性，亦即主奴結構本身，終究只能成為無法擺脫奴性、無法真正自由的暴君。³²⁰

在這裡並非要將楊逵的思想等同於竹內好，相反地，竹內好的思考因為充分體認到自己身為日本人的侷限，而將自身對峙於日本國族，從而找到了對抗「近代」的資源；楊逵則未能找到這樣的立基點，對「國民帝國」的體制進行明確的批判。楊逵在其他地方說明〈鵝媽媽出嫁〉的意義時，往往呼籲「只要本地出現一個向前述那樣利慾薰心的人物，……對大東亞的建設而言，是非同小可的問題」³²¹不能視作對於戰爭的立場認同，但是這種帶有強烈啟蒙性格的論述建構，也使得楊逵在接觸跨越日本帝國國境的結構性限制之下，難以如竹內好般以魯迅式的「回心」對於「近代」或「國族」本身進行批判。在〈鵝媽媽出嫁〉以及其他的評論之中，楊逵挪用了「中國」這個看似與自身相近的符碼以批判日本帝國，卻忽略了自身不論是思想資源、文化場域都立基於日本的國民帝國霸權之上的事實，難以進行反思。楊逵是鮮少自我批判的，他在論述倫理問題的方法，往往採取了「答客難」的形式，亦即建構一位秉持著主流觀念的虛擬對話者對己質疑，自己再提出反駁。這種形式是對於國家倫理的屈意諷刺，但同時也暗示了「我」的獨樹一幟、正確無誤。楊逵這種「非轉向」的姿態正如柄谷行人指出的，如果缺乏對於群眾組織動能的考慮，很容易成為另一種「轉向」，將自己絕對化，放棄與集體共同承擔倫理責任的風險，成為革命性行動的阻礙。³²²前述便曾討論過楊逵對於描寫群眾動能之力不從心，到了戰爭期依然是如此，甚至在目睹國家對於

³²⁰ 竹內好，孫歌譯，《近代的超克》（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181~222

³²¹ 楊逵，《楊逵全集》，卷10，頁55。

³²² 柄谷行人，《倫理21》，頁207。

群眾動員之優勢力量之下，因而出現了如〈解消首陽記〉那樣的自承無能，將集體動員的正當性交給了國家。



楊逵試圖從大東亞共榮之理想的破綻解構戰爭的正當性，從而質疑了國家的動員倫理。但另一方面卻又因無法突破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結構性對立，挑戰「國民帝國」的理念，對於動員本身的過度耽溺造成了危險。因此，任何一種將戰爭期楊逵的思想放置在國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皆然）定位下的嘗試，可以說都忽略了楊逵在面對「國家」問題時的捉襟見肘，加劇了其論述的弱點，唯有正視楊逵在戰爭情境下的發言與論述位置，才能發掘其於當代更多可能的價值。



第四節 階級倫理的轉化

在進入戰爭期以前，楊逵的小說分別從農民、工人兩種階級來書寫社會中階級不平等的境況。1934年發表的〈送報伕〉的結構可以說正是試圖同時處理農民、工人兩種階級分別在殖民地臺灣與帝國日本受到的剝削問題；小說中形象地描繪了殖民者對於農民土地的掠奪，以及資本家對於送報伕勞動力的濫用與詐欺。他告訴讀者，農民與無產階級之所以生活悲慘，全是由於支配階級對於他們應得之物的巧取豪奪，因而符合倫理的行動便是團結並挺身而出，將被奪走的生活資料奪回來，破除這樣的支配關係。這是一種「行動的倫理」，目的不在於陳述在既有社會秩序下的合理互動關係，相反地，則是致力於揭示既有秩序的不合理，甚至是支配階級對於被支配階級所負的「債務」，因而唯有採取打破秩序的舉動才是道德的。這並不代表倫理的重要性變得曖昧，相反地，唯有透過對於倫理的不斷召喚，楊逵才能維繫住對於作品的情感強度。「我」是被支配階級，「他者」則是支配階級。透過這樣的二元對立，楊逵建構出符合當時左翼思想世界觀的倫理論述。值得注意的是，知識份子的角色在這樣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中如何被安放。在〈送報伕〉之中，身為知識份子／學生的主角和朋友田中君必須透過辛勞的工作才能賺取學費，也和其他勞工階級出身的送報伕同吃同住，因而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認同。在楊逵的筆下，知識份子除了認識到自身的貧困化，並且與被支配階級共同團結起來抗爭之外，別無他途。這種圖式在〈模範村〉(1937)更為明顯，故事中兩位靈魂人物，一是農村地主的兒子阮新民，在東京留學歸鄉後，發現村民的悲慘生活；一是困於殖民地的現代窮秀才陳文治，雖然通過文官考試，卻只能在農村開設不合時宜的私塾，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在故事的結尾，地主兒子選擇背叛了父親，將講述左翼思想的書籍交給窮秀才，由他帶領村裡的年輕人進行思想的武裝，為了將來的農村鬥爭做準備。楊逵明白地指出，知識份子應該認識到發生在農村與社會上其他角落的苦難，並且瞭解自己可能就是造成這些苦難

的幫凶。與支配階級決裂，因而成為了唯一符合道德的選擇。如果說楊逵在 1934～1937 年間的文學活動都致力於闡述這幅階級倫理的圖像，也許並不為過。即使社會運動的組織實踐之路已經被阻斷，但楊逵仍然寄望於文化場域的鬥爭，希望利用文學進行「植民地大眾的爭奪」³²³。

但到了戰爭期，台灣知識份子的實踐卻陷入了更明顯的困局，楊逵期許的階級倫理圖像難以實踐。繼總督府 1935 年的地方自治改革，收編了大量的社會運動菁英進入國家體制，1937 年 7 月，台灣人僅存的社會運動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中日戰爭的陰影下宣告解散。同時期，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份子之文化地盤《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也相繼停刊，四大報也共同宣佈自主廢止漢文欄，重創漢文知識份子的文學發表空間。楊逵於 1937 年 7 月赴日尋求日本文化界的進步勢力給予協助，在中央文壇為台灣文學爭取活動空間，然而終告失敗。在這種心境之下賡續完成的〈模範村〉，故事中竟也充滿了對於東京／中央的無限期待，希望台灣的知識青年能繼續自我備戰，等待與東京返歸的進步勢力合流。³²⁴然而回到台灣，生活經濟的重擔卻已經把他壓垮，甚至面臨被債主告上法庭的窘境，幸而得到左傾警察入田春彥的幫助，得到了可耕作的土地，用以維持生計。這樣的處境使楊逵從一個力圖召喚知識份子加入左翼陣營的「先鋒黨」，變為僅能自求溫飽、無暇他顧的莊稼漢；他仍不放棄身為知識份子的驕傲，吟著東方朔的〈嗟伯夷〉，自許為有所不為的隱士。在〈首陽園雜記〉中楊逵慨歎「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許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士正十分活躍，發揮其天分；不遠的未來，可能會出現部長級的人物吧」³²⁵其實也正是對於台灣知識份子被戰爭動員體制收編，從扶助工農無產者的階級隊伍中脫隊的失落與不滿。

與此相對的，卻是察覺到懷抱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與死亡的距離如此之近；

³²³ 陳培豐，〈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伏》、《國王》、《水滸傳》〉

³²⁴ 楊逵，《楊逵全集》，卷 5，頁 144。

³²⁵ 楊逵，《楊逵全集》，卷 9，頁 486。



楊逵寫到黃朝東與楊華突然身故，都是在窮困潦倒之中寂寞地死去。幾個月後，曾拯救楊逵於山窮水盡時刻的入田春彥竟也服毒自殺。入田在遺書中寫到自己的性格具有如芥川龍之介一般的虛無成份，是令人注意的提醒。芥川龍之介於1927年服毒自殺，原因雖然眾說紛紜，但其中一種有力的解釋便是，面對宛如怒潮般快速成長的普羅文學運動，芥川龍之介無法接受，但也沒有立場與之對抗戰鬥，因而選擇以自殺的方式放棄了文學之路。而以宮本顯治為首的普羅文學作家們則是以左翼運動的倫理價值本位，批判他的自殺代表了布爾喬亞階級作家的虛無主義，是一種「敗北的文學」。³²⁶如果說芥川的死代表了一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於政治運動的怯懦與自我否定，在台灣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浪潮中，入田的死則是察覺到自身同時身為國家權力代言人（警察）與民族壓迫者（日本人）的雙重自我否定吧。³²⁷在時代的倫理要求下，兩人竟有著類似的苦惱而選擇走上絕路。³²⁸這毋寧說明了楊逵在戰爭期思索個人與知識份子群體之倫理位置的艱難處境，他寫道「品格高超的人思想是多麼受到束縛！品格高超的人一旦受到時代或制度的限制，會變得多麼卑下！」³²⁹當社會實踐的道路在時代的扭曲之下已經佈滿荊棘與陷阱，楊逵於是選擇反躬諸己，將「首陽園」的躬耕生活作為新的實踐方向。這也使得他對於階級倫理的思考有了新的起點。

在本章第一節已經討論過，在首陽園的農耕生活使得楊逵開始以「農人」的身份自居，發展出泥土、糞便等與耕作經驗密切相關的論述修辭。這樣子的身份轉換一定程度紓解了楊逵身為知識份子的苦惱，而將自我實現的價值置於肉體的

³²⁶ 栗原幸夫，《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頁18-24。

³²⁷ 入田給楊逵的遺書中極力澄清他並非只是突然追隨芥川的虛無，「我多少寵壞了芥川式的虛無，也是個事實。但是，我給予了它令戰鬥更加激烈的任務。我不希望被過重的評估芥川式的虛無。」或許可以說與芥川不同的是，入田正是希望透過自己身為日本人的死，激勵楊逵在殖民地台灣作更長遠的戰鬥吧。張季琳，〈楊逵と入田春彦——台湾人プロレタリア作家と総督府日本人警察官の交友をめぐる〉，《日本臺灣學會報》第1期，1999。頁143-152

³²⁸ 對於入田春彥的生平及思想考察，可以說以張季琳最為深入。她指出入田具有左翼思想背景，甚至可能是「轉向者」，但在台灣發表的作品來看，思想較接近人道主義的白樺派，受芥川龍之介影響亦深。而陳淑容〈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則就入田與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關聯性做了更進一步的考察。

³²⁹ 楊逵，《楊逵全集》，卷9，589。




勞動。在此之前，楊逵極少寫到自身的勞動經驗，而在〈送報伙〉中描述的，也僅是痛苦的、不合理的被剝削經驗而已，顯示了勞動並未內化於他的寫作之中；然而自〈首陽園雜記〉開始，他得以書寫自身愉快的勞動經驗，欣喜於體魄的健壯，擺脫病弱的身軀，也在〈泥偶〉、〈鵝媽媽出嫁〉中書寫家族共同經營田園的天倫之樂。在〈萌芽〉之中，他藉由女主角的勞動表達了對於田園工作能夠給予勞動者文化貢獻之期待：

真的，像大群螞蟻搬食物一樣，滿畦都是滿滿白色，十幾種花和蔬菜都萌芽了。我親手建立起來的這塊新園地，就這樣慢慢開始生長起來。我和孩子也在工作中一天天發現新的快樂，而感受到無盡的喜悅。想到不久之後，就可以和社會上的人們分享美麗的花和新鮮的蔬菜，我就覺得好興奮。而且，我懷著最大的喜悅，期待著他日能在這個園子裡，創造出勞動者精湛的戲劇，把我夢中的感動傳達給勞動的人們。³³⁰

相較於此前對於工人農民勞動感受的隔閡，透過田園勞作的經驗，楊逵找到了對於勞動的認同，也拓展了知識份子實踐可能性的縱深，期許透過自身的力量為勞動者的文化闢建舞台，將一己的勞動經驗，跨而為對於工農階級的連帶認同。³³¹這有助於楊逵從己身經驗出發，思考社會上不同階級互動的複雜形式：他花了更多力氣描寫那些在社會體制與時代變局中鑽營取巧的人們，他們雖然不是在階級政治中典型的反派：資本家、封建地主、國家機器，但如同楊逵已經進行書寫的視角轉換，從堅持左翼政治哲學的知識份子到躬耕一體的「老百姓」，他並未放棄二元性的「壓迫—被壓迫」之階級圖像，卻得以將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面貌進行更多元化的思考，例如在〈泥偶〉中描寫想藉由戰爭發財的投機分子、〈鵝媽媽出嫁〉描寫藉職務之便中飽私囊的公務員等。這種多元性更符合一般庶民群眾對於社會壓迫的認知，而這便是楊逵從長期的躬耕經驗中發展出來的階級倫理樣貌。

³³⁰ 楊逵，《楊逵全集》，卷5，頁451。


³³¹ 陳淑容指出的「新村」理想的確是重要的線索。



回過頭來說，在戰爭期的楊逵將知識份子置於階級倫理的何種位置？他描寫了不願意為窮人看病的醫生（〈無醫村〉）、只想通過戰爭發財的投機分子（〈泥偶〉）、透過官僚制度中飽私囊的醫院院長（〈鵝媽媽出嫁〉）、為了與資本家成為姻親之好而放棄揭露其惡行的記者（〈父與子〉）……等甘為體制效力不顧底層民眾的知識份子，其實正是葛蘭西分析指出的「有機知識份子」之變貌。葛蘭西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新的統治階級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的知識份子群體，而有別於依附於農村地主、教會等勢力的「傳統知識份子」。兩者之別並非代表了在歷史動意義上的進步或保守角色，而是身處的下層基礎位置之別。雖然「有機知識份子」往往在資本主義社會扮演了傳播進步思想的角色，但由於經濟基礎受限於資產階級或政府機關，他們對於階級革命的作用甚至可能會是負面的。因此葛蘭西一方面指出知識份子的侷限，一方面也期待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知識份子能夠秉持左翼的世界觀與理念協助革命的推展。³³²前述討論張文環時已經說明，他對於國家體制的附從，其實正是難以擺脫統治階級影響力的「有機知識份子」角色。楊逵則試圖與動員體制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且明確化對於依附體制、為虎作倀的有機知識份子之批判。此時楊逵已經不再強調知識份子帶領工農抗爭的倫理必然性，但是仍然明確劃出了「壓迫者」群體的界線。他的道德呼求依然規範著知識份子群體，要求他們看到工農階級的弱勢，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不再是走在工農群眾前面的領導者，戰爭期的楊逵更為強調工農群眾的自發性，知識份子在他們面前往往顯得倉皇而無力。最典型的表述可見於〈增產之背後〉這篇小說，這是楊逵在戰爭末期的作品，顯示了在更全面性的戰爭動員之下他採取的倫理論述樣貌。

〈增產之背後〉是應總督府情報課的企劃而作，這個企劃將包括台灣人及日本人作家派遣至生產或戰場的前線約一週的時間，再將作品發表於《台灣時報》、

³³² 安東尼奧·葛蘭西，葆煦譯，《獄中札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418。



合併後的《台灣文藝》等刊物，後並編輯為《決戰小說集》乾、坤兩卷出版。這篇小說的出現是來自於明確的戰爭動員要求，但從實際的作品觀之，派遣作家們仍然多半保持了一貫的文學風格，因此不能將其視為純粹應時之作。相反地，它呈現了楊逵在戰爭期思想的一種典型。故事梗概為：敘事者來到石底的煤礦場，偶然與以前農場的工人「老張」重逢，並且認識了佐藤金太郎這位基層主管（勞務股囑託），深為其人品及群眾魅力所折服。敘事者身為作家，在煤礦坑中參觀與勞動，深深為生產現場的艱辛與工人們勤勞刻苦感動，感到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孱弱與無力，決心利用自身經營農場的經驗，協助大規模的蔬菜生產計畫以供應現場工人的糧食無缺。在奉公文藝的形式限制之下，楊逵在這篇小說中放棄了對於權勢階級的批判，而致力於描寫日本與台灣工人階級的融洽與勤奮。佐藤金太郎這名靈魂人物，扮演著諷刺失控的「皇民化運動」之功能：他位居底層，對台灣人勞工與孩童皆親和以待，因而能自然而然地使周遭的台灣人學會「國語」。他所教養的台灣人養女甚至以自學的方式獲得不輸於女學校的教育程度。楊逵企圖藉由工人階級的平等，指出基於權力位階的「內台融合」是膚淺的，只有泯除階級的界線方能達成。

這固然是人道精神的反映，但反過來說，當敘事者所代表的知識份子完全拜服於勞動階級的神聖性之前，就讓人不得不困惑，難道勞動階級的歷史重要性是在於他們的勤奮與良善嗎？³³³這些道德價值難道不正是在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的機制中扮演了重要的意識形態霸權角色嗎？在這樣的倫理論述之中，什麼是「善」的呢？「勞動」往往成為核心。對於勞動神聖性的禮讚成為楊逵階級倫理論述的核心。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它即使不是功利性的倫理思考，也是工具化的，忽略了勞動者的主體性其實已經在資本主義與戰爭體制中產生了異化（alienation），知識份子的禮讚謳歌只是反映了自我理念的投射，尤有甚者，只是突顯了知識份

³³³ 許國賢指出，基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往往成為促成階級剝削的工具，因此馬克思並不強調道德在革命或階級意識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哲學道德觀依然強調以人的自由解放為目的之道德觀。許國賢，《論馬克思社會批判的倫理基礎》（南港：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9）。

子在戰爭動員體制下無能為力的挫敗感，而將道德的正當性託予勞動階級，難以保持與政治動員之間的距離。被楊逵置於倫理問題核心的勞苦大眾，在此甚至是更加被他者化的，永遠只能以辛勤勞動的形象出現，而知識份子的角色就是去學習、認識他們的精神，卻無形中強化了將「勤勞奉仕」作為動員倫理的戰爭體制，降低了對動員體制本身進行反省的力量。

在此事件之前，楊逵曾因應台灣文學奉公會在戰爭局勢日益危急之下發起的「台灣文學總蹶起」聲明，與張文環、呂赫若、西川滿、濱田隼雄等 23 位作家於同期分別發表短文，聲稱「我不忝敬陪全民崛起的末座，結束了『首陽』農場」³³⁴這即是〈解除「首陽」記〉之由來。楊逵是否真的「轉向」而支持戰爭，在本文的分析中已經不再重要，值得指出的是，這篇文章顯示了對於大眾過度的追隨，使得楊逵在論述的生產中已找不到繼續堅守自持的立足點，終究只能宣告「解除『首陽』」。他寫道：

就在最近，我這麼想著：有老人，有年輕人，有官員，有農民。這些人都在台灣，而在台灣正遭受敵人攻擊的此刻，我卻還沉湎在自己廉價的感傷中，太不像話了。³³⁵

誠如部份學者指出的，楊逵即使在最激烈的戰爭動員時期，也依然堅持著對於底層階級的關懷。³³⁶然而在本文的分析中更可看出，他所型構的階級倫理論述已經在戰爭動員中有所變調。相較於在左翼知識傳統中對於階級倫理的意識，強調無產階級對於歷史變革力量的承擔，戰爭期的楊逵則通過自身的經驗，選擇走向更為直觀樸實的階級論述，連接了戰後走向「人道主義」的思考軌跡。

³³⁴ 楊逵，《楊逵全集》，卷 10，151

³³⁵ 同上註，頁 150。

³³⁶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零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




第五章 結論

回顧前面的章節，我嘗試以「國家倫理」為核心，指出張文環、楊逵兩名世代近似，活動路徑則大有不同的兩位作家在面對戰爭動員的時候，也都以各種倫理論述的生產加以回應，其形式包括了文學與政治的實踐。從二零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開始轉向為文化運動，到了1937以後全面的戰爭體制形成，可以發現台灣日本語文學的發展竟與戰爭體制的建立相終始。這應非歷史的巧合，所謂近代文學的建立既與民族國家密不可分，我們就應當瞭解，台灣被整編進入「國民帝國」的歷程即是近代台灣日語文學發展的歷程，而戰爭作為日本國民帝國重要建構原動力之一，自然也成為難以分割的影響因子。在這個意義下，或許尾崎秀樹對於戰爭期台灣文學的陳述正應該倒反因果：並不是戰爭「把每個作家或組織所擁有的個性及其實現的可能性全部搗碎，並將之統制、統合到南進基地台灣的文化決戰體制上來」³³⁷，而是相反地說，台灣日語文學的發展到了歷史的時刻，就蘊含著東亞戰爭的必然性。正如同各類英語語系文學、法語語系文學等帝國語系文學在全球殖民地伴隨的戰爭那樣。因而本論文從戰爭情境下倫理論述生產的角度切入，可以說證明了文學生產既與社會場域密不可分，同時也說明了後見之明的不可靠，當戰後的文學研究從台灣／中國國族主義的角度批評「在台日人文學」「無法從法西斯主義的狂妄中抽身。其結果非但未能締造新的外地文化，反而完全失去了文化人的自我，失去了文學，也徹底失去了歷史」³³⁸的時候，反倒應該回過頭來思考台灣的日語世代作家是如何參與了這場帝國的戰爭。他們並非毫無主體與責任的傀儡，而是步履在混雜而艱困的主體立場之上，尋找著幽暗歷史

³³⁷ 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頁104~193。

³³⁸ 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台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收錄於吳密察等，《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頁218。

的出口。



在楊逵與張文環的例子之中，他們均有接受左翼思想的背景，並且或多或少地涉入運動的實踐，然而由於主觀選擇的差異，使得前者原為台灣文壇的左翼先鋒旗手，後者原為進軍帝都文壇的知識青年，兩人於戰爭期際遇大不相同。楊逵堅持抵抗的精神，然左翼思想已產生了變貌；張文環則是投入殖民者的政治動員體制，希望能掙得殖民者對於台灣人地位之肯認。這樣的差異也表現在倫理論述的使用之上，張文環在戰爭動員的情境下企圖建構美好的鄉土倫理，連接民族文化的血緣與知識份子的實踐可能；而楊逵對於階級倫理的運用，則強調甚至膨脹了知識份子對於工農底層人民的「債務」。這些差異反映了他們思想軌跡的分歧，但與其說是「左、右」、「民族／國際主義」的思想質性造成了絕對的差異，對於國民帝國體制的協商與轉化，則是難以忽視的共同點。不管是鄉土倫理背後可能蘊含的父權秩序、國族共謀，或者是階級倫理滑落為國家道德治理工具的可能性，都在提醒了我們，過於安逸的倫理立場是危險的，當作家、評論者使用各種意識形態資源對文學進行建構工程，往往也同時深陷於複雜的權力場域之中。因此對於兩人戰爭期倫理論述的比較分析，可以說彰顯了台灣日本語世代作家在面對國家霸權之時的艱困處境，對於思考當代國族與文學文化之關係，也應有重要的啟發。

透過對於「倫理論述」的分析，我相信自己已經證明了，在台灣文學的研究中時常出現卻未被清楚定義的「倫理」一詞，實際上值得被更嚴肅與小心地對待，而非視之為不證自明的道德基礎。它往往出現在城鄉的對照、國族主義的召喚等情境之中，但卻試圖掩飾這樣的背景；這樣的狀況不僅造成嚴肅的對待文本與思想之困難，也隔絕了不同意識形態的論者相互理解的可能。「倫理論述」實際上是一種知識份子，亦即作家在面對社會共同體的時候，基於對於自身知識能力的信賴而湧現的責任感。他相信自己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引導者之一，他所運用與生產



的倫理論述，也因而是武斷的、甚至是暴力的。現代國家，作為合法壟斷暴力的裝置，也就與知識份子的倫理論述產生必然的交集。我並非主張在國家暴力的限制之下，知識份子的行動已無可為。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中，知識份子如何挪用各種倫理論述的資源，獲得某種程度的自主性，是被應該關注的焦點。但是這樣的自主性絕非本質蘊含於作家的思想，論者在解讀其實踐作為的時候，應該將作家本人與社會脈絡，以及作家與論者本人相對化地看待，而非依自己的立場需要而將作者本質化定位。在張文環的例子中，鄉土倫理成為他寄託己身記憶與自主性的空間，即使它本身是幻想性的，但是我們也的確可以看到在戰爭動員體制下，張文環試圖以鄉土倫理的論述，在國家龐大而彷彿毫無遁逃機會的天羅地網之中，找到一絲協商斡旋的空隙，主張著台灣鄉土社會在國家引領的現代化力量之外，仍有一些不同的自主性。而在楊逵的情況，雖然階級倫理的運用容易在法西斯的集體主義之中被吸收，但是他走向以自身躬耕體驗為出發點的人道主義關懷，正是一種有別於剛性左翼理論的實踐可能，啟發了同代或戰後的知識份子。在我們目睹到教條的左翼思想如何可能在掌握權力後搖身變為官僚主義，以黨的特權取代階級的歷史前鑑之後，楊逵的努力依然有其啟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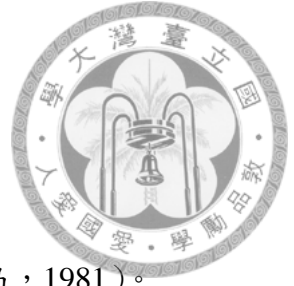
然而值得再三強調也不為過的，正是對於「倫理」的相對化應該要被重視。當我們同意張文環或楊逵在那個時代脈絡中的努力，也必須小心其可能的侷限，謙卑地汲取他們的思想資源，而非將其當作神主牌或攻擊的箭靶。最後，引用作家吳明益一段論述，作為本論文最後一個註腳。

這裡是八仙山，它不可能也不必和臺北市民與虎山的倫理相提並較。不不，其中並無優劣之分。你說，山有山的倫理、鄉村有鄉村的倫理、保護區有保護區的倫理，城市有城市的土地倫理。倫理的意義不在同化，而是鬆動、對應、柔軟。³³⁹

³³⁹ 吳明益，《蝶道》（台北：二魚，2003），頁 222~223。

我在這裡的引用是武斷的。但它的確闡述了這本論文想要傳達的一件核心價值：「倫理」並不應該被視作先驗的社會秩序或道德形式，而應該試圖挖掘它在每一種社會共同體的形成與解放如何可能。





參考資料

作品史料典籍

- 池田敏雄、莊揚林編，《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 吳坤煌，《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
- 楊逵，《楊逵全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 蔣渭水，《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台北：海峽學術，2005）。

專書

- 丸山珍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台北：聯經，1984）。
-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
- 王詩琅，《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1995）。
- 平林初之輔等，《現代日本文學論争史·中卷》（東京：未來社，2006）。
- 弗朗茲·法農，《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7），陳瑞樺譯。
-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北京：人民出版社）
- 成田龍一，《「故鄉」という物語 都市空間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2009）。
-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国民大衆雑誌の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3）。
- 吳明益，《蝶道》（台北：二魚，2003）。
- 吳密察等，《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播種者，2008）。
- 呂正惠，《殖民地文學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2002）。
- 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東京：岩波書店，1991）。



- 李文卿，《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2010）。
- 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2009）。
- 赤木須留喜，《近衛新体制と大政翼賛会》（東京：岩波書店，1984）。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3）。
-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東京：ひつじ書房，2012）。
- 林梵，《楊逵畫像》（台北：筆架，1978）。
-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1930-1945》（台北縣：稻鄉，1996）。
- 波寇克，《文化霸權》（台北：遠流，1991），田心喻譯。
-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林詩庭譯。
- 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1998）。
- 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台北：人間，2012）。
- 柄谷行人，《倫理 21》（台北：心靈工坊，2011），林暉鈞譯。
-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
- 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
- 栗原幸夫，《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平凡社：東京，1972）。
- 泰瑞·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2005）。
-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2006）。
- 高岡裕之，《總力戰体制と「福祉国家」：戦時期日本の「社会改革」構想》（東京都：岩波書店，2011）。
-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2013）。
- 張文薰，〈評論家/小說家的雙面張文環--以藝旦·媳婦仔問題為中心〉第 3 期期（2002），頁頁 209-228。
- 許國賢，《論馬克思社會批判的倫理基礎》（南港：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9）。
-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

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臺北市：群學，2012）。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9）。

黃惠禎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楊逵》（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楊建等，《土匪婆 vs 模範母親：楊逵的牽手葉陶》（台南：楊逵文學紀念館，2007）。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07）。

趙勳達，《《台灣新文學》（1935~1937）定位及其抵殖民精神研究》（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6）。

劉紀蕙，《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台北：行人，2011）。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2004）。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台北：行人，2011），邱振瑞譯。

單篇論文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與兩種倫理學〉第 10 期（2010），頁 175~186。

山室信一，〈國民帝國日本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第 16 卷第 2 期（2009），頁 1~22。

安部博純〈軍部・財閥・革新官僚〉，收錄於藤原彰、今井清一主編《十五年戰爭史》（東京：青木書店，1996），頁 141~182。

庄司潤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戦争呼称に関する問題の一考察〉第 13 卷第 3 期（2011），頁 43~80。

吳嘉泓〈試定位《風月報》和文欄中的「新文藝」路線——以作為書寫對象與創作主體的女性形象為線索〉，收錄於許素蘭主編《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第十屆全國



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頁 337~364。

李永熾〈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形成〉，收錄於《日本近代史研究》(台北縣：稻禾，1992)，頁 321~379。

李承機〈日本殖民地統治下「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苦鬪」——在「抵抗日本統治」與「經營新聞媒體」之間〉，收錄於《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 1932/4/15~5/31》(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頁

周婉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台灣史料研究》第 37 期 (2010)，頁 2~31。

松永正義，葉迪譯，〈關於鄉土文學論爭(1930~32 年)〉第 4 期 (1989)，頁 73~95。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收錄於《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1996)，頁 294~331。

河原功，〈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伙〉——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達——〉，《台灣文學學報》，第 7 期 (2005)，張文薰譯，頁 129~147。

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臺灣男性作家的女性呈現(1937~1945)〉第 3 期 (2002)，頁 231~269。

垂水千惠，〈呂赫若文學中〈風頭水尾〉的位置——《決戰小說集》及其他軌跡〉第 3 期 (2002)，頁 23~37。

柳書琴，〈《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第 12 期 (2012)，頁 1~40。

張文薰，〈「風俗小說」的迷思〉，《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台南，台灣國家文學館)

張文薰，〈1930 年代臺灣文藝界發言權的爭奪——《福爾摩沙》再定位〉第 1 期 (2006a)，頁 105-125。

張文薰，〈一九四〇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第 19 期 (2011)。

張文薰，〈由「現代」觀想「故鄉」——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第 2 期 (2006b)，頁 5-28。

張季琳〈戰時下の楊達——「増産の蔭に」をめぐって〉，收錄於藤井省三等主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130~143。

野間信幸，〈張文環の「父の要求」について〉第 3 期 (1995)，頁 35-59。



野間信幸〈張文環の戦争協力と文学活動〉，收錄於藤井省三等主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107~122。

野間信幸，〈張文環作品に表れたる漢文教養〉第 12 期（2004），頁 65-83。

陳偉智〈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收錄於柳書琴主編《「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頁 7~30。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第 15 卷第 4 期（2008），頁 31~86。

陳培豐，〈殖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伙》、《國王》、《水滸傳》〉第 9 期（2009），頁 249~290。

陳培豐〈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收錄於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190~237。

陳淑容，〈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第 18 期（2011），頁 91-115。

陳淑容〈跨語、跨境、跨時代——賴明弘的漂泊與追尋〉，收錄於《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二集》（高雄：春暉，2008），頁 277~311。

黃惠禎，〈楊逵與賴和的文學因緣〉第 3 期（2002），頁 143~168。

鈴木隆史〈日中戰爭〉，收錄於藤原彰、今井清一主編《十五年戰爭史》（東京：青木書店，1996），頁 3~45。

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第 5 期（2004b），頁 49-83。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第 18 期（2007），頁 227~245。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前台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369~388

藤田省三〈昭和八年を中心とする転向の状況〉，收錄於思想の科学研究會主編《共同研究 転向 上卷》（東京：平凡社，1960），頁 33~65。

藤澤太郎，〈金川中学校から見える「都市」、岡山と東京と——張文環・岡山時期の学籍問題を出発点とした台湾人内地地方留学生の意識をめぐる論考〉第 6 期（2010），頁 10~17。

鶴見俊輔〈翼賛運動の設計者：近衛文麿〉，收錄於思想の科学研究會主編東京：平凡社，1962），頁53~120。



學位論文

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台北：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2011）。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7）。

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之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6）。

林嘉立，《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的民族主義敘事：以1940年代為中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3）。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1993）。

徐俊益，《楊逵普羅小說研究——以日據時期為範疇（1937-1945）》（台中：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5）。

張文薰，《植民地プロレタリア青年の文芸再生——張文環を中心とした『フォルモサ』世代の台湾文学——》（東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国語中国文學專攻博士論文，2005）。

陳淑容，《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9a）。

陳淑容，《戰爭前期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成和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9b）。

楊雅惠，《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4）。

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9）。

賴婉玲，《皇民文學論爭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

資料庫

呂赫若等，「台灣日記知識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